

DANGDAI
BAOGAO
WENXUE
CONGSHU

毛岸英之死

王 颖

四川文艺出版社

王 颖

毛岸英之死

责任编辑：曹礼尧

插图：黄驾宇

版面设计：李明德

毛岸英之死

王颖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8 插页 9 字数 186 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2,450 册

书号：10374·140

定价：2.29 元

目 录

海外赤子.....	1
毛岸英之死.....	18
如胶似漆.....	36
爱，和他们一同进入角色	
——记扮演毛、刘、周、朱、任的演员们.....	51
当流星从夜空划过.....	72
一片冰心领风骚	
——记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90
“我就是我”	
——舞蹈家陈翘正传.....	109
生命的乐章	
——记女作家柯岩.....	134
巍巍从战争中走过来.....	145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上.....	160
“我就是想在奥运会上听听国歌”.....	188
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	194
“铁腕夫妻”和他们的事业.....	208
有心插柳柳成荫.....	231
后记.....	253

海外赤子

一

梅山镇醒来了。晨雾中，虽然看不清它娇小玲珑的情影，却能听到它那活泼的喧闹。四野的乡亲们，挑担的、推车的、骑自行车的，都在晨雾中汇集到镇上来，摆开了菜摊、肉摊、鱼虾摊、桔子香蕉摊、香烟摊和炸油条油饼摊等等，忙乎着做早市生意了。相互打招呼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吆喝着让路的声音，外加清脆的车铃铛的响声，混合成一支热闹繁忙的晨曲，从雾气里散播开来，传向四野，使人感到这小镇活跃的生命。

有一位老人，从镇西头的地区医院大门口踱了出来。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子，一头稀疏却又梳理得很好的灰发，椭圆脸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一身深灰色的西装，脚穿一双不用系带的黑皮鞋，不扎领带，脖子上围着一一条黑绸围巾，几乎把那件有花点的的确凉衬衣领子遮没了。左胸前，别着一块精致的硬纸片，上写着“德美行观光团”字样。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悦，显然是刚才看到了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当他走到东头“国光中学”时，雾气消散了不少。太阳从东海面升起来，柔和的红光照耀在小镇子上，把淡淡的雾气染成了粉红颜色。

学校里，传来了一阵琅琅的书声。他沿着长长的台阶登上学校的最高处，站在这里，已经能俯瞰梅山镇鳞次栉比的房屋和狭窄拥挤的街巷了。可是，他没有兴致赏景，也不走进教室巡视学生们的早自修，而是绕到教职员工的宿舍楼背后，一边踱步，一边查看。几乎在每一个窗台上，或多或少都存积着残剩的茶叶，那茶汁沿着白墙流下来，到处留下了铁锈般的印痕。唉，几十年了，他出国时这一带的乡亲们就有这样一个坏习惯，喜欢把剩茶往窗外一倒了事，这积习至今未改，至今未改哪！

是的，这就是他的故乡，从倾倒剩茶这一特点来看，无疑是故乡的特征。他不喜欢这一点，希望再也寻不见它，可偏偏还保留着。乡亲们都有个喝工夫茶的习惯，不大的茶壶里，泻下小半壶茶叶，一泡开，就是满满的一壶。品茶呢，惯于用斟酒的小杯子，喝上几酺酹茶，就把茶叶倒掉了。喝茶是考究的，倒茶的习惯却难以令他容忍。为什么不改掉呢？什么时候能卫生、文明起来呢？他爱故乡，爱她的变化，那变化里听得出有前进的脚步声；可他又痛恨一潭死水般的积习，它不仅没有波澜，没有流动，还要时时散发出腐殖质的气息，令人生厌。

“桐叔，您在这里，让我们好找！”

一前一后，跑近来两个人。前面一位是梅山镇侨联的李主任，后面一位是镇上的公社党委书记兼社长蔡文质。

蔡书记带着嗔怪的口吻说道：“桐叔，您要出来看看，也该预先通知我们一声，好作个准备。”

“唉，我要是先告诉你们，再让陪着走，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我算清楚了，医院病房的过道上，到处是煮饭烧菜的煤球炉子，熏得墙壁一片乌黑；这么好条件的学校，也到处是茶渍、垃圾。搞卫生总不要花很多钱吧？只要你们领导肯抓，积习也是改

得过来的嘛。”

“对。您老先回去吧！这些，我们开会时统筹研究一下。”

老人不吭声，察看时聚拢的不满，长时间凝固在脸上，就像是天空凝滞的乌云。不过，他还是听从了蔡书记的劝告，同他们走出了学校大门。

雾气散尽了，本来被白雾包裹着的一切，都毫无遮拦地暴露了出来。闹腾却又杂乱的街道，都尽收在老人犀利的目光下，接受着他的评点。

“这一条街，是梅山镇的面孔。现在象个什么样子？做煤饼的到处摊晒，挑粪桶的和行人争道，就不能想办法整一整？当然，我不是看不到你们的变化，照你们的说法，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政策放宽了，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这的确是事实。就凭街上有那么多肉摊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天，我还特意把老伴拉到街上来，让她瞧一瞧，农民们有肉吃了，她也开心。但是，小贩到处摆摊，我真弄不懂你们为什么不收税？热闹的地皮多收钱，冷僻的地皮少收点钱，但总要收。收来的钱再用在街道上，搭个棚子，铺个石板什么的，以街养街嘛！”

这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在老人的评点下，变得一无是处了。跟在老人身后的蔡书记很不是个滋味，但他从心底里佩服老人的卓识，若是真地照老人的主意办，一切都是可以改观的。但是，百废待兴，一下子怎么能抓得过来？再加上——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路上积着厚厚的黄土，管你是布鞋还是皮鞋，只要从街上一走，就染成了一片黄色。老人跺了跺脚，原想把黄尘跺落，谁知却腾起一片黄雾。这还是他的故乡，小时候赤脚赶街，就体会过这种滋味，晴天沾一脚土，雨天踩双腿泥。如今，还是一丝儿未变

呀！他停住了步子，指着这条土街说：“尽快铺一条石板路吧！十万块钱够不够？我出十万。中学还是先前那时的房屋，没有什么新建设，盖一座科学楼吧！让学生有个实验和科研的地方，我想六十万可以盖起来了，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泰华楼’吧！它代表泰国华侨的一点心意。”

蔡书记大为感动：“那我代表镇上三千多人民群众，感谢桐叔。”

“我不需要感谢。我在国外挣钱，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计较的。现在所以拿出来，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故土，我的祖国。我已经快七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了，临死之前要给乡亲们做点好事，表表自己的心，并不想回来讨个牌坊。”

“我们知道您老人家的心情。”

“我就是把在国外挣得的钱全部捐出来，只要对家乡有好处，也绝不心疼。但你们也要学会管理。就拿这个铝制品厂来说吧，”老人指了指镇上这家最大的工厂，“投资一百万，现在每年只赚五万块钱。要是我管理，早关厂了。我把一百万块钱存银行，利息也有这么多。你们以为盈利，我看是亏本！”

蔡书记和李主任不再作什么解释，他们任老人指点街巷、评说工厂农村情形，这样一直到了老人家的院门。

院墙里面的一切，对于这座杂乱又邈远的小镇来说，真象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景物。一座精致的红砖两层小楼，座落在院子当中。虽然这座“新丰楼”是一九五七年所建，但至今还保持着簇新漂亮的形象。

这老人是谁呢？他对这一带为什么了解得这样细致又关怀得这样入微？

在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他的姓名。

二

一九七〇年的一天，他也是身居于这座小楼之中。院内虽然还是这般雅致清静，可院外却掀腾着狂热的浪涛。那时，国内正在搞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整个祖国都在狂涛中摇摆，纵然此处是世外桃源，又岂能独善其身？

小镇上的“红卫兵”队伍包围了这座小楼。半导体扩音器和口号声震得玻璃窗子直颤动，几杆红旗高过院墙在那里拂来飘去，他的确有些儿怕。在国外，他只听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丝丝片片的传闻，不足为信。如今，他真地领略到了它的“威严”。

直到院外重新归于沉寂之后，他才敢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出来探个究竟。游行示威的队伍虽然散尽了，但余威尚存。院墙上，贴出来好几张大字报，浆糊未干，墨迹犹浓，赫然入目的大字是——“大资产阶级李引桐滚出大陆去！”“最后通牒：勒令李引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梅山，否则，革命群众将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这，就是他的姓名了：李——引——桐。不过，“李”字是歪着写的，“引”字颠倒，“桐”字趴下，全都打上了红叉叉，是表示要判他的死刑。姓名前冠以“大资产阶级”的谥号。也一点儿不错，他比起解放前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如天津的王光英，上海的荣毅仁，还要大许许多多。他领导着泰国境内的“德美行树胶有限公司”，这是“南意树胶有限公司”的一个分支。“南意”是华侨、南洋树胶工业巨子陈嘉庚先生的经营机构。陈老先生逝世以后，这企业由他的女婿李光前承继。李光前三分天下，李引桐是其中之一。李光前去世后，这“德美行”已

全部归属李引桐所有。李引桐领导着泰国境内十几家分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就有七亿美元。如今，这“魏”、“蜀”、“吴”的任一股份的财产，比起陈老先生事业的鼎盛时期，也超出了六、七倍之多。在全世界滚动着的每四个车轮胎中，就有一个是“南意树胶有限公司”出产的橡胶所制造的。这“大”字，他当之无愧哟。

不过，他是个爱祖国、爱家乡的企业家。这种爱，发端于陈嘉庚先生，继承于李光前先生，而在他身上发扬光大着。就说闹“红卫兵”运动最烈的这所“国光中学”吧，名字虽可以改成“新华中学”，但抹煞不了光前老人的功绩。就是他曾给家乡捐款一千万元，创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建造了“国专礼堂”等等公益设施。“国专”是光前先生父亲的名字，而“国光”则是他父子各取一字组合而成。这一切决不会因更改名字而消逝。他，李引桐，不敢忘嘉庚和光前先生的教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之时，他就冒着危险，偷偷地向祖国运进来一批橡胶树苗。从那时候起，中国的南方才有了橡胶园。为此，一九五六年，他曾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对他的爱国行为曾有过高度的嘉许。这是历史，也是事实。你们“红卫兵”不知道，但总理知道，周总理能为他作证。

他望着被打了红叉叉的姓名，眼睛模糊了。爱国有罪，何罪之有？小时候，他也是个一文莫名的穷光蛋。小包裹里包几件破衣烂衫，远渡重洋出国去寻生路。就因为李光前先生和他同乡，认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收留了他，培养了他，让他回国读书深造，又出国创业。因为他勤勤恳恳，不偷懒不要滑，深受光前器重，被提拔起来，成为一方的董事长。现在他有钱了，最

先想到的却是祖国。他原想用自己赚得的钱来报效“母亲”，给“母亲”的颈脖上添一串“项链”，或是给贫瘠的故乡添一件“新衣”，可这一份孝心却被当作歹意而横遭拒绝。岂止拒绝，连容身之地也不给，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祖国大地啊，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不理解，然而不敢违拗，只得照办。第二天，他拎起收拾好了的皮箱，走出了自己的小院。他带着困惑而又依恋的目光看了看熟稔的小楼，眼角里又涌出了泪水。想起十四岁那年，他背起小包裹，在堂前朝父亲、母亲连叩了三个响头，然后被一位乡邻带出了草屋，准备到泉州去登船出海。父母亲送他好远，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得好伤心，他却没有掉泪。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一条硬汉子。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今天反倒哭了……

这一别就是八年。

八年里，他听广播、看电视，翻阅华侨办的中文报纸，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的形势。“四人帮”被打倒了，祖国开始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象他这样的华人，祖国也伸开了热情的臂膀。古老的中华，显出了腾飞之势。是时候了，该回去看一看了。他记得有个西晋文学家叫张翰的，到洛阳做官，看见萧瑟秋风吹来，忽然思念起苏州家乡的菰菜、莼羹和鲈脍。在外干般好，不如故乡亲，便毅然辞官，跑回了吴中。他仿佛就是那个张翰，思乡之情在年复一年地加浓，不是为了莼羹和鲈脍，而是——是什么呢？这种味道，他感觉得到，却一时说不出。是故乡有他呱呱坠地的茅屋？是故乡有他父母和祖宗的坟茔？是故乡有他童年时的记忆？或是故乡有他熟悉的乡音？……都是，又好象不仅仅是这些。他的依恋，好象比这一些还要广大得多，又具体得多。

他知道当初轰走他的只是少数幼稚的青年，而不是祖国本身。祖国也在受难呀，他有什么理由把怨恨记在祖国的账上呢？他把公司的业务交待一下，准备动身。他的一位部属劝他说：“董事长，还是等些时候再去吧！贴你大字报的滋味，难道忘了？”

他淡然一笑：“都已成为过去了嘛！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常讲一句话：要向前看嘛！”

他终于又回来了。回答他的不再是冷漠和“炮轰”，而是热烈的欢迎。公社书记到车站迎接，并设宴为他洗尘；县委书记亲自到他小楼中来拜访。他见了这些领导的面，第一句话就说：“我李引桐是爱国主义的死硬派，有人骂我，轰我，我也要回来！”

回来了，怀着一种试探之心，他处处先看先问，小心翼翼，不敢太多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他发觉故乡真的变了。人民群众和党政领导干部都心情舒畅，有言必发。和他闲谈，也能说心里话了。他也就不再拘束，自觉地溶入了这个集体中，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有什么看法和意见，敢于直言不讳地倾吐了。

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他每年必来，有时还一年归国两次。一九八〇年，他带了一个十八人组成的“德美行归国观光团”，不仅来到家乡，还到了北京、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一九八一年，他又带了一个二十四人的观光团，回祖国参观访问。他觉得只要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那颗悬着的空虚的心便落到了实处。

对于家乡人民的捐赠，也逐年大胆和增加。公社有十七个大队，还有社直机关，他一下子赠送了四十多台彩色电视机，解决了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的困难。梅山镇上的地区医院是肿瘤医院，

然而缺乏现代化的医疗设备，确诊癌瘤有困难，他就捐赠了X光机等现代化设备计价四十万元。对于他毕业的母校——培元中学，他也赠送了二十五万元港币。这几年中，他捐赠在梅山地区的钱款有二百万元，物资折价一百万元，捐赠给省和地区、县的款项有一百万元，计合四百万元。

他气度恢宏，为善最乐。大队干部来找他，“桐叔，您知道，我们这里地少人多，剩余的劳动力没法安排。我们想办个机械化的砖瓦厂，这样可以解决二百个青壮劳力。”

他直截了当地问：“建这样一个工厂，需要多少资金？”

大队干部估摸了一下：“恐怕得二、三十万吧！”

“好，我投资四十万。”

县委书记来找他商量，想在南安县发展植茶事业，让人民群众能品到自己家乡的茶。

他又是快言快语：“我出款二十一万，供你们试验种植。但是，你们对下讲，说这笔钱要还的。这样，他们就节省了。不过，你们心里清楚，我是不要你们还的。”

他为了什么呢？为了在家乡留取一个好名声吗？

一天，蔡文质书记来到他的家里，对他说道：“桐叔，有人建议，想给你刻块碑，把你给‘国专礼堂’改建所赠的钱数和您的名字，刻在碑上，筑在礼堂的石基里，也好让后人知道——”

“不必！不必！”李引桐连声拒绝，“你们这些年，搞树碑立传、个人迷信，吃的苦还不够吗？告诉你吧，光前在临死时，把我和其他人叫到他床边，对我们说道：‘我想过，我生前搞了一些树碑立传的事情，效果不好，影响也坏，我好懊悔，以后你们再也不要搞了。’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我一不相信鬼神和因果报应；二不愿搞树碑立传！要说我想图点什么，我就图的这

个：图报母恩。我的母亲就是祖国。这个比方，一九五六年周总理接见我的时候就说过：“我们华人，象嫁出去的女儿。那边是婆婆，这边是亲娘，虽然很少回娘家，但对亲娘的感情，总比对婆婆深得多”。今后，我要把我赚的钱，三分之一投资给泰国政府；三分之一扩大再生产；还有三分之一拿到祖国来投资。对这块生我养我之土，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一天，梅山大队的一个干部到他的便厅里来拜访他。

“桐叔，有件事——想同您商量一下。”

李引桐比如今大队的中年人和干部们都长一辈，加之这些人又都姓李，所以他们一口一个“桐叔”叫得亲热。

“有什么事？说吧！”

“这也是大家伙的意见，推我来，向桐叔反映一下。”

“唔。”李引桐有些猜测到了对方的来意，他在静听下文。

“我们是侨区，另外您又在我们这个大队……”

“直说吧！如果真有什么需要的，凡是我能办到——”

“有桐叔这句话，我也壮胆了。桐叔，我们想盖个象样一点的大队部，这恐怕得花几万块钱。您也知道，这些年队里一直穷，没翻过身来。”

“你们有多少人办公？”

“大约有五、六个人。”

“多的时候呢？”

“也差不离这么多。”

“少的时候呢？”

“也许要少个把。”

“那还盖什么楼？”李引桐脸一沉，“你们不是地多，而是地少。平均一人才几分地，多盖一幢楼，就少了几分耕地，你们不心痛？”

“也占用不了多少地。”

“一个大队部办公，还用得着专门盖个楼？有一间房子就够了。”李引桐顿了顿，接下去说道：“咱们大队后头不是有个破庙吗？修一修，当大队部蛮好。我看，不必盖什么楼了，给你们两千块钱，去修那个庙。”

就是这两千块钱，他也不想给。这算是什么事呢？一个大队的干部，有什么事，到田里去和社员一商量不就得了，还用盖楼？这两年，他也看出来了，有些干部不把正经心思用在生产上，却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这使他感到痛心。

又有一天，他乘着一辆深蓝色的小轿车，从泉州返回梅山，看到一支奇形怪状的队伍挡住了去路。这支队伍的许多人，都穿着一身白衣裳，一眼就能看出，是支送葬的队伍。头前的一个人，双手捧着一块磁板，磁板上是死者的彩塑画像。画像后面，有四个人抬着两条大木杠子。木杠子上，搭满了五颜六色绸缎被面。被面的边缘上，别着白布条，上写着“×××千古”字样。木杠后面，是一支西洋铜管乐队，吹圆号的，敲小鼓的，叮叮咣咣，铿铿锵锵，好不热闹。再后面，更有意思了，是八对男女，上穿花衬衣，下着喇叭裤。尖头皮鞋和高跟皮鞋交错蹀跹，屁股子乱扭，原来是在跳摇摆舞。舞蹈队后面，是彩纸扎就的花轿，里面摆着一个精致的骨灰盒。再往后，才是死者的孝子贤孙和有关亲属们。呜呜咽咽，抽抽泣泣。前面喜悦，后面悲悼，不知是死者需要快乐，活人需要悲痛，或是正相反。反正有喜有悲，死

人与活人各取所需吧！队伍到此还没有结束。再接下去，是一支民族乐队，吹唢呐、打锣鼓的，和前面的西洋乐队争胜斗响。民乐队后，是一大溜声势浩大的人群，里面既有生前友好、部下后辈，也有纯粹为了追逐热闹的少年儿童。据说，即便是毫不相识的路人，只要装出一副悲苦相，跟在队伍后面走一遭，到死者家中，也决不会少过一餐饭。最后，压阵的，是一支和两旁的大叶桉树、木麻黄树试比高的高跷队伍。

整个队伍哩哩啦啦足有半里路长。

李引桐好奇地向队伍里的人打问：

“死者是什么人？”

“这是我们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他差点叫了起来，“他花的是国家的钱还是自己的钱？”

回答他的是小车司机：“也有国家的钱，也有别人送的礼，反正用下来，他家不但不吃亏，还有得赚。”

李引桐气得脸色发紫，连连跺脚：“今天真不巧，没有带照相机，否则，非把这个镜头照下来不可！喂，你们谁带照相机了？”

随行人员都摇了摇头。

“咳！”他沮丧地钻进了小车，“砰”地把车门关上：“这种人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还搞这一套，死了还要糟蹋国家的钱，怎么得了！我，我非要告到中央去不可！”

他急得等不下去了，队伍还没有过完，就催促司机：“不等了，不等了，快开回家去！”

他回到家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侨联的李主任进来向他报告道：“桐叔，地委书记和县委黄书记来看您了。”

“好啊，正要找他们去呢，快请他们进来！”

两位书记被引进会客室，李引桐大步走进来，生气地问：“你们知不知道？”他的手指在发颤，“一个共产党员，死了还搞封建迷信，大肆挥霍国家钱财，象话吗？”

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两位书记问得面面相觑。县委书记说：“桐叔，你歇歇气，慢慢说。”

“哼，这种事，你们还管不管？要不管，我向中央反映去！”

随行人员立即悄悄地向两位领导介绍了路上看到的一切。

地委书记劝慰他道：“你先消消气，我们一定查清楚这件事，严肃处理！”

李引桐这才缓下劲来，对两位领导劝茶、递烟，交谈起其它事情来。

也许这件事对他刺激太大了，好久好久，他只要碰到一位领导干部，就带着气愤诉说一通：“我们在国外死个人，丧事也是很简单的嘛。现在国内红白喜事都讲排场，互相比试，一个胜一个，我真不懂，这是搞共产主义还是封建主义？”

他的心里不只有爱，还有愤懑和怒火，这是对我们社会还存在的封建残余习气强烈的反感。我们从这气愤里，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对丑恶的现象疾恶如仇。而他所以恨得这样重，也还是因为他爱得太深的缘故。

四

一九八〇年五月，李引桐又从国外回到了家乡。

当他弯腰步下车门口的台阶时，随即从他身后蹦下来一位皮肤白皙的姑娘，她挽住了李引桐的胳膊。

二十出头的年纪，也是椭圆脸蛋、修长身材，一看就知道是李家的后代。

“公公，这里就是我的老家？”望着眼前的梅山镇，她用闽南话问道。话讲得结结巴巴，满脸是兴奋而迷惘的神情。

“是啊，你公公就是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

他同大队、公社干部一一握手，并介绍道：“这是我的大孙女，叫李亚环，在美国上大学，是我下决心让她回来一趟的。如果不带她回来看看，她连祖父祖母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了。说呀，向叔叔伯伯们问好！”

李亚环鞠了一大躬：“叔叔伯伯好！”

第二天上午，李引桐把孙女带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块地头上，这块地已种上了绿油油的水稻。沟沟里的水，明净透亮，映着走在田埂上的一老一少。

李引桐蹲身抓起一把湿漉漉的泥土，在手中捏揉着，向亚环介绍：“孩子，这就是你公公耕作过的土地。没有出国前，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田、耙田、施肥、割稻……那时才十来岁，什么都得干，又驾牛又挑担，苦着呢！不象你们现在，光读书，不愁吃不愁穿……”

公社的蔡书记到李引桐家去，听说这一老一少到地里来了，也就赶到这里。见李引桐指指划划，向亚环介绍他的过去，便打趣道：“桐叔，您在向亚环搞忆苦教育啊！”

李引桐认真地回答：“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我也要培养接班人，我要让她知道老祖宗，知道我们家过去也是苦出身，不要忘了本。”

“好好，让亚环听听，是有好处的。”

“老蔡啊，我还要托你办件事。”

“说吧，只要我办得到。”

“你帮我去弄点腌萝卜叶子来。”

“什么，你要萝卜叶子干什么？”

“我要煮一顿菜给她吃，告诉她，公公过去常吃这种菜。”

中午，李引桐家开饭了：糙米饭。桌上，就放着一盆煮萝卜叶，连油也没有放。

看着亚环极不熟练地使用着筷子，夹着一簇菜塞到嘴里，一边咬一边咧嘴皱眉，李引桐故意问道：“亚环，好吃吗？”

“公公，苦。”

“孩子，咽下去，别吐出来。我小的时候，这是家常菜。你还记得咱合艾家里墙壁上挂着的那幅齐白石画吗？他画的是大白菜，旁边还题了两句诗：‘不仅老身知其味，祖宗三代咬其根。’我很喜欢这两句，它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家祖祖辈辈，也是这样生活的。”

李引桐一边说，一边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亚环模仿她爷爷，也把苦涩的咸菜咽下去。

李引桐满意地笑了。

饭后，让亚环看了两部熊猫的电影。一部片子是描写丛林里熊猫的生活片断的；另一部片子则拍自北京动物园。李亚环看得高兴极了。大家要她唱个美国歌。

李引桐说：“回到中国，还是唱个中国的歌好。”

李亚环说道：“我在泰国就准备好了节目，要听，就放给你们听听。”

说着，她去挑了一盒录音带，放在录音机里，打开了开关。落地音箱里，播出了她歌唱《龙的传人》的圆润嗓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叫长江，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

唱到后来，声音略有点低哑，却充满了感情。李引桐不禁打起节拍，也跟着哼唱起来。

音乐戛然而止，录音带放完了。李引桐对亚环说：“好好，我们都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黄帝的子孙！”

临回泰国的前一天晚上，他把大队干部和公社负责干部都邀请到了他家的会客室里，言明要开个半小时的会议。他说道：

“今晚，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我要给孩子们发奖学金。这个目的，和盖‘泰华楼’一样，无非是让家乡多出人才。”他从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夹中取出一张打印纸来，朗声念着……

在座的干部听了都十分高兴。

“大家没有意见，就这样定了，先定它三年不变，三年以后，要是我还活着，那时咱们再议。你们的上级领导，嘱咐我要对建设厦门经济特区提一些建议，我今晚还得加一个夜班。散会吧！”

李引桐办公室里的台灯，一直从九、十点钟亮到深夜，又从深夜亮到天色微明。

他将誉清的一份《关于建设厦门特区的九点意见》，交给来送行的县委书记，请他转呈省委。

当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拿到这份建议的时候，李引桐已经乘上波音七〇七飞机，飞向泰国了。

项书记看到这份建议，心情很不平静。他戴上老花镜，审视

建议全文，只见开首这样写道：

“省委并呈项南书记：

余五十余年里，浪迹天涯。为公司业务涉足世界列国，考察过形形色色之经济特区现状，感触良多。今欣闻祖国洞开南窗，引入外资，贸易五洲四洋。余愿将耳闻目睹世界各国之经验教训，融会贯通，作用于厦门一地，特提出意见九点，敬请选纳……”

一位身入外籍的老人走了，此刻也许已经到了合艾，在他的公司里忙于新的业务了，但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却留下了全部的爱。

1982年4月

毛岸英之死

在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深沟。沟中一条小路，路两侧，是一些相挨得紧紧巴巴的差不多同样高矮的简易工棚。在南山一条小沟岔子旁边，有一个圆圆的矿洞，这是位于朝鲜北部平安北道的大榆洞金矿。如今，里面石落柱塌、阴暗潮湿，那不紧不慢的滴水声，衬出了死一般的沉寂。洞口侧上方五十米左右，有一座很大的长方形木板房，它是志愿军统帅部作战室，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就在这里指挥作战。

虽说时值秋末冬初，山上的矮丛高树仍显得一片葱茏。太阳晒暖了山坡，小鸟在枝头鸣叫。这天上午，围着木板房内那张长方形木桌，志愿军总部的党委常委们，在举行一次极其重要的作战会议。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从鸭绿江北岸隐蔽渡江入朝的志愿军，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初战告捷，于十一月五日结束了第一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八百余人。只是由于战役之初我军的一支穿插部队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因而使美骑兵第一师和英联邦师漏网逃走——这一仗只打痛了李承晚伪军，而没有打痛美帝。骄横跋

扈的麦克阿瑟错误地判断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仍不把志愿军放在眼里。叫嚣一定要在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继续指挥军队全线向北推进。

敌人的轻敌、冒险，造成我军作战的良机。彭总及时捕捉了这一战机，决定再给美军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时召开的，正是第二次战役的部署会议。

坐在东窗下的，是彭德怀司令员。他的左右，是邓华和洪学智副司令，他的对面是韩先楚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南北两侧，是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彭总作战室主任成普，和一位比成普个头略高又显得更年轻些的军人，这正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

出国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他悉心钻研工厂管理和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想在厂里呆它十年，干出一番事业来。谁知美帝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唇亡齿寒，户破堂危，他再也静不下心来搞工业了，立即向毛主席、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这时彭老总在东北组建志愿军总部，正赴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主席便把岸英交给了彭总，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一点战火的考验。出国前夕，岸英又随彭总自东北回到北京，再度向主席和党中央报告情况。汇报结束，已是下午六时，他抓过一辆自行车，第一步，匆匆赶到工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第二步，又赶往医院，看望因手术住院的爱人刘思齐同志。来到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小两口是去年十月十五日结婚的，才不过一年时间。而在这一年里，岸英住工厂，去湖南，难得和刘思齐见一次面。思齐突然见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惊愕，“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难得相逢，却又分别在即，岸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出国

作战是军事秘密，岸英不好随便透露，却又不能不告诉她。

岸英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来，不断地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来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噢，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刘思齐仿佛已经猜到了一些什么。

毛岸英连忙岔开话头：“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呢！”他流露出稚气的笑，象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该走了。他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望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要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刘思齐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

毛岸英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告诉了刘思齐他为什么叮嘱这两点：“江青她只顾自个，根本不照料岸青，她也不爱我爸爸。我曾经骂过她，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在没有翻译任务时，就当机要秘书，分管收发电报的工作。由于他是彭总作战室的人，更由于老总的器重，他也得以参加了这一次重要会议。

彭总说话了：“……这一次，我看是先退，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找破绽，相机歼敌！……”

毛岸英听着听着，有点沉不住气了，老总的开场白一完，他

就急得跳了起来，并且离开了会议桌，走到老总对面板壁上的那幅大作战地图前，指着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敌人进攻！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接着进攻，而先要后退？”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岸英曾参加过追歼德寇的大反攻，那时是千里击敌，一往无前。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嘉奖，赠送给他一支精致的小手枪。他大概是进攻惯了！

毛岸英的直接上级，作战室主任成普，这时急得手心捏出了汗。岸英啊，你初出茅庐，勇敢精神可嘉，但未免失于幼稚。你怎么能匆匆忙忙提出与彭总相左的意见？彭老总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就在几天前召开的第一次战役总结会上，老总首先表扬了正面两个军打得好，“及时捕捉了战机，打得勇猛，所以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但对穿插不力的那个军的指挥员大发其怒——“那里敌人空虚，你们为什么慢慢腾腾，这样迟缓？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违背军令，贻误战机，按律当斩。我身为志愿军的司令兼政委，有权惩罚一切违反军令军纪的人。我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一顿批评，真如同烈火狂风。万一这次也……

谁知成普猜错了，彭老总心平气和地听完了岸英的意见，然后盼顾左右，说：“你们看看，毛岸英同志的意见怎么样啊？啊！”

邓华副司令员是个大烟筒子，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他沉稳机智，平时不多言谈，说出意见来，却很中肯而颇具份量。这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敌人疯狂得很，并不因为受一次挫折而消其锐气。如果硬碰硬顶，要吃亏罗！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先示弱于敌，将计就计，既避其锐气，又能枪打出头鸟，断其一指。”

不谋而合！彭老总又征求了其他几位副司令的意见后，说：

“好，我们后退三十公里，打打退退，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要打起来，我用老办法再试一次，还让那个××军打穿插，给他们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会议结束了，彭总抬腕看了看表，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便叫道：“来，你们谁同我杀一盘？”

在志愿军总部里，能同彭总对奕的有三个人：洪学智、成普、毛岸英。彭总别无嗜好，就是在空闲时候爱下个象棋。不敢恭维，他的棋术不十分高明，常败在这三人手下。但他也有一手“绝招”——回棋。碰上对手要吃他手下的“大将”，他就抓住这个子儿不放，说是得重新考虑。面对他这一手“绝招”，三位对手表现的是三种态度：洪副司令员会打哈哈：“哎咳咳，老总又回棋啦。”一笑了之，并不阻止。而成普则连说都不好意思说，顶多只白老总一眼。毛岸英可不同了，他很有些认真，弄不好还要到老总手里去取“敌军”之“首级”。

“我同你来一盘。”毛岸英抢先应战，而且飞快地拿来了棋盘。

棋盘上的“两军将士”各就各位了，开战以前，毛岸英约法一章：“老总，这回咱说定了，落子无回！”

“行行！”老总回答得异常痛快。

当头炮，马来跳，攻卒，上象，出车，“两军”迅速变换着阵容，棋盘上的形势在急剧变化。

彭总瞅准了对方一个破绽，可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了，他不失时机地把红车一捅到底：“将军！”

这是智者一失，他没有看见毛岸英这边有一匹马，正昂首扬鬃在等待着进攻之敌。

“吃车！”毛岸英一刻也没有犹豫，把他的蓝马敲在了红车

身上。

“不行不行，不走这一步。”老总抢过了红车。

这已是第二次回棋了，毛岸英老大的不高兴：“他妈的，老总你怎么又回棋！”

站在旁边观阵的洪学智嘻嘻哈哈，并不在意，成普却皱了皱眉头……

吃中午饭的时候，成普盛了一碗大米饭，把菜倒在饭碗里，端起一只小凳子，招呼岸英：“走，上那边吃去。”

成普虽然只比毛岸英大两岁，但他四三年底就到总参谋部工作，四六年任作战科科长，转战陕北的时候，他一直跟在毛主席、周副主席身边，有长期的参谋工作经验，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他要比毛岸英更老练一些。

“苏军条例上规定，参谋长在作战决心上，只能向司令员提三次意见。而我们只是参谋，参谋的职责，不是干预首长的作战决心，而是负责提供情况。所以，我觉得你上午的发言，有点超越我们参谋人员的范围。另外，副司令都还没有讲话，你抢先发表意见，是不是有点冒失？”

“成处长，我当时只想快点把美帝打败，所以一听说退，就有点急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现在的美帝还十分强大，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都超过了我们。一味硬打，弄不好要吃亏的……”

毛岸英不断地点着头，脸上流露出真诚的神色：“成处长，你说得很对，我开会时的行为是错误的！”

“还有——这个……关于下象棋嘛，对于彭老总来说，是紧张思考后的一种娱乐，一种松弛，不应该太较真了。你看我和洪副司令，总是输给老总，不是下不过他，是让他愉愉快快。他休

息好了，就更能集中精力把作战方案考虑得周密一些，我们的胜利把握就会更大。而你呢，还骂了一句‘他妈的’。”

毛岸英吃惊得瞪大了眼睛：“是吗？我说了吗？咳，这个该死的口头语！”

“好了好了，今后注意就行了，快吃饭吧，看都凉了。”成普觉得点到就可以了，毛岸英毕竟还是个青年，不成熟之处是难免的。

二

十一月二十五日，是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万里晴空一碧如洗，金光灿灿的太阳当顶照着，使清早还颇具寒意的氣候变得暖融融的。对于作战的双方，这样的天气都是十分需要的。志愿军是穿着夏装出国作战的，祖国还没有来得及使他们换上棉衣。除了彭总穿一身呢军装外，邓华、洪学智、毛岸英等人还单衣在身。而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这样的天气正是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的良好时机。这天上午，当所有的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司令官可以有片刻的轻松了。一夜没合眼的彭老总，实在太劳累了。毛岸英正在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三个“A”字的战斗电报。彭总就和衣躺在毛岸英旁边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

昨天上午，一架美军侦察机，曾在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之久。这异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军可能发现了这里有个轰炸目标。所以邓华、洪学智和不值班的参谋人员都撤到了距木房不远的山洞里，以防备敌人今天来空袭。作战室里，只留下了实在脱不开身的司令官和这几位参谋人员。

还在第一次战役刚刚发起的时候，志愿军总部一辆输送给养的卡车，在那条大深沟里挨了敌机轰炸。一位管理员躲到汽车底下，可恨的敌机一个俯冲，发射了火箭，打着了汽车，竟把这个管理员烧死了。从那以后，隔三差五的，美国飞机没停止过骚扰。这种频繁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总部参谋人员的一种矛盾心理：既警惕，又麻痹。家常便饭了，你炸你的，我干我的！

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四架美军轰炸机嗡嗡响着，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不十分在意。但对彭总的安全，成普是十分上心的，他匆忙走进老总睡觉的小屋。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总睁开惺忪的睡眼，唬着脸，呛了成普一句：“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好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敌机以后赶来叫老总的。成普就象见到了救星，赶快催他把彭总叫起来。

在志愿军总部里，谁都知道只有洪副司令不大怕彭总。洪学智是个乐天派，分管后勤保障，常常在嘻嘻哈哈中就把正事办妥了。他平时喜欢和老总开个玩笑，这又增加了他们关系中的一分亲昵。他一来，就掀掉了被子，伸手去拉彭总：“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老总笑骂道：“你这个麻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呢！”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拖起老总，在后头推搡着，绕过毛岸英的身旁，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

成普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毛岸英这会儿也登

记、发完了电报。他不吸烟，就从子弹箱里抓了一个大苹果。朝鲜的苹果很多。金日成同志派人送来了一些，志愿军总部又自己买了些，所以作战室里有的是苹果。对于吃苹果，这些参谋人员还能吃出花样来。他们把削下来的苹果皮，放在红热的火炉上烤，烤得焦干，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比吃苹果还有味道。毛岸英现在就这样，把那一圈长长的果皮放到了炉子上。

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成普心里产生了疑窦：敌机刚刚北去又折回，莫非它们搜寻的就是志愿军总部这个目标？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几步跳到门口探头一望——好快啊！那四架敌机已飞临作战室的上空。不仅是飞机，还有上百个银白色的亮点——这不是一般的炸弹！一般的炸弹在空中是墨绿色的点或者褐黄色的点，这是凝固汽油弹，用铝作包皮，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下显得明亮而刺眼。他大喊：“不好！快跑！”话音未落，炸弹砸下来了，光房顶上就掉了好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奔腾涌起，眨眼间蔓延成一片火海！他被爆炸掀起的气浪摔到了沟里，半边衣服烧着了，半面脸上也烧脱了皮，幸好没有昏厥，就地向没有火的方向滚去，把自己身上的火扑灭了。

……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和通信警卫人员，都在火海外围急得连连跺脚，急得溢出了眼泪。灭火和抢救正在进行，但是，火势中心的温度高达八百度，别说冲进去，站在外面都感到一种难耐的灼烫。

“毛岸英！高参谋！”

“高参谋！毛岸英！”

这嘶哑的呼唤，丝毫不能减小那猛烈的火势……

等医生替成普身上的创伤涂上油膏，扎上绷带，他赶到作战

室的时候，警卫排的战士们已开始在灰烬上搜寻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的遗体了。

成普呆呆地站立在废墟前，身上烧伤的部位热辣辣的痛。空气也是发烫的，他觉得眼里衔着泪花，又觉得这泪花很快被火热的气温烘干了，他竟分不清自己是身上难受还是心中难受。

他不能忘记，半个多月前，他和毛岸英肩挨肩睡在一个地铺上，曾作过一次彻夜长谈。毛岸英二十八岁，他也不过三十岁，又都是湖南同乡，谈起来十分投机。毛岸英曲折、艰辛的经历，他也是那个夜晚才具体知道的——

八岁的岸英，就同母亲杨开慧一起坐牢受刑。母亲被敌人残害了。他幸免于难，被党组织和母亲的亲友营救出狱。早已病倒的他，出狱时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然而，他没有死。

四四年夏，他从苏联军政大学毕业，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他头戴坦克手的帽子，胸前挂着报话机，半身探出坦克之外，千里长驱，英勇击敌，穿越了波兰等好几个东欧国家。枪林弹雨，炮火硝烟，随时有可能埋骨在异国的青山之中，然而，他没有死。

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乎和平解放。第二天，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任务是排除地雷、炸药、手榴弹和炮弹，以保证水电畅通、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三月二十四日，正准备吃晚饭的毛岸英接到电话，得知第二天下午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城来。入城后，先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刚刚把室内检查完毕。室外光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有十八公里，加上

围墙外还有敌军的地堡、火力点……时间却只剩大半天了！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老刘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这样吧，我们分成五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和四名战士把手挽在一起，向着死神冲锋。结果，死神退让了，而他却没有死……

今天，这是怎么了？“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勇敢威猛，他还没来得及经历一个壮烈的场面，或用自己的手去刺杀一个敌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倒下了……太疾速、太意外了！令人难以置信！

成普痛楚的心隐隐感到有些后悔，后悔前两天对岸英的批评过于直率。岸英在作战室辛辛苦苦，没白没黑地干了那么多工作，他没有得到过你的夸赞、褒奖，却是受了你的批评以后牺牲的……成普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远方传来一阵沉闷的炮声，成普想起自己还在值班。他向这片烧焦了的土地看了最后一眼，随即大步流星地向作战室新的所在地奔去。

三

在这座山的另外一条岔沟子里，有一个长长的涵洞，那本是一条排洪道，如今成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当成普走进这新的作战室时，他感到这里弥漫着一种异常的气氛。这是什么呢？这是悲痛的沉默！这是愤怒的寂静！空气在窒息，血液在凝固，但静穆中，感觉到火在升腾，恨在奔流。彭老总趴在一张小木桌上，

在写着什么。他走近老总的身边，才看清老总在起草一份电报。那上面这样写着：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老总站起身来，将电报递给值班参谋：“马上发，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人人都铁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就是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成普没有说话，每一个站到值班位置上的参谋也都没有说话，现在不需要说话，需要的是拚命工作，需要的是不间断的指挥，力争把第二战役打好！

邓华副司令没有说话，一向开朗乐观的洪学智副司令也沉默着。刚才，在未得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时，他还对正在包扎创伤的成普快活地大笑：“哎，成普啊，这下可好了，马克思在天显灵，彭老总没炸着，这回我们可以打个大胜仗了，哈哈哈哈哈……”现在，他默默背手站在地图前，似看非看，目光深沉。

韩先楚副司令是个瘦小的矮个子，他打仗很有经验，作风细致扎实，按照党委会议决定，他将被派到前线去，去指挥那一支迂回穿插部队。此刻，刘医生给他注射过预防破伤风的针剂，他站在了彭老总的身旁，轻声地说：“彭总，我要出发了，请你指示！”

彭总的话慢吞吞的，但听得出，话里含着一种能够爆发的力量。

“一定要插到底，不插到指定位置，别回来见我！”

“是！”

“路上不许与小股敌人纠缠，必须不顾一切，迅速将敌退路切断。一天一夜，强行军七十公里！”

“是！”

“插到那里以后，就要象钉子一样钉死在那里，没有命令，不准后退！”

“是！”

“腹背受敌，情况会是很险恶的。你们能坚持多少时间？”

“彭总需要我们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

“那就……出发吧！”

韩副司令象一个不满三十的青年指挥员，他干脆利索地立正、转身，疾步奔出了涵洞，带着几个警卫员，很快消失在山路上了。

电报，又一个电报……

电话，一个接一个的电话……

铃声、喊话声、脚步声，混杂着从远方隐隐传进洞内的炮声，交汇成总部特有的战斗气氛。

彭总是不大抽烟的，这时他叫参谋徐亩元：“广佬，来一支！”徐亩元的烟瘾特大，口袋里总少不了烟。他赶紧递过来一支，并用打火机给彭总点着。彭总猛吸了一口，谁知呛着了，猛烈地咳嗽起来。他气得把烟甩掉，忽然对洪学智说：“麻子，来，下一盘！”

洪副司令迟疑片刻，然后拿来棋盘。此刻，他哪有心思下棋呀！

棋摆开了，毫无战术可言，洪学智走了一步，彭老总竟走了三步，而当洪学智再走几步时，彭总却发了呆。

“哎，彭老总，别下了吧！”洪副司令请求道。

“不下就不下”！彭总哗地一下把棋盘掀翻了，棋子滚了一地……

初冬的夜，充满了寒意，尤其是在这大山之中，更觉清冷。彭总带着几个随员，在小沟里散步。天上的星星仿佛也怕冷，躲躲闪闪的，眨动着眼睛。彭总却连帽子也没戴，还把风纪扣解开，任山野的风吹着他的面颊、脖梗。他背着手，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聊无心绪。他站住了，仰起头来，望着天上的寒星，默默无言，许久许久，才发出了一声长叹：“哎！毛主席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我怎么向他交待哟！”在微明的星光照耀下，他眼里有莹莹的泪花在闪耀。

四

果然如洪学智副司令所料，第二战役打得非常出色。这次穿插部队在韩先楚副司令员的率领下，一个晚上就猛插敌后七十里，在敌南撤与北援之间钉下了一颗铁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进击的两个军，将敌第二次北犯之美、英、土、伪军三万六千余人全部歼灭。正是这一次战役，迫使敌军全线溃退二百公里，退至了三八线以南。美国共和党首领塔夫脱则哀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遭受的最完全的失败。”

志愿军总部早已暴露了，不能再在大榆洞呆下去，于是便随彭总向君子里转移。途中，在一个火车隧道的临时指挥所里，彭总召开了志愿军党委会。

当时，在这一巨大胜利鼓舞下，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都一致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把美帝侵略军全部驱逐出朝鲜领土，我国

国内报纸也发表社论，号召志愿军再接再厉，把敌人赶下大海去。在这一片热潮中，彭总的头脑却十分冷静，他觉得这个仗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一、二次战役歼敌五万余，我军也有不少伤亡，又加异国作战，战线过长，兵源、粮草的补给都很困难，只靠战士随身背的那一点口粮作战，吃完了，仗也就没法打了。遭受重创的敌军也说中国军队是“一礼拜军事”。

有必要休整，有必要立即向毛主席报告！

彭总决定亲自回国一趟，向毛主席陈词，免得用电报讲不清楚。副司令们一致同意老总的决定。因此，等指挥所转移到君子岭，彭老总就带着徐宙元，连夜登车北去了。

彭总来到北京，毛主席不在北京。彭总追到外地，主席正在卧床休息，警卫人员劝老总等主席起来再说，老总觉得不能再等，他拨开警卫人员，闯门而入。

毛主席从床上坐起来了。彭总搬过一把椅子，向主席身边靠了靠，接着就毫无顾忌，剀切陈词，申述了自己的看法。

主席斟酌了片刻，说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志愿军部队的补充，不能采取国内的常规办法，而要采取一种特殊办法，即全国所有部队，都可以当志愿军，轮番出国作战。这样，顺应了全军将士的愿望，又可以锻炼我军各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都去摸摸“老虎屁股”。毛主席又说，新的志愿军部队出国，再把在朝鲜的部队换回来，需要一定的准备工作和时间，也还要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说到这里，主席问彭老总：是否乘胜利的余威，再打一仗？一则如能将敌人再歼灭一部，使之再向后退，三八线我军阵地可以更加巩固；二则为照顾同盟军的期望，也应再接再厉，不惜一战。

彭总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主张，同意再组织第三次进攻战役，随即说：“主席，我向你汇报一下毛岸英同志的牺牲经过……”汇报过后，彭总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他，使毛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主席点燃了香烟，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了眼睛，然后，主席抬起头来，缓慢顿挫地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大事。不能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当彭总走出主席房间时，他一方面为主席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些恼火：因为他看出主席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通知主席说毛岸英牺牲的人。原来，为了怕主席伤心，秘书叶子龙他们征得总理的同意，压住了彭总发来的电报。彭总连连跺脚：你看看，你们要是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五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中南海永福堂。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正坐在写字台前，给周总理写着一封信。

关于如何安置毛岸英同志的尸骨问题，志愿军总部在几天前曾给军委总干部部发过一份询问电报。军委干部部起草了复电，送

交彭德怀同志审批，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彭老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他是个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盛不住，立刻想全盘托出的人，所以吃罢了晚饭，就匆忙拧开了台灯。

动笔以前，他先点上一支烟。

……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牺牲了中国人民多少优秀的儿女啊！这许许多多的烈士全都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毛岸英也不应该例外。主席不是曾经亲口说过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位普通战士！

……而且，作为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象征，作为毛主席本人和中国人民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他也应该埋在朝鲜。他是一座桥梁，架在鸭绿江上；他又是一座丰碑，立在朝鲜与中国人民的心中！

彭总掐灭烟头，提笔疾书：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①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牌，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理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总理接到信后，第二天就在信上批示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同时，将彭总的信转送给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传阅。

当彭总让警卫参谋送走了信件，当周总理批阅文件后拧上了钢笔帽，当总干部部发出的电波飞越了千山万水……

于是，在朝鲜，在平安南道桧仓郡，在志愿军烈士陵园，便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毛岸英烈士之墓。

1983年5月

①志司，即志愿军司令部。

如 胶 似 漆

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我们的主人公爱得奇特，他爱的是胶。千磨万砺而不改初衷。

如果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请翻阅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在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公布的科学技术发明奖中，让我用红笔给您画出来：

二等奖 JW—1 型无机胶粘剂制造工艺及粘接技术，贺孝先及研制组。

一个例证：以一齿而制千钧， 足见无机胶威力之巨大

这故事，发生在《人民日报》刊登那篇消息的前后。

两位壮汉，用扁担抬着一个近九十斤重的圆锥形齿轮，闯进贺孝先的无机胶粘接研究室。

啊，我们是天津市机械施工公司的，两千里“负重行军”，上车、下车、步行，伺候这个“小祖宗”，啊，这是打桩机上的

制动鼓齿轮，管刹车用的，别看不起眼，日本进口，特种球墨铸铁；啊，断了七、八个牙齿，不能用了，请天津焊接研究所焊了两个齿，他们说不能保险……

——怎么不找供货的国家去换呀？

——说不得，要敲竹杠。说他们已不再生产这种型号了，要重新改造流水线。换这么个小玩意儿，六个月以后才供货，美金一万元。

贺工摇摇头，啧啧叹息。

——几万块人民币倒没啥，咬一咬牙就付了。停产吃不消呀！停产一月，损失六十万，六六三百六，您算算这笔账有多少？麻烦您啦，务必要帮助我们粘接上！

他没有再说话，蹲下身来，细细地察看齿断处，心里有点敲小鼓了。难办！这是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接触面愈宽，粘接后承受的压力就愈大，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概念。现在壁厚仅只15毫米，粘上，能吃得住偌大一个吊锤的制动吗？

他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油灰，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

摇头就是拒绝呀！两位天津的同志又苦苦请求起来。——收下，务必请您费心给整治整治。死马当作活马医，千里之行，不易，专门冲着您来！拜个活菩萨，心诚则灵，行行好！……

他很感动，又觉得艰难，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异样的感觉冲撞心头。是什么呢？唔，是对外国资本家要敲竹杠的气愤。干，争中国人这口气了！

“住下，先到招待所去住下，让我考虑考虑。”他把来人送进招待所，然后来对付他们送来的难题。

两个小时，忘记了吃饭，方案拿出来了：底下掏个浅槽，用螺钉固定一个辅助切片，再用胶粘……

全研究室的同志一齐上阵，叮叮当当，花了八天时间，所有断齿全部粘接好了。然后，把这两位同志找来。

——可以交货了，拿回去用用看，不行，再来找我们！

千恩万谢，两个壮汉又用扁担把这家伙抬走了。

数字很简单，但绝不枯燥，能说明一个大问题：

六个月比八天。

一万美金比三百元加工费。

一个半月以后，使用单位寄来了一封感谢信，说经过这段时间试用，效果很好！在此深表感谢！他们没有备用件，一天到晚用的它……

打桩机上的吊锤究竟有多重，恐怕在千钧之外吧？以一齿而制千钧，足见无机胶威力的巨大。以此来观察贺孝先这项发明在经济领域的作用，这不是管中窥豹么？

他用胃舒平意外地治疗了他的无机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白天几乎是大同小异的：而夜晚却各各不同。

奥勃洛摩夫们枕着鼾声酣睡，他们不仅睡掉了夜晚，也睡掉了白日；恋人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朦胧遮掩了羞涩，夜风吹熟了爱情……而他，与此都毫无缘份。摆脱了教学与会议，摆脱了繁忙与杂乱，他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研究了，翻阅资料、搜寻方案，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从六二年到六三年，他就这样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从黄昏直到黎明。也许那圆了又缺的月亮，都记住他忙碌了多少个不眠的夜，但还有那些没有月色的夜呢？

因此，应该为贺孝先同志先唱一支“小夜曲”。

他这个哈军工机械工艺教研室的讲师，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切削特种钢部件，需要陶瓷刀具，怎么把刀固定在刀柄上呢？陶瓷和钢铁，既不能焊，又不能铆。

酚醛树脂、环氧树脂买来了，他把这两种不同类别的物质粘接上，然后在飞速的车床上接受考验。然而，一种有机胶又一种有机胶败下阵来。它们都不耐高温，在高速磨擦而产生的高热中，灰飞烟灭了。一个机械系的教师，遇到了一个化学问题。

象水泥那样有多好？灰、沙、水，一调合，天把就干了，连火也不怕。要能发明一种胶——“水泥胶”有多棒！

幻想是科学发明的母亲，他在幻想中“十月怀胎”了。

他只得求助于八小时之外，黄昏、深夜、黎明，那是他的休息时间，可以随意由他来拉长与缩短。

他珍惜每一天的黑夜，是因为他憎恶旧时代的黑夜，是因为热爱祖国的灿烂的白日。不错，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旧军官，但四八年就失业了。四八——四九，五更寒，全家靠变卖衣物度日，他尝够了饥饿的滋味。熬到解放，才得以拿到甲等助学金，上完了三年大学。一颗、两颗、三颗，肩膀上，一直给他按上了四颗耀眼的“金豆”。他感党的恩，懂得埋头苦干，作出成绩，才是一种报答。三十二岁，火红年华，他把青春的炉火烧得通红，照亮着生活里的每一个暗夜。

找遍了一切中外资料，只提炼出这样一句话：金属氧化物和磷酸作用，有一定的粘合力。但对于他，这句话就是闪光的起点。

从此，家用煤炉子上，天翻地覆了。小烧杯、三角瓶，各种各样的试剂——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拿来试一试。他采用一个原始的办法——筛选法。钾钠钙镁铝锌铁，都排队前来接受检验。

煮呀，搅拌呀，粘接呀，每一个环节都注意到了，就是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环节——煤炉子还要煮饭和炒菜。

啊，请不要忽略那是个什么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一条“左”的路线，饥饿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他是机械教员“客串”化学研究，许多设备、试剂都要靠自己掏钱来解决，那是孩子嘴里的奶粉，他和爱人口里的肉食呀！他旺盛的食欲，常常和旺盛的研究欲纷争不息，一个拽住理智，一个拽住感情。饥一顿，饱一顿，严重的胃病，就是他过于吝啬的结果。

妻子是化学教研室的实验员，不但理解他的行为，还成了“贤内助”与“贤外助”。不过，当他闹腾得连“家计民生”都毫不顾及的时候，自然会不免发出几句口头“照会”。

那究竟是哪一天的深夜？面对自己调制好的胶，继续实验，结果依然是失望，他有点吃不住劲了。失败的懊恼与胃病的疼痛同时袭来，这时候，对他的胃的最好的安慰是给两片烤焦的馒头。可是，他没有，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那有多余的来当夜餐呢？妻子偶尔也为他烤上两片，但当他一看到孩子们那瞪着凹陷的大眼、咽着唾沫的可怜相，就赶快偷偷递给他们了。他是空着肚腹在进行一夜又一夜的拚搏的，现在，胃开始向他提出强烈抗议来了。他只得拉开抽屉，找出两片胃舒平，并倒上了一杯开水。

瞎撞？灵感？还是故意要对自己的失败进行惩罚？至今他也说不清楚。有时总结一个人的经验，可以条理成甲乙丙、ABC，而复杂的现实却并不见得被解释清楚，因为那是XYZ。——他没有把药片投进自己的胃里，反而气恨地投到了胶中，还倒了点水，冲化了它。结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胶的粘接力明显增强了。啊，奇迹！奇迹！那带着稚嫩的第一代无机胶，就这样诞生了。

他快乐得象一个疯子，大喊大叫，拖起在床上熟睡的妻子，指给她看试验里的曙色。严重的胃病，没有被药物，却被快乐抑制了。

他的初步成功确有偶然的成份，但那是一年半之久的数百个必然，换来的这一个小小的偶然。

他身上缺少太多太多的“卡路里”，而在研究中，发出的却是十倍、百倍的热量。

小权威们企图割断他与科研的连结，但这种无机胶般的粘接反而更加牢固

毋庸置疑，当他坐进这间会议室的第一秒钟起，他就是准备来听表扬的。胸中冲撞着一只欢蹦乱跳的“小鹿”，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采，刚刚取得巨大成功所溅起的激动，还在他心海里继续扩展着层层涟漪。

——好啊！太成功了，贺讲师，祝贺你！

——谢谢，谢谢，为我们制作出这样好的刀具！

但是，也有另一种声音：

——不行！这玩意儿根本不行！

他恍若置身于天山脚下，“朝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一天，不，一小时内经历了一个寒暑。刚赞誉不绝，又遭全盘否定，太——不可思议了！

不，他这个人并不重视别人的表扬与批评，但，今天对于他，这种表扬与批评却颇有点“一言九鼎”的味道。

他的无机胶能否打向社会，这是第一个回合，象大学毕业生的论文答辩，象唱大戏第一次登台演出……那心情，自然是忐忑

不安的。哈尔滨科协替他组织了这一场表演、这一次学术讨论会。他聚拢全部的听觉神经，只想捕捉住一个字：行！而万万不愿听到两个字：不行！

一根八十厘米直径的大钢轴，架在车床上，硬质合金刀卸下了，换上了用无机胶粘接的陶瓷刀具。

三转，效果很好！

“师傅，请您再提高点转速！”

“多少？”

“十六转！”三个字是从他牙缝里蹦出来的。

用硬质合金刀，速度都是每分钟三转，这下，是原来的五倍多了……是不是听错了？操作的师傅疑惑地看了他一下，手按在转速开关上，犹豫不决。

他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大轴飞转了，带起了一股旋风。

好！——他暗暗叫好！

好！——站在他身后一群参观者七嘴八舌地叫嚷开了。

“师傅，最大速度是多少？”

“四十八转。”

“就打到四十八转上！”话语平静，内心极度紧张，这是指挥员下达“豁出去了”的命令。

“啪，”开关拨停，工人师傅脸上冰冷：“出了事，我担不起！”

一根大轴，十几吨重，车废了，多少钱？每分钟要转四十八圈，万一飞脱了，砸了人，谁负责？小兄弟，你是太毛愣了吧？

——哪，谁能负责？

——找车间主任说去！

要找到车间主任容易得很，因为他就在人群里看表演；可要他立即拍板应允，也真有点勉为其难。过去，连十六转都没有敢想过，更不要说是四十八转了。十五倍，整整提高了十五倍转速哪！

保证、恳求、解释，主任终于答应试一试看了。他也希望，虽然他没有敢希望过。

开关打到极限转速上，大轴狂旋起来了，在大轴的周围，卷起了两股风暴：巨轴转动的风暴和人们感情上的风暴。

“嗤嗤嗤嗤”，刀具与大轴的接触处溅起了一片火花，这飞落的火星儿把贺孝先的心烫着了：糟！莫不是刀具被烧坏了吧？怎么办？釜已破，舟已沉，老虎已骑在胯下，没办法了！还是……闭上眼睛吧！

三十分钟，一刀到头，卸下来看，刀具并没有磨损多少，参观的人兴奋得嘁嘁嚓嚓，议论不息。最高兴的还算是这位工人师傅；这下可够水平的，过去两天的工作量，半小时拿下来了。

胜利之师凯旋而归，就应该欢庆、授勋、碰杯，自古皆然。

然而，他听到了什么？是一阵不屑一顾的蔑视。

“我听了报告，也看了刚才的表演，我必须指出，你那玩意是不行的！”这是一位小权威，在他面前，堆着一大叠外国杂志，看来，他是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他顺手抽出一本杂志，翻开早已折叠出来的一页，气壮声粗地质问：“你的各种参数是多少？”

另一位更加放肆，站起身来，用手指着贺孝先的鼻子尖：“苏联是十，你是一，你说，究竟十大还是一大？”

倒象是一次有组织的围攻。第三位接着发言：“这种胶黑不溜秋，要能粘住，我和点碱面也就粘住了。”

——总不该不讲点礼节礼貌吧！不错，听说你们也在搞，这

又有何妨碍？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碍你们的事啦？

——外国是十，就不兴中国是一百？一百大还是十大？告诉你们吧，我就要做一百，现在还达不到，但将来要达到。早就有这份志气，要把这项研究打到世界去，让外国人看看，祖冲之、毕升的后代，还是比外国人强！

心里有气，还得注意点修养，贺孝先平静而谦虚地回答道：“这种胶我刚开始搞，没有经验，回去后再继续实验，力求更符合实用。”

“这玩意儿没有搞下去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它根本不行！”

“我决心继续搞下去，要是行，你们怎么讲？”忍耐到达了极限，口气开始咄咄逼人。

“这玩意儿就是行了也不行！”对方更蛮横。

“那好，咱们走着瞧！”

会议的主席感到尴尬，会议开得顶了牛，双方剑拔弩张，怎么来挽回危局？

墙旮旯里坐着一位五十来岁老车工，他开始发言了，声音低缓平和，象是跟谁也不搭界，“会议主席，让我讲几句。我看了表演，也听了报告，感到这种胶还怪不错的，准备要点回去用一用。”他把脑袋侧过来，仿佛和这几位小权威商讨：“我和你们几位协商，如果你们发明比这更好的胶，我再用你们的，怎么样？”

说得那几位哑口无言！

贺孝先心里热乎乎的，泪花在眼睛里直闪。他打向社会的第一次交锋胜利了。

生活也断裂了，他用无机胶 把信念粘接在生活上

他的生活和科研都在这个时候里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这是一九七〇年，许多老干部、科学家一想起它就会心有余悸的年头。他，行政十七级，哈工大卓有成就的讲师，被处理到江山机械厂去当一名工人。身子下去了，但“臭老九”的成份丝毫未变。

中国大地已容不下一张设计桌或者办公桌了。——而这位“贺老九”，压根儿就没有办公桌！厂里没有，家里更没有！开始，他睡“干打垒”的大仓库，几十人挤在一起。后来，条件略略改观，分给他两间土坯房，没有门窗，不事粉刷，屋内的草和屋外的草一样葳蕤。晚上睡觉，必须用几只木箱把门堵上，枕头下再放上一把切菜刀。这一带是山区，半夜常能听到野兽的嗥叫声，哪能不防着点呢？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住，一张办公桌，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及的一件奢侈品。

中国大地也已堵塞了知识分子科研的道路了——而这位“贺老九”，到工厂去上班，要翻过一座荒凉的山包，全凭他和工人们寻路走。南方多雨，半夜里下班回来，拄一根树棍儿，卷起裤腿，“扑哧扑哧”的烂泥拽鞋根，摸回家中，不知要摔多少交子。

——你看，厂子新建，任务紧，老工人没调到，听说你有实际操作能力，去干车工吧！

包装箱还没有打开，军代表就来布置工作了。他以为这是一种信任，第二天就上班去了。

——你过去是搞刀具的，现在我们刀具很缺，怎么样，专门组织个刀具生产小组吧！由你负责。

三个月后，由车工荣任组长。

七二年，他又荣幸升了一级，被分配到“非标设计组”当技术员。

六二年的大学讲师，到了七二年反倒成了技术员。时间在前进，历史在颠倒！

按照那时“造反派”的语言来说，他仍然“贼心不死”。八小时工作之余，他开始悄悄地、隐蔽地“贩卖”他的“私货”了。他在自家的煤球炉上熬了些胶，谁家的自行车杆断了，他主动帮着去粘；谁家的缝纫机踏板坏了，他也帮着去粘；粘刀具，粘工具，样样都干。一次，附近生产队的变压器漏油了，生产队求到厂里，他自告奋勇要去粘。

“是不是通知供电所，切断电源？带电作业，太危险了！”生产队干部有点儿担心。

他乐哈哈地开了一句玩笑：“没关系，我是爱迪生的信徒，爱迪生又是电的祖师爷，所以电不着我。”他带电作业，把变压器补好了。

襄樊市科委的鄂主任，老贺永远感激他，这个领导不简单，有魄力，有远见，在七四年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竟敢特意为贺孝先组织科技讲座会，让他去讲无机胶的粘接。

三百多个人听了三个小时，听众轰动了。从那时候起，老贺和他的无机胶“誉满襄樊”。他，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鄂主任不但在理论上为他鸣锣开道，还主动揽活，让他在实践上大显身手。

一天，襄樊市铝材厂来了两位同志，带来了鄂主任的亲笔

信，贺孝先很快弄懂了来意：铝材厂是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厂，全靠一根轧辊把铝锭轧成薄板，抽成铝丝，然后制作电线。现在轧辊断裂了，等于轧断了全厂人的饭碗，他们怎能不焦急呢？两人带着信来搬救兵，希望老贺前去“救驾”。

贺孝先连画了两份图纸，托人捎去，因为他活计正忙，脱身不开。

待他过了几天赶到现场，才知道自己闭门造车，画的图纸和实物有出入，幸亏一位老工人帮他更正了。老工人说：“我听过你的课，知道怎么干！”

轧辊粘接成功了，接着开始试轧，谁知又生波澜。一位拿大钳送铝板的青年工人，也许是太紧张的缘故吧，把大钳也甩进了轧辊里去，轧辊超过负荷，轧不动了，全场一片慌乱，只得紧急关闭电闸。

老贺听到“咔嚓”一声，知道不好，心被提到了嗓子眼上，等到关了闸，赶快去看轧辊，他的希望与恐惧，全系在轧辊上了。

啊，奇迹，又是一个奇迹，轧辊安然无恙，那把大钳却轧变了形状。

厂领导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乐了，拍着贺孝先的肩膀打哈哈：“老贺啊，坏事变好事，证明你的无机胶粘接是过得硬的！”

贺孝先用他的无机胶，不但粘接了断裂的轧辊，也粘接了自己的信念，粘接了生活中的裂痕。

这以后，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不但帮助粘接了钢铁公司的轧辊，还粘接了部队的坦克、火炮和高射机枪，他就象他的胶一样，去粘接社会经济领域里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而且颇具成效！

他没有把自己粘接在荣誉上，而是 粘接在新的创造发明之中

《人民日报》在公布评定结果的消息后面，还附加着一小段说明：

从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如无人提出异议，即正式颁奖。

在“四人帮”把党风民风破坏得一塌糊涂，直至今日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刻里，成功也将是一大不幸！

无机胶经过贺孝先多年的传授和推广，在祖国大地的各个领域里运用已很为广泛了，这广泛引起了发明权的模糊，这模糊又容易让某些人浑水摸鱼。

有那么几个人跳出来了，向五机部写信，说无机胶并不是贺孝先搞出来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但如此，个别人还对贺孝先进行了品行上的诋毁，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不好！而且，他们还拿外国来压中国，说这种无机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外国早就有了！

信转到了江山机械厂，不，还有些信是直接写到江山机械厂来的。不辨真伪的人们对贺孝先另眼相看了……嗬嗬，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一个伪君子！

本来已经被评为本厂优秀党员的他，名字从那先进的行列中删去了。

他并不想争个人的一日之长，党给他的荣誉和奖励够多的了。但是，泼在身上的污水必须洗清！他即便不作为一名发明家，也要作为一个正直清白的普通人而存在、生活！

尽管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但在他走上领奖台之前，

必须摧垮横亘在他面前的三道栅栏，由嫉妒者谎言筑成的栅栏。

他只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向谎言者应战！

——是不是剽窃，他向五机部交出最原始最过硬的证明材料来了。那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哈军工授予他荣立二等功的通令，上面写着：

“贺孝先同志发明了化学无机胶，运用面宽，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据查国内外资料，尚未发现这种粘接剂。由于成绩显著，特授予贺孝先同志二等功，以资鼓励。”

五机部的一位领导看了这纸通令以后，一拍大腿说：“这不妥了吗！是你的发明，谁也抢不去！”

——至于外国有没有这种无机胶，贺孝先向审查的领导和科学权威提供了一本书。这是英国的粘接专家 S·塞默德杰夫一九七一年的专著，书名叫作《金属与金属的胶接》。书中对有机胶的粘接作了详尽的介绍。至于无机胶，著者武断地下了一句这样的评语：

“无机胶粘接，例如磷酸盐类硅酸盐类，因为它们不适于粘接金属，故不予讨论。”

正是在英国专家专断与托大所留下的罅隙中，贺孝先找到了突破口，杀将出来了。

他终于走上了领奖台！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开幕之时，他还坐在主席台上，与国家领导人和科学院负责人坐在一起，他的位子，就在那大国徽的下面。这是他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荣誉！

他没有把自己粘接在荣誉上，而是把自己粘接在新的创造发明之中。他记得是弗希特说的：“科学家一旦作出成绩，就应该忘记自己所做的事情，而经常去考虑他还应该做的事情。”是

的，那是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晚上，有的代表准备着离京了，有的代表出去逛大街了，而他，就着不亮的灯光，趴在床上，画开了对大庆钻头进行改进的草图——一个发明家对大会精神的最好的体会与贯彻。如今，面对荣誉，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向党这样说了：在您号召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已经为许许多多油田、煤井——祖国能源的开发，设计好了第二代的钻头，它的效率和使用时间，可以比第一代钻头提高一至三倍！……

对于科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位中年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真可谓如胶似漆！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北京

爱，和他们一同进入角色

——记扮演毛、刘、周、朱、任的演员们

大幕徐徐拉开了。

党正在和人民群众欢庆“七大”的召开。

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前的广场上，此刻正被一股热烈欢腾的情潮所卷裹。来自各方各界的工农兵群众和年青的学生们，带来了衷心的祝贺，也带来了热情的歌舞。跑驴、玩旱船、打腰鼓，陕北特色民间风情的喜庆方式在这里一览无余。“伞头”是群众欢庆队伍的天然领袖，他举着的那把伞就是人们公认的指挥棒。他用伞打出各式各样的动作，队伍和群众的舞姿也随之变幻。在“七大”中选出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来到了群众中间，把这一次庆引向了高潮。毛泽东一边鼓掌，一边向群众招手，他抱起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周恩来和任弼时兴致盎然，和群众一起扭起了大秧歌。朱老总激情按捺不住了，他捋起衣袖，接过鼓锤，亲自擂鼓助兴——仿佛如古代大将军，亲自擂鼓将兵。而这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满怀喜悦，站在一边，兴致勃发地交谈着、交谈着……

“好！好！”台下有个人忘情地喊了起来，他是习仲勋。他被这逼真的欢腾亲切的场面带进了那个年代，他的思想早已进入

那欢庆的情景中去了。余秋里同志正伸长脖颈，聚精会神地观看，杨尚昆同志情不自禁地鼓开了掌……

这是在万寿寺的中国剧院，《中国革命之歌》在彩排欢庆“七大”胜利召开的段落——《胜利鼓舞》。这和当年一样的乱真场面和情绪当然应当归功于导演和演员的再创造，但人们不得不同时赞叹：这几位扮演领袖的演员确实太象了。

《中国革命之歌》把领袖的形象搬上了舞台，这比起二十年前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这样的场面在新的大歌舞里出现了若干次——《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胜利鼓舞》、《开国大典》。如果说，每场每段是一排排巨浪，这几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场，就是飞翔在巨浪上的朵朵浪花。领袖形象的出现，为大歌舞这匹锦缎，添了几朵艳丽夺目的花。

这不能不归功于那几位扮演领袖的演员们。

一、爱 之 由

每一个演员，总要爱自己扮演的角色，才能进入这一个角色，无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是布莱希特，或者是梅兰芳，全不会反对这一点。哪怕你扮演的是反面角色，也总要细细体会他的狡诈、奸险的内在动机，才能维妙维肖地表演出来。

扮演领袖的演员们，还要多添一重的爱，那就是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这种爱并不是从他选定这一角色才开始的，是他们作为中国这片国土上人民群众的一员，自然而然地激发出来的。

王铁成对周总理的爱，突出表现在总理逝世的那些日子里。

这是一次全国的悲恸，风云为之变色，江山为之易容。天安

们广场，一霎时变成了悲怒的海洋。中国话剧团的编外队员王铁成，连着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来了。他胸佩一朵小白花，拥挤徘徊在躁动的人流之中。倾听着激昂的演讲，他也差点儿要呐喊出声来；抄录着和血和泪的诗词，他的心也在滴血滴泪；对着被花圈堆掩的烈士纪念塔，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总理呀，您去世了，中国会怎么办？中国革命会怎么办？中国还有希望吗？现在，我们正需要您呀！……

他被一对贼骨碌碌的眼睛盯上了，也许他已被写进了黑名单之中，但他全然不觉得。去了几次天安门，回到他居住的东四演乐胡同那破旧的四合院平房里，心绪更不能宁静。他患着早期的肝硬化病，一悲一愤，肝区就更加疼痛了。他一手捂着右腹，取出他的日记本来——象焦裕禄坐在藤椅里一样，在那上面写下了这几行文字：“周总理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人民在自己心中为总理建立的丰碑是任何人也推不倒的。……”

悲恸终于使他病倒了。

他的思想却没有病。他卧在床上，望着悬挂的那张周总理的遗像，健康的思想开始如野马奔驰——

总理再也活不过来了，要是自己的生命能换取他的生命，那该多好？不能在舞台上塑造他吗？让人民群众再看到总理的形象。在苏联，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都可以用演员来扮演，后人们正是从这些演员身上来理解他们的领袖的。我自己就是个演员，为什么不能在这一方面尽一份力？哎，在中国，在现时，即使你挺身而出，谁敢让你上台呢？一上台不就捅了那一伙人的马蜂窝啦！——还是，先把这一念头埋在心窝里吧！这是种子，但现在还不到发芽的时候，不到……

尽管如此，但在他病愈之后，他就开始暗中收集有关材料，

偷偷在家里试装，寻找着自己外形上与总理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他在等待着那一个时机，以便一朝能让自己呼之即出。

终于，人民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天安门前人们的预言实现了。他兴奋得几夜不能成眠，尽管肝病不宜于喝酒，他还是端起酒杯。

一九七七年元旦之夜，王铁成又想到了总理。一年了，“四人帮”粉碎了，总理啊，你的英魂得到安息了。我，今夜写一首小诗献给你，也激励我自己：

哀音一年朝暮闻，
思念总理泪满身。
悲痛化作无穷力，
总理教我学做人。

这年七月，中国话剧团青艺队准备排演话剧《转折》。这是我国第一出塑造总理形象的戏，经过试装、试戏，团里决定：由王铁成扮演剧中的周副主席。

深藏的愿望终于破土而出了，小苗的倔强和土壤、气温的适宜构成了生长的条件。他决心用全部的爱、全部的感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竭尽全力塑造好总理的形象。

化妆师刘玲为王铁成精心化妆，当王铁成的形象渐渐隐去，总理的形象渐渐明晰的时候，化妆师止不住眼圈发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

“怎么，你——”王铁成有些惊异。

“不，没什么，你很象总理，我一见总理的形象就想哭。行，就这样定了！”

轮到他对着化妆镜细细端详自己了，他看着看着，泪水止不住也掉了下来：“难道，我的愿望真地要实现了？”他捏了捏自己的脸，觉得这是现实，而不是梦。他又破涕为笑了。

排练确实够紧张累人的，七月底下达任务，八月下旬就要连排。幸亏他偷偷作过准备。但即便如此，他也感到艰难，感到吃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不仅要使脸型、身形都象总理，还要在动作、语言和精神气质上也酷似总理，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事后，他这样回忆道：“光讲话一项，就把我难坏了。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淮安方言里二声变一声的多，一声变四声的多。

‘哼’念成‘嗯’，知、蚩、诗变成资、雌、思，卷舌音变成平舌音。同志们的‘志’说成‘字’，再加上发音的音色不同。我必须对着周总理的录音一字一句地细细推敲才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能够上台演出了。可就在首演的当天，他发开了高烧——过度的劳累折磨使他又病倒了。但决不能为他一个人推迟演出，他决心爬也要爬到舞台上。他化好装，精神抖擞地走到台前——象一个病兆全无的健康人一样，不，比健康人还要精神十足。

观众沸腾了，剧场骚动了，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要看看他们心爱的“周总理”，有些人竟拥到了台前。哭声——低低的抽泣与呜呜的痛哭交织成一片。散场了，许多人都不愿离去，他们还想多瞧几眼这位“周总理”，这位扮演者。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泪眼发呆，盯着近在咫尺的“周总理”，想哭又想笑。

扮演毛泽东同志的古月，则是从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中日益理解和加深了对领袖的爱的。

他原名叫胡学诗，是武汉市人。一九四五年日寇飞机轰炸武汉三镇，父亲在逃难中被罪恶的炮弹炸死了。母亲又和他失散于逃

难的人群之中，是姐姐胡敏带着他逃到了广西桂林，被孤儿院收养了下来，孤儿院搬迁到南宁，他们也来到了南宁。四九年，二野四兵团十三军文工团驻扎在南宁，需要几个小演员，姐姐胡敏被挑中了。但姐弟俩不能分开，古月于是也参了军。这个小演员行军常好掉队，只得让他拉着马尾巴走路，有时干脆把他抱到马背上去。他在马背上还照样睡觉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革命队伍的。

他穿一套特制的小号军装，开始在文工团里敲木鱼儿。《白毛女》这出戏太长了，他开始还蛮有兴趣，但终于抵抗不住瞌睡的进攻，他敲着敲着就睡熟了。大人们只得把木鱼儿接过来，又给他盖上一件大衣，让他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戏演完了，才把他从甜梦中喊醒。

他不喜欢敲木鱼，喜欢画画，领导就把他调到了美术分队。他渐渐长大，学习也用心了。学起画来，连午休也不休息——在他的精神与瞌睡的战斗中，渐渐有了胜利的记录。

五一年，他画了一套反映一个游击英雄的淡彩平涂的连环画，获得了昆明军区的奖励。五三年，又有一幅画《命中三十环》，获得了军区优秀作品奖，他连着几次参加了全国美术展览，还被吸收为云南省美协会会员。

他到昆明军区政治部机关来从事文化工作了。大量的实践把他培养成一个多面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无所不晓。到一九七九年，他已经担任了部队的文化科长……

他是个孤儿，他的生命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给的，他的艺术才能也是军队培养的，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就没有他古月的今天。因此他学画的第一幅习作，画的就是毛主席的像，他对主席的深情，是没得说的。但他与王铁成不同，他没有当过演员，也从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有朝一日可以

由自己来扮演毛主席。

就在他当科长的任期内，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剧作家胡可同志来到昆明军区了解文化工作，他接触了古月，觉得他和毛主席的形象很接近，就说道：“怎么样？我推荐你到八一厂去演毛主席吧？”

古月有些迟疑：“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四十多岁了，再学戏能行吗？”

“扮演毛泽东同志，这可是个意义重大的事，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不妨试一试。”胡可同志有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

“不是我不想，是我不敢，既然你说行，那就试试吧！”

他交了一张生活照和一张造型照，让胡可同志带往北京。

八一厂经过照片审视和当面试，非常满意，导演史文志说：“我接触过四十多个扮演毛主席的，数古月最象。”照片和材料送到了叶剑英同志那里，叶帅在古月的照片上大大地画了一个红圈。古月“吉星高照”了。八〇年，他被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刘少奇的扮演者张汉均，今年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他在电影《风雨下钟山》里，只有七、八个镜头，十分有限的几句台词，他同样是用全部身心和全部的爱去作艺术处理的。

西柏坡，中央领导同志在作打过长江去的准备工作。

周恩来：“打过长江去，我们准备了一百几十个师。”

刘少奇：“只要有一部分占领滩头阵地，就好办了。”

朱老总：“上海可不能打烂呀！”

刘少奇：“上海是我们的精华所在。”

每念到这里，张汉均的心不由自主地一动，他敬佩刘少奇的精辟预见，话语里满含着感情。他常常这样想：少奇同志说得多

好，幸亏他和朱老总，要是把上海滩打烂，我也可能不会有今天了。

他祖籍浙江宁波，从小就在上海当学徒，满师以后，才得以在皮革厂当个小小的店员。他酷好音乐，却没有钱买乐器，只得去买花钱最少的口琴，他是吹着口琴进入音乐界，参加了职工乐团的。

上海刚一解放，他就专门跑到虹桥一位同事家里去打听情况。

“解放军打烂了你的东西了没有？”

“一点儿也没打，拆房子、乱放火都是国民党军队干的。解放军借了我一把锨，用完就还了。”同事说。

那时，他只是佩服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的态度好。等他参加了《风雨下钟山》的拍摄，研读了许多史实资料之后，才了然中央对解放大上海早有了英明的预见和方针，他不能由衷地产生感激和敬佩。

他为能扮演刘少奇同志而自豪。

对于任远远来说，是不用询问他什么原由爱自己所表演的角色了，因为任弼时就是他的父亲；但可以询问他为什么爱这样的场景和氛围，因为他四〇年降生于延安的窑洞，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到六岁。

一九八三年之秋，在他来到大歌舞担任这一角色之前，他又重去了一趟延安。不是为了担任角色的需要，前去深入生活，是由于他母亲、八十岁的老人陈琮英为了在晚年再亲一次延安之土、重温一次延安之情，带着他与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儿子任继宁、女儿任继南，老少三代人——象是余太君挂帅出征——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延安。

他去瞻仰烈士陵园，他去参观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妈妈是他的讲解员，他又是儿子和女儿的讲解员，讲他童年的欢乐，童年的梦。

“记不记得？咱们在枣园的幸福渠边生活了四年，一次，你掉进水里了，浑身湿透。你爸爸还笑你呢：‘远远，是不是想游泳了？’”

他咧开大嘴笑了。儿子和女儿则在笑他。他们拍着小手：“哎呀爸爸，你小时候和我们一样淘气呀！”

他自己想起来了，在那棵老树下，他捉到一只刚会飞的小鸟，大鸟在树枝上冲着他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爸爸说：“你看，鸟妈妈在想它呢，把它放了吧！”他把小鸟抛上了树，小鸟跟妈妈愉快地飞走了。

他们还瞻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大礼堂的墙壁上还挂着“七大”时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的标语。主席台正中的桌后，摆着五把椅子。这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的座位。他与他母亲在台下的长椅上坐下，静静地回忆、默默地沉思：人民和党多需要一个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党中央呀，需要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勇气和气魄，需要那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的唯物主义精神！……

从延安返回北京，他就接到了邀请他到大歌舞里去参加演出的通知书。说实在的，他是极想来参加演出的。那些伯伯、叔叔们都说：远远不用化装就象当年的任弼时。但儿子扮演爸爸，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外界舆论将怎么说？他有些踌躇了。

拿着通知单，他来到母亲身边，妈妈又找来了姐姐，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议是严肃郑重的，决议也同样严肃认真：鉴

于以前几部电影里任弼时同志的形象都不够理想，为了塑造好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任远远应该丢掉个人的得失，去大歌舞里试一试。

二、爱之路

任远远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先是分配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后又分到了部队研究所，如今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对文艺接触得不多，对表演艺术更是一窍不通。因而一到大歌舞里，他就把自己的担心向导演托出来了，他怕演不好戏，辜负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三场导演黄伯寿和佟左尧一听，反而高兴得大笑起来：“不会演戏就更好了。欢庆‘七大’胜利的群众场面，生活化一些更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可惜在表演之初，任远远还不懂得这一点。

但是，是艺术，哪能完全不要表演呢？在这场戏里，就需要他和群众一起扭秧歌。在延安，他倒看见别人扭过，可那时还太小，光顾得一个劲地玩了。现在他连秧歌也扭不来。排练后回到家里，他只得聘请爱人和孩子当“业余教练”，帮他补课。他身体胖，腰腿又硬，左弯右扭地闹腾了一阵，出了一身大汗。爱人那里还好通过，儿子女儿却特别认真，特别挑剔，决不轻易点头发放“通行证”。

有一次，他带着爱人和女儿去看他的连排，回来的路上，小女儿就十分严肃地向他提了两条意见：“爸爸，场上有一个小女孩，毛爷爷还抱抱她呢！你得对她热情一点儿，还有，你别老靠在那里呀，那太死板了。”他不能不佩服孩子眼光的真诚、锐

利。他连连点头：“好好，下次爸爸就改正。”

扮演朱老总的王伍福，碰到的难点恐怕要比任远远更大一些，因为任远远在这段表演里不需要什么台词，而王伍福，则确实需要台词，需要表演。

他十三岁就在天津的儿童剧团当小演员了。六五年入伍来到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之后，正面的、反面的、老的、中的、青的角色都扮演过。在电视剧《人逢佳节》里他演连长，在另一个电视剧《罗湖桥头》里就扮演冒充港商的特务，在话剧《岗位》里，就扮演转变青年老二。他戏路子宽，学演戏极其认真，八一年与八二年就连着立过两个三等功，这自然都是有利条件。但要他这个三十六岁的青年演员，去演一位六十三岁的元帅，无论在外部动作的模仿和内在气质的训练上，都需要很下一番功夫的。

他热爱朱老总，但并不十分熟悉他。要说知道，充其量是上学时读过《朱德的扁担》和《我的母亲》，大体知道他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百万军中的统帅等等，要靠这一点点了解来扮演朱老总，是决计不够的。八〇年，战友话剧团决定演出《平津决战》，由他担负扮演朱老总的任务，他就忙碌开了。到中南海参观，到军事博物馆“五大元帅展览”室去听讲解，到历史博物馆去抄资料，还去了延安、西柏坡，深入和熟悉那时候的生活。他把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捧住了不放，一遍又一遍地细读，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了。他通过这一系列的了解，给朱老总总结了四句话——农民的憨厚、慈母的心肠、儒将的风度、大丈夫的气魄。他就是由博而简，从这四句话进入他的角色的。

对他而言，最大的难关是语言关。他过去一口天津话，后来掌握了普通话，就是不会说朱老总讲的四川话。幸好，战友歌舞团有一位司机小廖，是个四川人。他揪住他不放了。他让自己的台词

叫小廖一句一句地念，录进录音机里；他又一遍遍地学。等学得差不多后，又把自己的话录到录音机里，送去让小廖纠正。这样反反复复多次，终于把语言关拿下来了。

习仲勋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看了他的演出，都说他演得象。因为他年轻、健壮。

已超过花甲之年的张汉钧，要演好刘少奇同志就更不易了。

他右腿囊肿，原来想去动手术，大歌舞让他来演出，就决定不做了。可是排练时间一长、身体一累，那条腿就酸疼得不行。另外，他的背有点驼，而少奇同志则是挺胸健步的。为了纠正自己的缺陷，他坐沙发、坐椅子尽量靠里坐，锻炼自己的腰部挺直。每天黎明，他都要到什刹海边上，挺胸健步走上一个小时。送外孙女上学，他也那么走，外孙女只得不断向他提警告：“姥爷，走慢点，我跟不上了。”他决不走慢，要不然就停步，稍微等一等她赶上了他再走。

他先是中央歌舞团的乐手，后来当演出干事，虽然混迹于艺术界，但也象任远远一样，从来没有演过戏。让他扮演刘少奇，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七九年，八一厂导演严寄洲正在拍摄《二泉映月》，要求中央歌舞团配音，他这位演出干事在与严导演的接触中，被导演那时时都想挑选人的眼光看中了：“老张，等少奇同志平反以后，请你来拍电影吧。大家都看上你了。”

八〇年八一厂拍摄《风雨下钟山》，导演袁先和副导演里坡果然把他请了来，让他演刘少奇。

他是久经舞台考验的，所以再强烈的灯光也不怯场，这一点他倒比任远远略胜一筹。但论起表演来，他同任远远一样笨拙。笨鸟必须多飞。他从阅读大量资料和照片中，给少奇同志总结了以下几个特征：背手动作较多，他这时往往在深思熟虑；有时和

宋庆龄这样的人物见面时，往往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以示对对方的尊敬；在“七大”会议上他左手撑腰，右手前指，有咤吒风云的气势……

他有个诀窍，就是无论做一个动作、或者是说一句话，都先想好了一些潜台词，到该说该做的时候，他首先重温一遍那句潜台词。

在“七大”欢庆的场面中，他陪伴着“毛主席”来到了群众中间，他的那句潜台词是：“这真是普天同庆，军民联欢啊！”想着想着，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毛主席”抱起那个小女孩时，他心里又说：“好聪明的孩子啊，这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看到群众跑驴，他向“毛主席”点头称道，自然而然地伸出了两个指头，那句潜台词是“这是民间艺术，只有两个人表演的呀！”这样一想，他的动作和语言，就自如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表演还远远不满足，《刘少奇选集》发下来后，他从一位党员手中抢过来一本：“给我先看一看看吧，我需要读它。”因为他还不是一名党员。煤矿文工团业务办公室副主任邹振太，有一次碰到他问道：“你想见见王光美同志吗？”“想呀，我正想听听她对我表演的意见，请她介绍介绍刘主席的情况。”“行，我帮你联系吧！”

一次，王光美同志来观看煤矿文工团的演出，在休息室里，邹振太把一封信交给她了。光美同志十分热情，第二天就回电话，可以同张汉钧谈一谈。可是，因为忙，一直还定不下见面的时间……

古月给自己订了一条标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自己要力求表演得真实、亲切，冲破扮演领袖人物的精神束缚。

但即便这样，他还是不易一下子做到，他在自己的日记本

上，记录了这样一次失误：

在拍摄《四渡赤水》的一渡赤水时，一门炮堵在浮桥上，阻碍部队过河。毛主席从外边挤到炮车前，指挥炮手把炮沉掉。此时敌人的炮弹落在浮桥两侧，战士落水，毛主席与众战士抢救落水者。

第一次拍摄时，当战士落水时我正叉着腰，端着领袖的“架式”，未去救护。导演当即提示我：“救人！你快救人！”我还不理解。停拍后，导演说：“如果你把这个战士救出来，多么能说明毛主席和战士的感情啊！这比一般地给战士盖被子、问寒问暖要深刻得多。”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失误和不懂得即兴表演。如果真正生活在规定情景之中，即便剧本没有戏（没有战士落水），也会演出戏来，而能获得预想不到的效果。第二次重拍时，才完成了现在影片中的这段戏。

《中国革命之歌》中的扮演，和电影、电视里有些不同。在这一方面，古月已经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他的体会是：“在大歌舞里，扮演领袖动作得适当夸张一些，既要生活化，不做作，又要和歌、舞协调一致，相得益彰。我不是用叉腰、挥手一类动作来表现领袖的远见卓识，而是用审时度势的思索，对敌我双方的周密思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

在这些演员中，只有王铁成是有较长期的表演经验的，因而他比古月、比张汉钧和王伍福更懂得即兴表演的重要，也更善于会作这种表演。

有一次，《报童》演到结尾，他即兴加了这样一段戏：周副主席上街散发《新华日报》，在和群众握手时，发现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爹站在人群的后面，于是主动走过去紧紧握住这个穷苦老人的手，问他：“听懂了刚才我讲的话吗？”老人连连点头，

顿时流下了热泪。同台的演员见此情景也深受感动，更热烈地向周副主席鼓开了掌。

这段即兴表演，产生了极好的戏剧效果。但并不是王铁成凭空拔高总理，给他随意加上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天才，这是总理模范行为对我教育的结果。我觉得，这样演，符合周总理的‘这一个’。”

这是因为他听到过这样一段小故事：有一次，总理在石家庄弦剧团演出以后，上台接见演员，当看到后面站着一位盲艺人时，立刻走上去和他亲切握手……一件多么小的小事，却是总理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与人民群众心贴心的好证明。这些类似的小事，时时在他脑际闪光，他融会贯通，所以能把总理演活了。

他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克服困难。谢铁骊和陈怀皑在《〈大河奔流〉导演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就讲到王铁成在“总理雨中讲话”一场戏中的表演：“王铁成同志在嘴部塑型化装的情况下，在雨中大声讲话，困难是很大的，但为了忠实地体现这个情境的真实性，他克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三、爱之牺牲

那是动乱之年的事情了。有一天，张汉钧有事来到了地安门的大石桥边。被一个“红卫兵”看见了，这个“红卫兵”突然对他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没等他弄清是怎么回事，便立即被一群“红卫兵”包围了。拳打脚踢，口号声乱飞。有个戴“三司”袖章的“造反派”，冲上来扭他的胳膊，押着他游街示众，其他的“红卫兵”拥在后面，连喊带骂。

“别误会，我……我不是。”他连忙申辩。

申辩被当作顽抗。“你敢说不是！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他衣衫不整，头发蓬乱，又气又恼，却侥幸死里逃生。

老婆子心疼他：“快把你的白头发染一染吧！不然你以后寸步难行！”

他火嗤嗤的：“白头发是自然长的，相貌是爹娘生的，这犯什么法？”他坚决不染。

这是一九六六年“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之后不久，他这个有着和刘少奇相似面貌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他只得蜗居不出，实在要出去的时候，戴上个大口罩、戴上顶破草帽，象鲁迅《自嘲》诗里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

憎恨一切老革命家及其他子女江青，自然不会放过任远远这家人。一次，江青去解放军报社，见到正在那里帮助工作的远远的姐姐任远志，立即咬了一口：“哎呀，她是坏人，她妈妈也是坏人！”就凭这一句话，任远志被关押了四年多，她也被扣上了“黑五类”、狗崽仔的帽子。而事实呢，正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次批林大会上，谈到所谓“伍豪事件”时说的：陈琼英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性，她是个童养媳，靠织袜子挣钱供任弼时上学，她参加革命有一次被捕之后，表现得相当坚强。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他这个家庭连申诉的权力也失去了。

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过去。今天，扮演领袖人物，不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敬重，也受到了自己家人的支持。

但既然这是一种事业，全身心投入于事业之中的他们必然也会有牺牲，哪怕这是一种和自卫还击战中的烈士不能相提并论的牺牲。

他们虽是些“伟人”，却都是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如陆文婷一样，有各自的困惑和后顾之忧。

王伍福在《平津战役》中扮演朱老总的过程中，就是如此。

老父亲长年瘫痪在床，需要人去照料，母亲为了支持他演好戏，就只得提前退休回家照顾他父亲了。爱人王胜利是战友歌舞团独唱演员，人称小“马玉涛”。她已经三十四岁了，由于习惯性流产，一直还没有一个孩子，现在又怀了孕，也需要他去照顾，但为了支持他演好戏，也没有告诉他这个消息。

正当他在中南海给中央首长演出的当儿，父亲病危。妈妈问：“要不要给伍福发封电报，让他回来看看你？”

爸爸从昏迷中醒来，低低的嗓音里却有着坚决的语气：“不用，让他一心一意演好朱老总吧！”

父亲死了。他的演出暂告一个段落，这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他请假回天津，看到的已经是骨灰盒。他在骨灰盒前叩了三个响头，请求九泉之下的父亲原谅他这个不孝之子。

母亲在一旁抹着泪说道：“你爹知道你在演戏，他不让我拍电报，怕分了你的心。”

前后只呆了一天半时间，他返回北京来了。

他的家里，增添了一个小生命——一个小女儿，这个小生命从孕育到降生，同样没有让他操心。

家人们都拦住了种种困苦和忧虑，让他全心全意钻研和表演角色。

而王铁成的家里，有一个痴呆了的儿子。

过去，这儿子是他们夫妇双方共同照料的。在王铁成当编余队员的日子里，爱人的日子还好过。现在他扮演周总理，让他去

拍电影、拍电视的任务是那样多，他再也顾不上了。于是，那位在八十五中学任音乐教员的爱人就得请事假在家照顾孩子。时间一长，就得扣工资，夫妻俩加起来的收入不到一百元，日子过得够艰难的了。

有人替他出主意：“干脆，你给邓大姐写封信吧！她说不定能够帮助你。”

这算是什么主意，他冲那人发火了：“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亏你想得出这个馊主意。”

他仍然是王铁成，他有自知之明，并不因为扮演总理，就有了更高的身价和地位。

但这事，不知怎么让邓颖超同志探听到了。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团里，指名要找王铁成。

王铁成听出了是邓大姐的声音，他激动得拿电话机的手在颤抖，嗓子也有些发干。

“你身体怎么样？”邓大姐在亲切问候。

“大姐，很、很好！”

“你爱人干什么工作？几个孩子？有什么困难吗？”

他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他能告诉大姐什么呢？邓大姐的关怀，就是他作出牺牲的最好补偿，他心里的那些褶皱被熨平了。

“没有，没有困难。”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您放心，大姐，都、都够花了。”

他把一切困难都隐瞒了。

但邓大姐并不是轻易能被人隐瞒的人，她的工作作风和总理一样细致、扎实。

过了几天，一位解放军战士走进东四演乐胡同，来到了他的那个四合院。

“这是王铁成同志的家吗？”

他不熟悉这位军人：“你是——”

“我是邓颖超同志的警卫员，首长为你的孩子请了个很有名的中医，我是来给你送信的。”

感动使他也变得痴呆了：“这孩子是先天的，首长这样忙还——”他心里有许多感激，可此刻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

“请你约个时间，我来接你和孩子去看病。”

过了几个月，一次王铁成陪邓大姐看戏，大姐又问起这孩子的情况：“看得怎么样啦？有没有好些了？”王铁成讲述了自己儿子的情况。

“你们也别再要了。我和恩来没有孩子，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也挺好吗？”

他牢牢地记住了邓大姐的话，他要用加倍的努力来报答这种关怀。

四、爱 之 果

王铁成先后在五个电影：《大河奔流》、《报童》、《李四光》、《西安事变》、《风雨下钟山》和三个话剧：《转折》、《报童》、《喜歌》里扮演周总理。这些电影和话剧大都在全国性的评奖活动中荣获了奖励。

一九七九年九月，王铁成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参加朝鲜文化艺术部为庆祝我国国庆三十周年而举办的中国电影周活动。电影周放映了《大河奔流》、

《报童》、《海霞》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四部影片。在电影周开幕式上，当介绍到王铁成就是扮演周总理的演员时，观众们激动地起立，热烈鼓掌。两次坐下了，又第三次站起来。

朝鲜朋友对他说：“我们朝鲜人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特殊的感情，影片中周总理的形象一出现，观众就热烈地鼓掌。我们真诚地热爱他，怀念他。”

这年，他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现在，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艺委会委员。

在中国，几乎很少人不知道王铁成这个名字了。来访者、求教者、邀聘者络绎不绝。的确，他如今“够红”的了。

王铁成原名叫王铁城。在中学时代，他课余向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先生学戏时，奚先生帮他改的名字：“铁的城墙没有多大意义，还是铁的成功好。要想在艺术上取得进步、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股‘铁’劲儿，顽强努力，坚韧不拔。”

他没有辜负先生的愿望，他用“铁劲”取得了成功。

但他没有为此陶醉，他说：“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感动了观众，不能完全归功于我的表演。总理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太高了，只要他的形象一出现，观众就鼓掌，就落泪。如果我以为那掌声全冲着我来的，那我就太无知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王铁成没有失掉这一点。

冯牧同志在一九八三年观看了故事影片《四渡赤水》之后，激动不已。他特别对毛泽东的扮演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次，这位毛泽东的扮演者来看望冯牧同志了，他一口一声“老首长”、“老领导”，把冯牧叫得摸不着头脑。

“你忘啦？那时你当十三军文化科长，我是文工团里拉着马尾巴行军的那个孩子。”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他曾经抱过他，把他托上马背，他是扶他上战马的人。谁能料想到，三十多年之后，这个名叫胡学诗的小孩竟成了一位优秀的扮演领袖的人。

冯牧同志又兴奋又感慨：“没想到哇！真没想到！”

的确使人不容易想象，当年在马背上打瞌睡的孤儿，今天已能够在舞台上纵马驰骋了。

胡至今已在电影《西安事变》、《四渡赤水》，电视剧《塞上烽火》、《父亲》中扮演毛泽东同志。还参加过歌剧《长征》的演出，他的演技开始成熟了。

古月说：“我希望在最能发挥这个特型演员优势的时期里，多拍几部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影片，为后人留下一些艺术财富。”

这个愿望，对于六十二岁的张汉钧，也同样强烈。

他有五个儿女，孙子、外孙女也都有了。“我唯一的希望，”他这样说，“是在有生之年里演好刘主席。如果这方面能做点工作，这是我莫大的光荣和幸福了。”

他把满堂的儿孙叫到身边，人未衰而先立下了遗嘱：“我死了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要。只要你们能够记住：你们的父亲、爷爷曾扮演过刘主席，我就含笑九泉了。”

不仅是他们儿孙，全国人民群众都不会忘记这一点的。因为人民将要从他们身上认识和熟悉这些缔造了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代领袖。

当流星从夜空划过

A、由“洋伯乐”和“洋后门” 引向世界的中国小马驹

当闭关锁国的中国门窗洞开，开始与世界各国在文体、经济上广泛交流的时候，一股二、三十年代就时兴的崇洋风气也沉渣浮起了。“出国考察”、自费留学成为时髦的举动。若是受了外国专家、博士的抬举，授予硕士、博士头衔，或给予一字片语的好评，身价也便大涨。好象外国馈赠的头衔、名位比土产的货真价实得多。人们不乏诙谐，把发现、引荐中国人材学士的洋人称为“洋伯乐”，把私找门路出国的行动称之为走“洋后门”。自然，沾点洋气的中国人并非全是泥胎金身，也有二十四K金佛的。还有如胡晓平这样的歌唱家，本来是块和氏璧，却不为人识，非得去布达佩斯雕琢一番，才见斑斓。可见中姓伯乐的稀缺。

身高一米八〇的傅海静块头虽大，本事却低微，从总政歌舞团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深造，五年来只会一心专读音乐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快大学毕业了，社会关系学还是幼儿园的程度。爱人王晋川是本团的舞蹈演员，部队精减整编时转业了，却分到一个

街道办事处去和老太太们打交道，不仅专业不对口，脾气性格也一时难以“老化”。他并没有找个后门去想方设法调一调工作。可这一次，傅海静竟然要出国了！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得了“洋伯乐”之力，走了“洋后门”，这种认识，实际只对了前半。

八三年的四、五月份的一天，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领队莫扎爵士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说想听一听中国学生的歌唱。两位指导老师王福增和蒋英就把小傅带来了，同来的还有张积民、李洪深、刘跃、姜咏、梁宁等。“这种世面见得多了，”所以小傅甚至没有记清这位洋先生叫什么名字，只模糊地印下了一个外部特征——五、六十岁年纪，秃顶，个头差不多和他一般高。

唔，他唱了，并且认真地唱了，这并不是因为面前站着几个外国人。在林荫道，他对着两旁的树；在夜深时，他对着满天星星，都是这般严肃而认真的。他唱巴赫、亨德尔，唱莫扎特、贝多芬，他在外国古典作曲家的旋律中穿行，欢乐和悲哀都和他们合着同一个节拍。他忘记了外宾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自己。

他原不指望有什么很高的评价，因为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的声乐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而他唱的又是这些国家音乐界老祖宗的歌，相比之下，也许是摩天大楼对比于我们前三门的十几层楼吧？谁知莫扎先生的评价竟出乎他的意料：“啊，我感到惊讶！我原以为你们的演唱不会有这样高的水平，我今天却听到了高水平的演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临别前，他同老师、同学一一握手，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希望以后能在伦敦的比赛中见到你们！”

寻常的一句客套话，如同喊一声“再见”一样地轻易说出，也容易遗忘。至于那高度评价的恭维之词，也是人之常情的一种礼节罢了。谁免费听了一场独唱音乐会，不对演唱者赠送几顶

高帽呢？十几个英镑一张的票价有时出不起，信口而出的赞誉却永不会有短缺的时候。也许，莫扎爵士的慷慨之处仅在于此吧！

傅海静很快把这件事忘了，他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插曲，原来是他生活中一个重大主旋律的前奏。

七月下旬，中央音乐学院收到了莫扎爵士的一封来信，信的大意是：我在中国逗留的日子里，听到了贵院一些学生的演唱，认为他们是非常有音乐素质和才能的，我很希望他们能到英国来，参加十月份举行的国际比赛。现正式邀请傅海静和梁宁来伦敦，参加本届本森——赫杰斯声乐金奖赛。

当学校把来信的大致内容，通知到傅海静本人时，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人，激动得有些不能自己了。能够到世界舞台去参加一次国际比赛，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象乳毛未干的小鸟，不敢想象要作一次万里飞翔一样。但不敢想象的事情正从想象中走向现实，他只消一扑就能把它捕捉到，他怎会放弃这个手到擒拿的机会呢？

然而，这一扑并非易事。

第一轮比赛是录音磁带的比赛，不必去人，录音带通过了初试，才允许出国。录音带送到了有关部门，被扣压了好些天，待到学校催促了几次，才被获准送出。由英国大使馆送到伦敦，已晚了好几天了。有关部门的理由是充足的，对于“洋后门”，要从严掌握，国家还穷，没有那么多外汇往后门里送，因为这后门通向的，是《西游记》里面那样的无底洞呀！但傅海静虽然得力于“洋伯乐”，却绝没有走“洋后门”，那是人家的正式邀请呀！对方不是他的亲朋好友，而他也没有贿赂任何人，实际上，要贿赂也没有钱，因为他还是个一介“寒儒”。人家只不过看中了他的嗓子，热心提携，或许，是借助于他，为中英友好作出点贡献吧！

第一个难题解决了，紧接着遇到了第二个难题：由谁来替傅海静和梁宁支付这一笔旅差费？

因为这不是国家计划中的安排，谁也不愿付出这笔意外款项。

傅海静和梁宁决心已下，万难更改，他们把自己立的字据放到院办公室的桌上。“我们深知国家目前经济困难，我俩愿意自己承担除由香港赴英国之外的一切其他费用。”香港到英国的机票由举办比赛的单位提供，这就是说，他们决心不花国家的一分钱。

困难解决了，一切部门为他俩的出行拧亮了绿灯。

八月十八日，消息传来，两人都通过了第一轮比赛，进入了第二轮比赛。从这一天到九月十九日，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傅海静既要量服装、购置随身携带用品，又要办理护照签证、预购机票，更为主要的，是还得准备曲目。他自己安排的日程表上，挤不出一点水份，找不出一丝空隙。早上5.30到7.30，背歌，上午8.00—12.00，琴房练歌，下午办事，晚上合伴奏。爱人王晋川怀孕已七个月了，受人服侍的人还得伺候着他。更叫人感动的是王福增和蒋英这两位年事已高的教授，几乎每天盯着这个寄托着他俩全部希望的学生，不许他在练习中有一丝一毫的疏忽。至今翻开小傅的乐谱，还能见到他们用铅笔在乐句上面记下的殷殷嘱咐：“不行，这里太重了！”“再悲些！”“音色在这里要有变化”，如此等等。因为这两位导师深知，在那些艺术造诣高如阿尔卑斯山脉的大师面前，任何一点细节上的草率处理和情绪上的错误理解，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失败。傅海静还得感谢歌剧团的钢琴伴奏钱致文同志。小傅在学院里的伴奏老师回上海探亲去了，老钱就主动来帮忙，他明知这是完全尽义务，自己是不能出国的，还是冒着酷暑，一课不拉。傅海静在他悦耳的琴音里，听到的是一个净化的灵魂在歌唱。

三十天时间，没经得住他深厚的男中音的几次唱，就象他录的那一盘磁带，很快就转到头了。从北京到香港的机票是三百七十四元，他俩向音乐学院借了两倍的这个钱数，登上了南飞的波音707飞机。

行路难，一个小伙子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刚降落在那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里，就杀来了三个“下马威”。第一个下马威是同赠他们两人的：下了飞机无人接站，早已准备好的去伦敦的飞机票找不到。梁宁的装衣服、乐谱的箱子被别人看错，提走了。没有乐谱，怎么请外国人伴奏？简直要了她的命，急得这位广东姑娘几次掉下眼泪来；而当他俩终于拿到机票时，由于傅海静的名字应该是F打头而写了一个S，不让上机。逼得他再去找那家办理英国机票的部门声明，这个部门的办事员说要发报请示伦敦，等回电再说。

在机场坐等了七小时，肚子饿得直发表议论。他俩没有钱吃饭，那瘪三相，真有点象瞧着别人吃烧饼直咽唾沫的虾球和三毛。最后还是梁宁想起自己有位老师在香港，打通了电话。这位老师特地从香港赶到九龙，领着他们吃了一顿饭，临了还帮助付了二百港币的机场人头税。他们最后的结局也象中国老百姓爱看的大团圆结尾一样，伦敦回电了，说傅海静的名字可以更正，拿错箱子的英国人也把梁宁的箱子送回来了。两人总算在抹了几把虚汗以后，坐上了英国航班的飞机。

这几个下马威象几片沉重的铅色的云，紧紧压在这两个青年人的心头。傅海静是不信迷信的，却有点相信预感，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有好运气的人总是一帆风顺的，而他却屡遭挫折。八〇年上海声乐竞赛，他因为行政关系还没有从部队迁往学校，被罢了参加权。后来想去法国参加国际比赛，在国内的预

选中，他在学院的选拔赛就落选了。因为一些教师囿于学派之见和门户之争，生怕把他的分打高了委屈了自己培养的学生，因而他的分被打得低低的，低到那条录取线之下。而这次呢？又碰到了这样坏的兆头。“我的幸运将开始了吗？不，不，永远永远不会为我焕发！”这是他要唱的《漂泊者之歌》中的歌词，总不会是他的写照吧！想到这里，他打了个寒噤。

飞机，这时正钻进象大海一般浓厚的云层。

B、小卒子飘洋过海，胜过了过五关 斩六将的关云长

他如今站在伦敦英国皇家音乐学会的小音乐厅里了，面对着一百多位听众，开始倾诉他对那些纷繁复杂的咏叹调和古典艺术歌曲的理解。那坐在前排的，有十名评委会的委员。委员们坐着，却象耸立着、堆起了一座音乐上的喜马拉雅山，要翻越他们，获得他们的首肯是极不容易的。这里面有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乐队指挥，还有美国、比利时、瑞士的著名老一辈歌唱家，意大利米兰歌剧院的负责人。他们那冷漠的、尖刻的眼光一齐投射在傅海静的身上，比音乐厅明亮的灯光还要刺眼。灯光是照在他身上的，这眼光却直射进他的心里，任何一点点瑕疵，都逃不过这种目光的透视。

按理，他已经是一个幸运者，够满足的了。参加这次比赛的有美国、英国、瑞士、挪威、东德以及中国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十二名选手。第一轮录音磁带的比赛中，就被刷掉六十五人。小卒子过河，当车使，他这个在国内都可称为无名小卒的人，还没过洋过海，就比关公厉害，淘汰了众多的选手了。剩下

的十七名选手中，有许多是跟欧洲有名的指挥家演出过，担任过不少歌剧中的主要角色，声名早已彪炳世界舞台的人。而他呢，有多少中国观众知道他的存在？实际上，评委会对这两个所有选手中最年轻的中国选手并不抱什么希望，但为着对中国的友善，为着安慰两颗稚嫩的心，他们通过中国大使馆传话给傅海静和梁宁：中国只要能进入半决赛，就太好了；如果进入不了半决赛，请不必感到意外。当使馆负责接待他们的小沈同志如实相告时，这剂所谓止痛良药反而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深深插进了这两颗高傲的心：“太小瞧我们了，一定要唱个样儿给他们听一听！”如果说抚慰是对弹簧的压缩，效果却是一种反弹。

但傅海静毕竟有些忐忑不安，他听不到旁的竞争者的歌唱，比赛是单个进行的。他被定为二十四号的下午，而梁宁却是在这天晚上。他对对手的水平一无所知，虽是下午，却象在夜间摸黑打一场《三岔口》。

他唱了，唱勃拉姆斯的三首歌曲，再唱马勒的《漂泊者之歌组曲》，他逐渐进入了规定的情境和氛围之中，看不见眼前那严厉的目光，忘却了个人的胜败荣辱，不过心里还暗藏着一个念头，那念头也单纯得只是一句话：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唔，这位漂泊者的情绪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剧变！婚礼应当是充满幸福的，而这婚礼却是在漂泊者的情人和另外一个人中进行。他无限悲戚地逃回自己黑暗的小屋里，哭呀，哭呀，为那心爱的却已经变心了的情人。轻一些，再柔和一些，干嚎打不动听众，这应当是悲极而笑的反常，欲哭无声的自语。瞧呀，蓝色的小花朵在开放，可爱的小鸟在草地歌唱，它们在叽咕叽咕地赞美这美好的人间。这是一种反衬，悲哀者落在一个喜悦的环境之中，其悲哀将猛增一倍。诗人的巧思、作曲家的妙构，正在于这悲与喜

的强烈对比和揉合之中。要好好掌握这一分寸感，再悲些，再悲些，是不是在悲调中加一点喜色？象吃糖水菠萝时加上那么一点少许的盐？别唱了，别开花了，春天已经过去，不不，他不是说自然界的春天，他是说漂泊者心中的春天。……

他才二十六岁，结婚不久，恋爱与婚姻对于他都比较顺遂，他没有个人痛苦的经历去作映照，但他可以借助形象的理解、借助中国文学作品去接近它，触摸它。这对于他，的确太不容易了，他必须跃过两条鸿沟：从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境跃向一位德国诗人的心境，从一个二十世纪的人的情绪跃向十九世纪这位漂泊者的情绪。然而，他终于完成了这一飞跃。

他感觉到那艺术的魅力了，因为在灯光的映照下，他瞥见了观众眼睛里的泪光和评委们刻板的脸上微微闪动着的喜悦神采。

二十五日的晚上，他和梁宁守在接待处的电话机旁，万分焦急地等待着那一声电话铃响。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决定了那一声“叮铃”之中了。啊，他的心跳，到了一百二十下，还在继续“看涨”。

该怎么形容这一个时刻——“那是赌徒的摊牌，是垂危者的获救，是球赛最后一分钟出现的平局，是难产婴儿的呱呱坠地，是证据齐备后的突然逮捕。”——似乎都难以比喻他俩这一刻的心情。

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了，傅海静象赛跑者听到那一声枪响一样，猛地抓起了电话。小沈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里变得短促而气喘吁吁。唔，这时傅海静还没有起跑，小沈倒象是马拉松跑到了终点。“好、好消息呀！我们有、有希、希望了，你们两个都进入前八名啦！”

他搁下电话，跳跃起来，伸手一撩，碰到了天花板，他这时

象个巨人，象个胜利了的阿耳戈斯勇士；而梁宁拍着手，转着圈子，倒象个幼儿园欢乐的小姑娘。

休战一天，二十七日始，又开始了第三轮的比赛，这一场角逐，将在瑞士、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八名选手之间进行。地点没变，个人的曲目将从三十分钟延长到四十五分钟。

在这一轮中，他唱了贝多芬的两支歌：《大自然赞扬上帝的荣光》、《阿德拉依德》，唱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阿芒的咏叹调。还唱了舒曼的《诗人之恋》的套曲，这组套曲包容了海涅的十六首诗，全部唱下来，相当于独唱了半场歌剧。

他这时还微微有点紧张，但情绪却象阴霾消散、朝阳新出的早晨。每一个呼吸，都象是在维也纳森林中吞吐新鲜空气一样，使他信心充足、力量倍增。当他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之后，他才悟到了一些评论家的观点的平庸。据这些评论家说：欧美人奔放、热情外溢，他们的歌如其人，而中国人含蓄、内在，很难完全理解外国歌曲的其中三昧。而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傅海静却觉得，正是这种含蓄加之于热烈狂放之上，才表现出更强的力度、更深沉的内涵，那种外在的疯颠痴狂，只能震吓听众的耳膜；满含着蓄势的热情，拨动的却是听众的心弦。

……我不怨你，
即使我心破碎，
啊，永远失去的，失去的爱人哪！
我不怨你，我不怨你。
你虽炫耀宝石的光彩，
但你心里，却黑暗如夜，
这我早知道。

我不怨你，
即使我心破碎。
在梦中你那黑夜般的心房，
我见那毒蛇正啮咬着它，
我看见，亲爱的，你多可怜，
我不怨你，我不怨你。

一位美貌的姑娘，爱慕珍珠宝石，荣华富贵，把诗人抛弃了。这诗人虽有才华，却才外无贝。爱从身边飘逝了，那位置没法填补，只留下空虚；那样的高价姑娘不值得爱，理智在这样叮嘱他，感情却藕丝难断。怨她么？恨她么？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呀！她那愚昧的崇尚虚荣的心际，没有明亮的烛光。他可怜她的愚昧，怨恨她的寡情，可怜多于怨恨。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旧社会，直至今天，还时有发生。理解它，并不困难，要在短短几句歌词里表达出这般复杂的感情和意境，倒的确困难重重。不需要大喊大叫，只需要如泣似诉的低音，象对着老朋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后吐露出诗人那一点不怨还怨、不恨还恨的幽幽之情。再没有比东方人的含蓄有更好的法宝了，他要用含蓄，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外国的选手。

他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当他谢幕而下的时候，钢琴伴奏和侧幕桌边的工作人员，纷纷向他祝贺：“真好，祝你交好运！”一些英国观众、香港留学生也都走到后台来赞扬他，那话虽然是寻常的，但赠送者和接收者却都认为是最好的礼品。当时还有一个维也纳歌剧院的经纪代理人，拉住了傅海静的手，向他发出了邀请：“您唱得很好，很好！能有机会到我们歌剧院去演出吗？我可以马上和您签订合同！”

不是关云长，胜似关云长，他和梁宁又过了第三关，斩了四将。在最后进入决赛的四名选手中，一名瑞士人，一名英国人，还有两名就是中国的他和她。

把他俩比喻成关羽的义弟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中国人有句俗语：张飞打铁——人硬货也硬。而报纸和人们的议论，似乎是软的，应当叫“软件”，它是依据着铁的事实而由新闻记者任意编排的。这时候伦敦的报纸，议论转动了一百八十度，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头条新闻：中国人将垄断本森——赫杰斯声乐金奖赛！

到决赛还有三天的休息时间。休息二字该实实在在打引号的——这两个中国的青年在休息中上足了全部的发条，从神经到机体。伴奏不再是钢琴，而将是皇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排练、合伴奏、走台，他俩的整个活动就是一首急奏的歌曲，连该在哪里呼吸都得预先画上标志。但他感到昂扬，从来不曾有过的昂扬。和皇家歌剧院乐队合作，到歌剧院的大舞台上演出，也许是许许多多老一辈中国歌唱家梦寐以求的向往，这向往还从来没有实现过。就连普通的英国公民看来，能占领皇家歌剧院的舞台，无疑象登上了音乐界的俄林波斯圣山。今天，这向往在两个中国人身上变成了现实。他与她，怎么不兴奋得有些颤栗呢？这是最后的一次拼搏呀，象两个进入大斗技扬肩并肩角斗的奴隶武士，而两个人都叫一个名字——斯巴达克思。

十月二日的这天更加彤云密布，上午十一时半到下午四时，傅海静需要走台。过度的劳累，更感到一觉午休的宝贵，而外国人却没有午休，自然不会想到中国人的这个积习。练到四点，再由大使馆的小车接回去吃饭、穿演出服、化装，其间只有三个小时，路塞车挤，只得找小路绕道，而傅海静和梁宁的化装，也只得在小车里进行。

一张票的票价要十几个英镑，相当于中国一个三级工的月工资，但爱国华侨还是踊跃地开着小车来买票。这是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时刻，扬眉吐气的时候，谁不愿来为这短暂的却值得纪念的一刻捧捧场呢？面对着频频祝贺的华侨，傅海静真想掏出一把票来撒一撒，如果他有的话，可惜他这时仍是个无产者。中国大使馆也只收到了八张请柬，只得你推我让。

两千人的剧场坐得满满的。舞台上没有麦克风，演员必须靠自己的嗓音，把每一个音符传向最后一排观众，音量过大会变成喊叫，感情就消失；过份注意情感的发挥，又使观众难以听清唱词，最终失去效果。啊，矛盾，伴随着这两位演出者，直到评判的那一时刻。

第一个上台的是梁宁，第二个是英国人，第三个是他，而第四个是瑞士选手。每人独唱半小时，组成一台晚会。

英国观众是文明的、成熟的，他们对每一位歌唱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对第一次在这里登台的中国选手，这种热情更加外溢。他们的确感到新鲜，因为这是两个中国人第一次站到在这个舞台之上，而且是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了。有一些观众在另外的剧场中听过港台演员的唱，都是手拿麦克风，姿势多于声音。今晚，他们真正欣赏了一次中国气派的歌唱。

两小时过去，观众一个走的也没有，他们要等待休息之后，听评委会宣布那个令人焦心期待的结果。

评委会和四名选手坐在台上。傅海静的脸孔发烧，心儿狂跳。十多天的奋斗，就等最后那一句话了，最后那一句话将告诉他，他是不是那个历经磨难而最终获胜的俄底修斯。

第一名是个瑞士选手，他的心一沉，啊呀，他失去了一个冠军的机会，第二名呢？第二名——是“密斯特傅海静”！

最终的宣判终于明朗了，名次的排列正好和登台的次序相反。

观众欢腾了，剧场里充满暴风雨般的掌声。英国观众在冲着这四名获胜者鼓掌，评委会在冲着他们鼓掌，侧面包厢里，中国大使馆的同志在冲着他俩鼓掌。他在闪闪的泪花中望见：最起劲鼓掌的是那些华侨，唔，这些炎黄子孙们，把这一胜利看作是他们的胜利，整个中国的胜利！而这时，他觉得自己这个“小我”已消失在人群中，中国这个“大我”开始屹立在人群簇拥的舞台上，在欢呼和掌声的巨浪里堂堂威仪、奕奕神色、风采照人！

那位莫扎先生呢？他不是评委会的委员，却始终在关注着傅海静和梁宁的比赛进程。此刻他正被祝贺者包围，夸奖他有如此的好眼力，推荐了这两名水平这样高的中国选手。他乐哈哈地挣脱了包围，登上台来拉住了傅海静和梁宁的手，兴奋地祝贺：“祝贺你们有如此好运气，祝贺你们有这样美妙的歌声。”

应该感谢你呀，莫扎爵士！傅海静这时竟找不出确切的语言来向他表示感谢，喉头哽着，这位歌如流水行云的歌者，此刻说话却觉得这般的艰涩，他颤微微吐出的只有两个字：“老——师——”他具有歌材，却缺乏文材，不能象北朝齐国的谢朓那样，作一篇《酬德赋》，而沉甸甸的老师之呼，却充满了他对莫扎先生高尚品德的赞美。

莫扎先生看出了小傅的激动，谦逊地说道：“不必感谢我，应当感谢你们国家的培养，你那老师的教诲。”

第二天的伦敦报纸是这样作出评价的：

——傅海静先生的声音有很大威力，任何角落的观众都能听清他的演唱，并被她充满感情的唱所感动。

——中国人的确垄断了这一次比赛。

C、祖国，他在世界的舞台上歌唱您的形象

一辆小轿车，载着傅海静和梁宁，载着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和夫人，驶向莫扎爵士的府第。

莫扎先生是好客的，他邀请傅海静和梁宁几次到皇家歌剧院，去看歌剧《罗乐》、《吉托》。今天，他又邀请这两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去共进午餐，随同作陪的还有《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和夫人。

他家里有一架钢琴和一架钢片琴，他本人就弹得很好。这位性格开朗的前辈，一定要在饭前亲自伴奏，让傅海静和梁宁唱几支歌子，以佐佳餐。他们两人唱了。在莫扎先生和总编辑先生情绪的高潮中，傅海静说道：“莫扎先生，让我为您唱一首中国歌曲吧！它的名字叫《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太好了！太好了！可惜我不能为你伴奏了。”

“我可以自弹自唱。”

“欢迎欢迎！”他首先鼓开了掌。

如泣似诉的歌声伴着低沉又激昂的琴声流泻出来了。象深夜里静静流淌的水溪，一会儿，水溪裹卷着血泪和控诉，裹卷着仇恨和抗争，汹涌掀腾起来，这掀腾又把听众的感情包裹其中，随着那翻卷的浪花沉浮飘荡。……

莫扎先生不懂中文，但音乐的语言是共通的，他完全能听懂。

“唔，象是在怀念着什么，感情很真挚很深沉。”在曲终短暂的沉默后，他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太准确了，就是怀念！傅海静告诉他，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占领了我东北三省以后，流浪群众对于家乡的怀念。

“啊，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美好的音乐，我以前是太不了解中国

了。”他发出的是由衷的感叹。

在傅海静的伴奏下，梁宁独唱了一首《阳关三叠》。莫扎先生品完其中滋味，说：“象你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泰晤士报》总编辑赞同地点了点头。

又被你猜对了，莫扎先生！

在酒宴上，莫扎首先举起了一杯香槟酒：“为你们国家那美妙的音乐，为你们在英国取得的这次胜利，干杯！”

中国的音乐并不比别国民族的音乐矮半截，就如同中国人的智慧并不比外国人差一样。只是缺乏宣传，只是缺乏交流，这大约就是闭关锁国的后遗症吧？傅海静想：他今天获得了在英国的第二个胜利，这胜利潜在的意义也许并不比第一个胜利差——他用中国的歌曲而不是外国歌曲，拨动了两颗心。

傅海静和梁宁还赴圣三一音乐学院去演唱了一次。那位声乐系主任来大使馆邀请的语气是极为恳切的。他说：“我们没有什么报酬可给，就希望你们中国演员为我们去唱一唱，增加一下了解，加深友谊。”傅海静听说以后，一口答应了。他本身是个穷学生，岂不知道搞音乐的人都很穷？穷物质而富精神，那位贝多芬大师就如此，他追求的不是钱财，而是音乐、音乐……是的，为了友谊，为了让他们更了解中国，而不是为了几个英镑，他必须得去。

他除了唱比赛中的一些曲目，又唱了一首中国歌曲。梁宁呢，来了一首《茉莉花》，优雅动听、活泼跳跃。他俩发现，这些和他们差不多同龄的学生最感兴趣的竟是中国歌曲。“你们中国歌唱得这样好，西方歌曲也唱得这样好，真不简单！”一位学生激动得叫了起来。随着那叫声，音乐会转化成了座谈会。系主任、教师和学生把他俩围在中间，进行了一场心与心的交谈。

“你们一星期上几堂声乐课？”

“一星期两堂，每堂一小时左右。”

“跟我们一样。你们外文谁教？是不是外国人？怎么吐字这样准确？”

傅海静坦白里蕴含着骄傲：“都是中国老师教的。当然，我们只会唱，不会说。”

他们那语气里透出惊讶：“噢，你们唱得这样好，我们还以为你们会说呢。你们俩是不是一位导师教出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梁宁回答了：“我们每人两位老师，男女各一位。我的指导老师是李晋纬和沈湘，他的指导老师是蒋英和王福增。”

学生们更吃惊了：“啊，你们国家不只是一位老师，有那么多好的老师呀！”

岂止那么四位呢？傅海静想，他们是对我们祖国太不了解了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们国家有许多优秀的教师，更有许多天资和才华比我们俩好的学生，老师教导学生是尽心尽力的，也不额外收费，一切费用都是国家拨给。不象有些国家，一个学生拜请一位名师，自己得花许多钱，有时花了钱还学不到本事。这是我们那个社会制度，对培养大批音乐人才赋予的优越条件……

他没有学过外交，这时却出色地变成了外交家。因为是讲自己的祖国，讲含辛茹苦培育他成才的老师，他有许多许多的感受，用不着讲稿，用不着提词，他可以脱口而出，不绝如缕地讲下去、讲下去……

他俩回来不久，大使馆就收到了圣三一音乐学院寄来的感谢信，那感谢信的语气同声乐系主任的邀请同样恳挚：“……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了你们国家两位年轻歌唱家的演唱，他们的演唱水平是相当高的。而且他们非常谦虚，这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后，我们希望能增强这种来往与交流，因为我们真切地

想为英中的音乐交流多做工作。同时，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大使馆和这两位中国演员给予我院教学工作提供的帮助。”

BBC广播公司中文部的记者接踵前来，邀请他俩去广播公司进行了一次答记者问，并替每人录制了三首歌曲，准备向全世界播送。

满载胜利，满载友谊，这两位小青年飞回来了。这一天是十月十六日，星期天。

傅海静拍过一个电报，他怕星期天找不到来接他的人，要歌剧团来辆小车接一下。没料想，他一下飞机，竟有些不知所措了。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音乐学院领导和歌剧团的领导，以及他的同学、朋友和爱人，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欢迎队伍。献花、握手、祝词，使他应接不暇。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呀！在香港，他们举目无亲，“谁谓天地宽，出门便有碍”，而在国内，那么多的亲人，那么多的笑脸。这便是生他养他的祖国呀，这便是他的母亲！因为孩子过多，这位母亲有些照顾不过来，那是不应当耿耿于孩子心中的呀！如今他载誉归来，才深深感到，祖国是这样的可爱可敬，儿行千里万里，始终没有忘怀，也没有为您丢脸失态，祖国啊——母亲！

他在人群中瞥见了妻子，她挺着将要临产的大肚子来迎接他。他多么想挤过去，问候问候她呀！不过，这轻而易举的事，他却没有去做。他的目光又从爱人的脸上掠过。他继续在人群中寻找，他在寻找什么——

啊，在那欢迎的人群后面，来了，果然来了，他的两位指导老师。他挤过人群，扑上前去，把鲜花分送给他们，又紧紧拥抱了这两位师长。他有满腔的感激，有如山的敬重和如海的怀念，还准备了可以说它三天三夜的心里话。可是在这一瞬间，他竟又

龇牙结舌了，唯一能够轻轻呼出的，就是那两个字：老——师——。这两个字，能顶千言万语。

蒋英老师扳起了他的头，审视着，端详着，心疼得发紧：“要想干一番事业，是得要掉几斤肉的，但我看到你瘦了许多，又心里——”她说不下去了。

啊，老师，让我们的心情都平静以后，好好地诉说说吧！哦，也许在今后也用不着了。既然我们彼此的心跳都听得见，还使用多余的语言干什么？你们这两架人梯，把我举得高高的，不就是让我去为祖国蟾宫折桂么？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不是足可慰藉两颗伏枥老骥之心了么？

而在人群的另一个地方，梁宁也伏在李老师的肩头啜泣，她也是在老师那醍醐灌顶般的教诲表示着由衷的感激。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俩用心灵在同唱着一首“无声二重唱”，这首歌的题目应当叫《老师的颂歌》。

傅海静在英国领取了一千五百镑奖金，他扣除了一切费用和借款，还交给国家一千英镑的外汇。他希望，这一千镑能作为象他这样的学生出国比赛之资。他虽是个学生，却已开始有了老师的胸怀……

是的，当流星从夜空划过的时候，是容易被人们注目的，但它不一定是最大最亮的星星。象一个孩子指着天空对妈妈说：“看，天上的星星真多呀，数也数不清。”我却是要指着这片祖国的大地说，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材，别等他们飞向国外之时，才去认识他们！

一九八四年一月

一片冰心领风骚

——记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A、他头上有引人注目的“洋范儿”

他就是这样来到办公室的吗？就是这样站在秘书桌前的吗？——卸顶，头颅两侧的头发虬撒着，戴一副金边眼镜，上身是一件皮茄克，下穿一条喇叭裤，左手玩弄着一顶黑呢“贝雷帽”，右手指还在桌子上神经质地敲打着音乐点儿，脑袋微微晃动，给人一种“那个”的感觉：“洋范儿”，“假洋鬼子”。

“兹介绍中央乐团指挥陈燮阳前来你处报到……”

唔，他叫陈燮阳，耳生得很，不如李德伦，是中年得志吧？所以，用一身洋外表作陪衬，以显示身份？

“燮阳，你是不是把头发理了？”乐队负责人崔维聪带着一种试探性口气同他交谈，这是陈燮阳到《中国革命之歌》的几天之后。

“这是领导的意见？”

“嗯，有这个意思。”

陈燮阳用右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头顶，感叹地说：“老崔，你看，这中间头发少，全靠两侧的头发遮，要是理了，就成了少林寺的和尚，你跟领导说说，如果必须要剃，我服从！”

话说得诚恳而推心置腹，崔维聪感到他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行行，我向领导反映一下。”

后来领导发话了：“的确是那样，算了，别难为他了。”

领导小组副组长乔羽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不知道，这是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发型，他怎么不选择这种发型呢？他脸盘窄，全靠两侧的头发撑门面，依我看，他这是最佳选择。”

可以理解他的“洋”外表了，但他是表里如一——肚子里确实有些“洋货儿”吗？还是一具“绣花枕头”？

B、他确有一肚子“洋墨水”， 首先被镇服的是洋人

一九八一年九月，陈燮阳应“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邀请，赴美进修、考察和访问演出，足迹踏遍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阿思本等十几个城市，为时一年之久。他从师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先后指挥过纽约现代音乐演奏团、布鲁克林交响乐团、檀香山交响乐团。到波士顿以后，他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会面了。小泽征尔到中国来演出，陈燮阳任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常任指挥时，随团去过朝、日、法国和加拿大演出，两人会过面。虽然没有深交，但陈燮阳对小泽征尔极富激情的指挥深表敬佩，而小泽征尔对陈燮阳雄伟气魄，动人情愫的指挥也颇欣赏。可谓惺惺惜惺惺，这难得的会面，自然使双方都兴奋不已，小泽征尔把他带进排练厅，带着几分骄傲，将他介绍给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全体成员：

“这位是密斯特陈燮阳，是中国来的指挥，一位优秀的指挥家！”

回答是一阵十分热烈的掌声。

小泽征尔三番两次地把陈燮阳带到排练厅。这是他的“神殿”，他从来不在厅内会客，也决不让任何人，包括世界各国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闯入这一禁区。而对陈燮阳，却意外地亮起了“绿灯”——一位世界崇拜的名人，如果他还有崇拜者的话，那这位崇拜者一定与他相去不远。

小泽征尔也许是太好客了，他用音乐喂饱了陈燮阳的耳朵，又开始用佳肴喂饱陈燮阳的肚腹。

他用车把陈燮阳拉到家中，亲自下厨，配制日本火锅和生鱼片，他自认为这是一种款待客人的最高礼仪。

“阳，你吃过生鱼片吗？”

“没有，我愿意试试。”

“很好吃，你会上瘾的。”

“等我上了瘾，再到哪里去过瘾呢？”

“那你在美国住下来，想吃了，就到我这儿来。”

“那就不必了。在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典故：西晋时代一个文学家叫张翰的，到外地做官，瑟瑟秋风吹来，忽然思念起家乡的菰菜、莼羹和鲈脍。鲈脍，就是鲈鱼脍的佳肴，他连官都不做，跑回家去了。这张翰的家乡，就离我的出生地不远，那里称之为鱼米之乡。吃鱼，还是回家乡去吃。”

“不错不错，我爱吃生鱼片，恐怕一大半也是怀恋故乡之情。我常常想起日本的樱花、富士山，呵——”小泽征尔摇了摇他一头长发，颇为感慨。

火锅、生鱼片端上来了，威士忌、罐头啤酒、鸡尾酒摆了一桌子。只有两人，无拘无束，酒使热情燃烧，火锅里有心潮滚沸，小泽征尔脱去外套，手舞足蹈，宛如登场指挥；陈燮阳微笑端坐，手指敲打玻璃杯，凝望着啤酒震起的波纹，象在酝酿弦律。

喝，威士忌！吃，牛排！

“密斯特陈，我觉得我们东方民族的智商，是很高的。任何尖端科学领域里，都有我们的人。”

“小泽指挥，起码不比其他民族笨。”

“我们的一生恐怕不能再缺少音乐了，阳，你说对吗？”

“嗯，我的一生，就是要在交响乐方面赶上西欧和北美。”

“好的，为你的志向，干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他，醉了！

陈燮阳来到美国中部城镇阿思本了。这个颇具特色的山城是避暑胜地，每年要举行一次音乐节，这是美国第二大音乐节。陈燮阳是第一个参加这个音乐节的中国指挥，因而颇为引人注目。

他走上音乐厅的指挥台，回转身来，向听众鞠了一躬。今夜，游客和本地居民听说有一位中国指挥家登场，听众增添了不少。他又一个向后转，给听众一个背影，举起指挥棒，沉稳地向全体演奏员投过去友善的一瞥。看得出，他们的表情要比听众热烈得多。演奏员们早在前几场的排练中认识了这位中国指挥了：他们猜想他的一头黑发也许一根根都兑换成音符了吧？不然，他的脑子里怎么记得下这么多的乐章？他们也曾悄悄“考核”过这位中国指挥。例如：某个演奏员故意吹错了一个音符，这时这位中国指挥走到这位演奏员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刚才您是否吹错了？”唔，他还有一双比猎犬还灵敏的耳朵。在他面前，是玩不得半点“花枪”的。

交响乐的老祖宗都在国外，因此，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是容易受到欢迎和取得效果的。但陈燮阳今晚拿出的第一个节目竟是上海青年作曲家奚其明的芭蕾组曲——《魂》！曲目生疏，作曲家更是名不见经传。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是过于相

信自己的指挥才能？还是有意让自己下不了台？啊，他要把祖国的交响乐作品介绍给外国听众，让他们知道中国在交响乐事业上的发展和成就，他要让外国人认识他的祖国——那个在各个领域里都欣欣向荣的祖国。

魔棒挥舞起来了，一会儿轻划，一会儿重挑，紧跟着就是他的眼神和表情，悲愤、沉郁、激昂、呐喊，他把这些情绪一泻无余地传输到每个演奏员的心中。魔棒轻抚，这异国山城顿时刮过了一阵中国江南的春风；魔棒蹦跳，又使这里充溢了水乡集镇的节日气氛；啊，魔棒狂舞，阴间的牛头马面开始在他的指挥棒下扭跳乱舞。而他的身体摇晃，脚部踢踏，仿佛成了群魔之首。指挥棒一顿，狂风顿收，接着又轻轻地一个长划，善良的农妇——祥林嫂的主题音乐出现了。她一手挽着要饭篮，一手拄着讨饭棍，正蹒跚在风雪迷漫的鲁镇街头。她在幻想，她在提问，她在控诉，她在呐喊，她的声音从轻微到强烈，从低沉转激昂。所有的乐器都张开大口，象有千万个屈原昂首问天。而陈燮阳这时全身跳起，把全部的力聚拢到他执棒的右手上，对着天空，他在划着一个个沉重的问号。突然，随着指挥棒一个干净利落的收势，一切乐声戛然休止，但那带着民族风味的余音，却如一石激起的千层涟漪，在扩散……

台下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听众大声呼喊，乐队演奏员们一次又一次跺着脚表示欢呼，掌声竟持续了四分钟，陈燮阳从里到外谢幕了三次。在音乐会上第一首曲子就获得这样的成功是罕见的。

少顷，他又指挥了莫扎特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的演奏。他那根魔棒，又把听众引进了勃拉姆斯创造的田园宁静的氛围之中。当乐队总监几次把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的

总谱放到他的面前时，他轻轻地把乐谱推开了。谢谢，总监先生，不用，完全不用，所有的乐谱都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刀刻斧凿的记忆哟，如今，不过是一次自如的“放映”。……

掌声卷过音乐厅，一直回响到厅外的草坪上，又在四围山壁上引起了回声。喝可口可乐的听众扔掉了瓶子，抱小哈巴狗的夫人放下了可爱的小狗，他们为的是解放自己的双手，好为这位中国指挥结结实实地鼓几下掌。

“这是阿思本音乐节最出色的指挥！他叫什么名字？”

“陈——燮——阳？”

“陈燮阳，中国，好，好得很！”

闻名世界的美国小提琴教授狄蕾女士，赶往后台向他热烈祝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弦乐代表团成员，俞丽、丁芷诺、黄晓芝等也兴高彩烈地握紧了他的手。这是一双有魔法的手。

回到旅馆，已是深夜零点，他万分激动，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无法使自己安静。他把窗子打开，习习凉风轻拂着他发烫的双颊。他索性不睡了，铺开信纸，奋笔疾书，他要给祖国报喜，给国内的领导、给他的指导老师、给曲作者、给他的妻子报喜。祖国在他指挥的音乐中站立起来了，受到了外国观众的理解和重视。那掌声不全是赠给他的，应当说是馈赠给他背后的祖国的。他应当用一张信纸包裹着它，寄回到万里之外的祖国去。

“我在阿思本音乐节指挥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奚其明作的芭蕾组曲《魂》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音乐会受到了观众长时间的欢迎和鼓掌，我谢幕了許多次。在后台，我被乐队演奏员、观众、华侨、留学生包围了，我深感为祖国争了气……”

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陈燮阳又应邀指挥了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之始，惯例要奏两个国家的国歌。当他听到那熟悉的

《义勇军进行曲》时，从不轻弹的泪水竟夺眶而出了。

他掉泪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华侨向他讲述的孙中山先生讲过的故事。是马来西亚？印尼？还是就在这里——菲律宾？那无关紧要。华侨中的一位百万富翁，到朋友家里玩耍，到了宵禁时间，立在友人的家门口不敢回家。他看见游荡在阴影里的日本妓女，顿时生出了主意。他把妓女拉到身边，给了她几块钱，目的只是陪他回家。果然，巡警就不敢再问他了。他虽巨富，但祖国贫穷，他照样受人轻视；如若他贫穷，而他的祖国强大，他一样使人敬畏。这是那个畸形社会所特有的畸形现实，虽然它已经古老，却没有一个海外的炎黄子孙会忘记它。一切都使他豁然开朗了，人们还不知道他的“演技”如何，许多华侨就扶老携幼，远道赶来看他的演出。当地华侨组织的音乐团体“黄河合唱团”，几天前就把他众星捧月似地围了起来。那天他和几位新华社记者在饭店吃饭，进来的华侨得知他叫陈燮阳后，争着同他握手。等吃完饭要付钱时，侍者告诉他：钱早付了。——是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无可辩驳的结论使他热泪盈眶：正是有了那面五星红旗、那支《义勇军进行曲》，人家才让他站到这个指挥台上来的；而他个人在国际音坛上的一切努力，只是让更多不同颜色的人们，记住这首进行曲激昂的旋律。……

香港，荃湾大会堂和香港大会堂，陈燮阳又指挥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的两场音乐会。新闻界是这样赞叹他的指挥的，“啊，简直是一首诗，一幅画！”尤其是他指挥了中国青年作曲家林德虹创作的弦乐小品《思》，那富于民族色彩的旋律和短句，那带着中国青年善思特征的韵味，使人沉浸在一种朦胧的境界之中。香港的音乐界轰动了，人们惊叹：想不到祖国大陆的音乐水准提高得如此之快！

他不象某些人，出国深造只为涂一层金，那内涵其实还是泥胎。不，他本是块真金，只是到国际音坛的天平上称了称，看到底有多大分量。而当他称出了自我的时候，也掂量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也开始认识他了，“洋”外表无损于他的形象，他还有一肚子使得洋人也敬佩不已的“洋墨水”儿。形式和内容，用音乐的语言来说，构成了和谐的统一。

C、他其实土得很，本是个赤脚 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孩子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的同伴。”陈燮阳就是从乡间的小路上走过来的。

一九三九年生于上海，但从五岁起就和母亲、祖父母生活在武进县的农村了。他家没有一分土地，他得帮人家去砍柴或插秧割谷，以维持生活。他也没有钱买衣服穿，只得跟着祖母在古老的纺车前学纺线线，再用草木灰和树叶汁染一套粗布衣褂。摸鱼捉蟹，抓雀儿，玩过家家游戏，他有过童年的欢乐，但大部分却是悲苦和奔波。

他周围的人都缺乏音乐细胞，只有母亲会哼几句昆曲和京剧。他把这一点点特长全盘继承过来了，六岁就在乡间登台，唱京剧。对于音乐，他似乎有先天的爱好，看见邻居家的墙上挂着一把破胡琴，手心发痒，借来就拉起来。不必抬高他，他拉出的第一个音，一定是象初生的婴儿的那一声哭，决不是音乐。

“爸爸呢？我的阿爸呢？”

小学的同学说他是没爹的孩子，他跑回家来，仰起小脸问他的母亲，一脸的急切和焦灼，母亲用衣袖抹了一下自己的眼

泪，转过脸去，不敢正面对他。

“啊，妈，爸爸上哪里去了呢？还是——死了？”强忍着痛苦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住了，她嚎啕大哭，一把搂住小燮阳，“孩子，以后别问他了，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顾不上我们了！”母亲的泪水滴湿了他的脸，他把脑袋靠在母亲的怀里，也失声痛哭起来。

姐姐抗美援朝回来，看见弟弟那么热爱奏乐，十分感动，送了他一把二胡。这，就是他学习音乐的开始。

十四岁那年，他上初中二年级了，听说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生，他要去考。学校老师十分惋惜，再三劝导他。抛开初二再去上附中，等于白读了二年，何苦来？但是，这位沉默的、内向的孩子，却是一个极有主见、极其固执的人。他来到上海，穿一身粗布衣服，背一个小包裹，掖下挟着那把二胡，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他就是用这样的形象来闯大世界的，他要用怀里挟着的这一柄“锤”，去砸开艺术之门。

他使用自己的二胡，拉了一曲《二郎山》，“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具有山的粗旷，水的轻柔，遇到“高万丈”那些音符，又能够拔得上去，高亢嘹亮。也许，附中老师不止是听到了这曲优美的歌，也听到了那颗热爱音乐的心的跳动。因此对他特别关照，发给他“独一号”准考证，可免于初试。他就这样一步迈进了音乐殿堂。

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了，他那颗稚嫩的心，为免除家庭负担而高兴，为消去他旁顾之忧而欣喜，他可以一心一意钻研音乐了。

入学第一年，这只小老虎就张开大口想吃天，他试着创作了一支曲子。老师看了认为还好，就拿给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作

曲家丁善德看。丁院长看后很感兴趣，把他叫了去，一只抚爱的大手搭着一个瘦弱的肩膀，来到了钢琴室。丁善德坐在钢琴前，让陈燮阳站在身边。他先照谱子弹奏了一遍，然后逐点分解，“你听，这一小节有没有不协调的感觉？要是这样改就好些了。”他随即照修改方案弹了一遍。“再听，第十六小节的三和弦表示着静，或是河水的稳流，这是好的，但后面应该立即表现出变化来，动与静的变化。”

陈燮阳的脑袋点得象鸡啄米一样勤快，他不仅在艺术上佩服这一系列的指教，更为这样一位领导、名家能那样对他循循善诱而感动。

更让他感动不已的是他刚回到自己的班上，丁院长的批示已通过附中教导处转到班上来了。陈燮阳捧读着它，感受到了字里行间流泻出来的灼热的爱。

“附中学生作品，我已阅过，并了解该生从未学过和声、作曲，错误不多。该生有创作才能，宜注意培养，并有适当的机会给予试奏，以资鼓励。”

唔，那时是一九五四年，正是祖国的早晨，明丽的清新的早晨啊，我们人和人的关系竟是如此无邪、赤诚，一段短短的话，就足以使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记忆一辈子，成为他一生爱党、爱国、爱事业的动力。

他更刻苦发奋了。那一点助学金，他除了买牙膏、肥皂，就是买谱子，买书，节假日很少外出，留在学校练琴、听音乐、作曲。附中毕业后他免试进入了大学指挥系。

每年下乡体验生活，回来之后他总不忘写作，《山区公路通车了》、《新运河》、《养蜂场》、《公社姐妹歌》先后灌成唱片，并经常在接待外宾中演出。他开始学成了一个多面手。他能

弹钢琴、拉手风琴，也能打定音鼓，指挥、作曲……

在指挥系，他从师杨嘉仁、黄晓同教授学习，系统地学习了从西欧到俄国，从古典直至现代作曲家的代表作品。马草顺教授合唱指挥的精湛技艺，使他得益匪浅；黄晓同教授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也使他深受感动。一天，他听说黄教授病了，正打算抽空去看看他，碰巧同学捎信来了，“陈燮阳，黄教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他立即去了，见黄教授倚在床头，额头上还搭着一块毛巾，床头柜上还放着药片、开水……

“教授，您哪儿不舒服？”

“人老了，体质弱了，病就来欺负人。”有气无力的声音，一张消瘦的脸烧得通红。

“那您好好休息吧，要不要我去请校医？”

“不必，叫你来是上课的，别因为我身体不好，把你功课给耽误了。”他掀开被子，坐起来，走到转椅上去。

陈燮阳惶恐了，“老师，哪怎么成？还是我自己复习吧！”

“该上第十课了吧？陈燮阳同学，你先把药片拿来。”

他的手有些微抖，向老师递上药和开水，也递上难言的感激。

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这不是陈燮阳所为。但这一次，他的确“开小差”了，为的是面前这位带病授业的老师。孔子教学时，也还为着那几束肉干传道解惑，而黄老师，却绝没有想到要在这个穷学生身上得到些什么。他完全是为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完全是为着中国音乐之坛上有后起之人……他是含着泪水上完这一课的，这不是平常的一课，黄老师是在教他怎样做人，怎样对待音乐事业，甚至，在教给他将来成名成家之后，怎样对待荣誉和地位。

一九六五年，陈燮阳大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在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史无前例”的那十年中，他只指挥过《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两部舞剧。但他私下里，从没有停止钻研和进取，也没把自己闭锁在铁桶之中，他继续徜徉在世界各国优秀作曲家的谱线里，并准备有朝一日可以毫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才能。

一九七八年，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合作，他指挥古典芭蕾舞剧《葛佩莉娅》，清水正夫团长对他的指挥欣赏不已，谢幕之后，还特地向这位指挥表示谢意。

后来，他作为客席指挥，来往于北京和上海，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交响乐团，深受观众的欢迎。随后他成为这两个团的常任指挥，这在我们国家，还是没有先例的任命。

就这样，一个由我国自己培养的交响乐指挥家成长起来了，他没有凭借异国的土壤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导师，凭借的是祖国的这块热土。音乐的种子在这里滋芽生长，也可以育成参天大树。

D、认识了他这种“土味儿”，就能理解 他为什么对洋引力无动于衷

人怕出名猪怕壮。陈燮阳出国一年，在国内外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要让他留居国外的牵引力也越来越大。在美国、香港，都有人正式或非正式、公开或私下里提出这样的问题：

——凭陈先生的指挥才能，在我们国家也是首屈一指的，留在这里，绝对亏待不了陈先生。

——你这次就不要回内地，就留在香港吧！这里的生活条件不错，也需要指挥，尤其是象您这样的指挥！

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想出国，向往那里的优裕生活条件，没有

“洋后门”还想找一个“洋后门”呢！陈燮阳却有着双料的优越条件，他的父亲，他的一半家还在香港！而他竟无动于衷。

陈燮阳的父亲叫陈蝶衣，是一位老作家、词人，和香港已逝的名歌词作家李隽青齐名。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他就写过不少流行的时代曲。一九五二年去香港，一直作词、作文至今，在东南亚，在香港，凡是会哼两句歌的，恐怕不会不知道陈蝶衣这个名字的。老父亲都七十岁了，他象电影《牧马人》上的那个老华侨一样，有对于自己过去抛却儿子的懊恨，更有骨肉团圆，将儿子挽留身边的渴望。谁的父母不望子成龙呢？有的父母整天把儿子放在膝前教诲都尚不成器哩，而陈蝶衣无管无教，三十年后蓦然相见，儿子竟成为一个名指挥，不仅没有“辱没门风”，反而使他“门庭生辉”，那份欣喜，那份激动，恐怕是难以如实形容的吧！

老父亲赶到了九龙机场，张开颤抖的双臂，将站在他面前的儿子拥抱，搂抱得是那样紧那样紧，生怕把“拾回来的儿子”再度丢失，老泪串成珠线往下流，那是苦的泪、酸的泪、辣的泪，也是甜的泪！

在陈燮阳逗留香港的日子里，正好有一天是中秋节。陈蝶衣和他的夫人忙碌了一天，准备了一桌子佳肴，在洋行当职员和在电影制片厂当化妆师的两个弟弟，也都把他们的夫人带来了。

“除了你的大弟弟在比利时，咱们全家就算团圆了。啊，还有你的夫人王健英，要是这时候也在这里——”老人既兴奋又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来，燮阳，把酒杯端起来，为了这一次难得的团圆。”

两只酒杯碰在了一起，弟弟和弟媳的酒杯也飞快地举起来凑趣儿。

继母的殷勤真叫他感动，她穿梭于厨房和餐桌之间，每端上一样好菜，总要先布到陈燮阳面前的碟子里：“燮阳，尝尝这红烧对虾。”“燮阳，这海参、玉兰片的三鲜丸子，妈专门为你做的。”

老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脸对着燮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燮阳，有时这种悲欢离合，是人为的。例如，当初爸爸不离开大陆，哦，那是过去的事了，要是你能留在香港不走——”

“爸爸，我不能，我要回国干一番事业，在国内我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陈燮阳固执地摇了摇头。

“是啊，是啊，”老人点头赞同，“从事业来说，还是在国内有发展，要是当初我把你带到香港来，也不见得有什么现在的成就。”

“阿哥，”那个在电影制片厂的弟弟说话了，“香港音乐界纷纷在议论你呢，乐团的经理刘慧德，乐评人魏国成，还有‘泛亚’指挥丘天龙，都说阿哥指挥是第一流的，他们说你使音乐赋予了生命，能在最宁静的旋律中自然感觉到音符的存在跳跃。他们说象你这样的指挥，在香港还找不到，要是能留下，不是发大财啦！”

“是吗？燮阳。”继母问他，“前天，你送来了票，我去听了一下，什么也听不懂，大概是高深得很。这些人说好，准是好！”

“阿哥，你就留下来吧！到哪里不是吃饭，再说，阿爸年纪那么大了——”在洋行做事的弟弟说道，眼里流露出真诚的挽留。

陈燮阳感到这家庭感情的灼热，他有些难受，也有些动心，沉默了片刻，又摇了摇头，“不，爸，妈，弟弟，别劝了，我还

是回国内去，要知道，我的本事是在国内学的——”

他的心，不但指挥着音乐，也指挥着他的行动。

是的，爸爸，当你只身赴港，把姐姐和我抛在乡间的时候，是谁在继续抚爱着我培养着我呢？不就是我的祖国、我们的党吗？尽管那助学金是微薄的，正是它才使我安心地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这种爱还具体体现在丁善德院长的笔下，黄晓同教授的床前，它甚至比父爱更深挚、更伟大。

是的，爸爸，你的儿子现在成名了，也许有许多国家会容纳我，但我能抛开使我成名成家的祖国吗？那些国家崇尚和需要的是有贡献和作为的学者名流，但它们会用同等的爱去拥抱那个乡间穿着粗布褂的穷孩子吗？只有祖国没有嫌弃他。现在，他难道应该嫌弃至今还贫穷的祖国吗？

再见吧，爸爸，在你的爱和祖国的爱之间，也许我只能择一而终了。那么，我应当选择后者。我可能永远是个不孝之子，却要永远做个祖国的赤子。“洋装虽然穿在身，可我的心依然是中国的心，”说得真好！既然我有一颗中国心，既然那高天阔地的大陆上容得下这颗心，我何必强留在国外，使这颗心永远沉浸在乡愁的苦痛之中呢？

他毫不犹豫地回国了，留给父亲的只能是一缕愁绪。

孩子走后，老人在杂志《银色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指挥音乐”的孩子》，他在文中记述了第一次接收儿子来信时的欢乐：

花枝正自饰春妍，
忽有飞书下九天，
辨字只疑非熟谙，

审名方悟是团圆。
大开笑口三千刻，
中断亲情廿六年。
偏影一帧撑眼认；
小斋添得小驀肩。

他也在文中倾诉了这次离别的哀愁：

“送别之时，我目送着孩子的背影，冉冉远去。一缕愁绪，在我心头萦绕。我只能无限感伤地吟哦着：‘你！背向观众的人，何时再能见到你面对着我？’”

E、他的超人才华、卓越的品质， 使参加大歌舞的人们叹服

《中国革命之歌》的乐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三十多位演奏员。要让这么多队员既佩服他的指挥才能，又佩服他的团结人的本领，决非是一件易事，而陈燮阳竟然毫不费力地做到了。

参加大歌舞作曲工作的有时乐濛，刘文金、陆祖龙、王士光、田丰、王竹林、张丕基、谷建芬等十三位作曲家，在外面协作的还有李焕之、瞿希贤、施光南、生茂、唐诃、彦克等十三位作曲家，人们称前者为“内十三太保”，后者为“外十三太保”。这二十六“太保”是中国作曲界的精英，要使这些人物都佩服陈燮阳的指挥才能，更是大不易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们竟也人人都伸出了“大拇指”，对陈燮阳心悦诚服了。

陈燮阳有非凡的才能，他把才能无私地为《中国革命之歌》奉献出来了。只因为他理解他的事业。《中国革命之歌》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概括了一百五十年中国人民从屈辱到反抗，从反抗

到胜利，又从胜利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整个艰辛的历程，他孜孜以求为之献身的，不就是这样的事业吗？

八三年的十二月上旬，作曲家们为了纪念毛主席诞生九十周年的演出，一个个都忙着突击作品。《春回大地》一段舞蹈和一个独唱，配器不理想。一合乐，不但演奏员感到象缺少了什么，连独唱演员彭丽媛也感到不适应。她十分为难地说：“崔老师，我看别唱了，您说行不？这歌不适合我唱。”站在旁边的陈燮阳却轻松地说：“不要紧，今晚我突击一宿，把总谱全部弄一遍，保证明天下午不耽误你排练。”

配器，是创作中的一门专门学问。一个大乐队，有一、二十种到三十来种乐器，每种乐器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长，小号不同于提琴，双簧管又不同于长笛，民乐和西洋乐器有中外分野，管弦乐与打击乐有任务的不同。配器，就是根据乐曲的主旋律，给每种乐器创造出不同特色的演奏分谱，而当这些乐器组成一个大合奏之后，又显得那样和谐、统一而气势磅礴。

崔维聪大吃一惊，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起码是三至四天的工作量呀，隔行如隔山，你，陈燮阳，莫不是吹大牛吧？

崔维聪笑着说了一句：“老陈，军中无戏言，你可包下来了？”

陈燮阳依然是一副轻松的态度：“我只要说了，保证完成任务。”

从当天下午五时开始，陈燮阳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就开始写总谱了。他嗓子有痰，崔维聪在隔壁房间里，几乎听了他一夜的咳嗽和嚓啦嚓啦划火柴点烟的声音。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他才把门打开，走了出来。“好了，总谱出来了，剩下点扫尾工作。”老崔走近他的写字台，果然那一叠总谱，已抄录得整整齐齐。崔维聪十分感动说：“你快躺下睡一觉吧，剩下的归我了。”

第二天下午一排练，的确旧貌换新颜，效果大不一样。激动得彭丽媛象个孩子似的，拉住了陈燮阳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这个善于唱歌的独唱演员，竟口齿木呐起来，反复吐出的就是这样一句话。

激动和感谢是在情理之中的，如果不是他这样疾迅地把总谱和分谱写好，换一位慢手向后延宕几天，这个节目也许就来不及审查通过，也就不可能保证毛主席诞生九十周年的电视录像了。

按照音乐界的“自由市场”价格，写一个配器要三十块钱，他又完全是业余劳动，领导小组和会计都同意给他补助。老崔对他一说，却遭到他一口拒绝：“别、别别，你要给我钱，我一个音符也不写了。”是的，如果他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他不会恋着这块大歌舞的贫瘠的土地，他可以留在香港，留在美国。

用钱能买到指挥匠，买不来激情，买不来不要命的工作精神。他在“大歌舞”这样勤奋工作，除了规定的工资、补助，其他分文不取。不，应当说，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一年多的指挥是划不来的，他失去的很多很多，包括经济收入，也包括家庭生活。

爱人王健英，是上海京剧团的年轻名角，台下一表人材，在台上的扮相也相当漂亮。那是一九六七年，因为排演《白毛女》，芭团急需要找一位替舞剧伴唱的女高音，有人就推荐了王健英。她爱唱京剧，也爱唱歌，她来到芭蕾舞团以后，由陈燮阳负责帮她练声。开始，陈燮阳对她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但渐渐发现，这个王健英除了有“刀马旦”的漂亮灵巧的身段外，还确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只是缺乏基本训练，他一次又一次帮她排练，学业与爱情齐飞。等到王健英能够在演出中伴唱时，爱情也成熟了。

深沉挚着的爱因结婚而趋于平和，也趋于永久，遗憾的是这

爱还缺乏结晶。王健英三十六岁了，还没有孩子，两人常不在一起，是一大原因。出国一年以后，陈燮阳又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现在，他来到大歌舞又一年多了，只好不断用“两地书”，传递着他们的伉俪深情。

老崔感到过意不去，说道：“老陈，把你爱人调来吧，大歌舞还需要人。”

“谢谢组织的关心，她有她的事业！”他作了一个“闭门推开窗前月”的姿势，把崔维聪的好意推了回去。他知道这是照顾大于需要，他不要这种照顾！

他也有他的事业，也许，正是这事业，使他下决心暂时不要孩子，暂时忘却情爱甚笃的夫人。而在这一段落的“遗忘”中，他干了多少事业呀！

——他指挥中央乐团为法国“音乐之春”唱片公司录制了贝多芬第一、第四交响曲。

——录制了电影《一叶小舟》和《木屋》的配音。

——录制了电视剧《跨过高度》、《生活的故事》的音乐。

——录制了两套向国内外发行的唱片，其中有他指挥的六首中国作品。

最近，北京市歌舞团聘请他为客席指挥。他的工作更忙了。然而，一个音乐的明星，正在我们头上升起。

一九八四年九月

“我就是我”

——舞蹈家陈翹正传

序

一个瘦骨零丁的小女孩，站在桌前，拿着一支沉重的钢笔，望着那张登记表，既兴奋又犯愁。她才上了十几天的初一，自己的姓名还写不好。尤其中间那一个字，写了又涂，白纸差点被戳穿，字就更没法认了。她怕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责备，因此而取消了进入汕头文工团的资格。

“这是个什么字？”

“霭。和霭的霭。笔画太多。”

“既然嫌难写，就不要它算了。”

“这，可以吗？”两只本来就大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露出一丝惊疑。

“可以，以后就叫你陈翹吧！”

中南局书记陶铸陪同胡志明主席在海南观看了海南歌舞团的演出，他对那个主要演员的精湛表演印象颇深。吃饭时，特意让她坐在他身边。

“你叫什么名字？”

“陈翘，翘尾巴的翘。”

“可不许翘尾巴哟。”陶书记开着玩笑。

“要翘，就是要翘！”那认真倔犟的劲头，把陶铸都逗乐了。

“你父母一定很有学问？”陶铸继续同她交谈。

“我妈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名字是她取的。”

“词语上有翘楚一词，是指最优秀的，你母亲对你期望很大。”

“造反战斗队”召开了批斗“黑帮”的群众大会，一位头头站在讲台上，手指着低头站着挨斗的陈翘说道：“陈翘，勒令你把名字改了。叫陈接！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吧！知识分子不允许翘尾巴。象你这样的反动权威，就应该把尾巴按下去！”“头头”做了个用手下压的动作。

低头的陈翘突然翘起头来，逼视地看了一下“头头”，鼻子里发出了轻蔑的一哼，心里却在喊：“不改！不改！就是要翘！看你们怎么办？”

唔，多少年了，我们一直要那些知识分子别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也许，那不是尾巴，是耿耿忠骨，烈烈个性，是对一些问题的远见卓识，那真知里还带着不屈不挠的（也许因此不受某些人欢迎的）固执。那么，我们难道不可以让这尾巴竖起来，象孙悟空的一样，变成一根旗杆吗？

A、“我最贫穷，我最富有，我没有 被金钱锈蚀灵魂。我就是我。”

她糊涂，象所有专注于艺术、学术而有造诣的人一样糊涂。你问她一月多少工资，是八十几块吧？是一百来块吧？她反倒要

问你。从会计那里领来一把抓，从不好好数一数。“我比我老头还高一级呢，嘻嘻！”她笑了。反正，加上儿子三口人，在国内平均生活不低了。但是，比起她在国外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她算是个穷光蛋，最穷最穷的人。

她在海外的众多亲人中，有亿万富翁的银行家，有工厂主，有职员，也有打工仔。物质生活是富庶的，精神却有些空虚。亲妹妹来信告诉过她，说她自己是一条真正的“啄米虫”，整天躺着看电视打电话。亲人们多次来信，劝陈翘出去，哪怕是去逛逛世界，享享福。她却从来没有萌生过这种念头，她不愿意做一条“啄米虫”。

一九八二年，她带团上深圳演出，她妹妹带大姐来看她，姐妹俩分别三十六、七年了，这是第一次再见，亲热得不得了。陈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个旅店的一张床上，晚上好在一起说说知心话儿。姐姐长期住在香港，对咱们共产党的政策有疑虑。她选深圳这个地方见面，是一只脚跨上大陆，一只脚还留在香港，随时准备把前脚缩回去。

见面几个小时里，那边妹妹陪着，这边由她家的“床头柜”陪着，四个人没顾得上说几句话。你想，陈翘的爱人是团长，她是副团长，其实她是团长的团长。当晚有晚会，一会儿有人来请示：“团长，是不是把第六个和第七个节目调换一下，不然演员换装忙不过来。”一会儿另有人请示：“团长，是不是吃饭提早半小时，化妆可以从容一点。”忙得不可开交。她既要说闲话儿，又要处理问题，真有点够呛。可她心里那个乐呀：爱人象杨宗保，她就是穆桂英，大帐里一边和“外国使节”茗茶，一边又从容布兵，真有那么点大将风度哩。她也存心让大姐看看，她一直呆在国内，呆在共产党管理的大陆上，是呆傻了？还是呆聪明

了？大姐真有些看呆了，她惊讶：分别时不到十岁的小孤女，竟成了指挥百把十人的领导，共产党的制度真能出息人呀！

陈翘乘机邀请说：“大姐，你晚上看看我们的节目吧？聊不完的话，夜里上床再聊。”

姐姐象被蝎子咬了一口，“不去不去，你们国内的节目在香港演出过，也是袒胸露背的，有什么好看？我们那里挑的是美女，年老了就不下场子了，你们那里五、六十岁的人还上场装模作样，难看死了。”

妹妹对她说了一句笑话：“现在我陈翘姐姐是班主，你要看看她的成绩啵。”

“那你是允许我到剧场去打瞌睡啰？”

去吧！去吧！你爱打瞌睡，就尽管在那里打瞌睡吧！经她和妹妹一拉拽，姐姐终于去了。

到了后台，大姐一看她们的服装那么讲究漂亮，后台秩序又那么好，就有了两分喜欢。再看演员，左一声团长，右一声团长，对她那么尊敬亲热，她是团长的亲姐姐哩，自然也感到有一份荣耀。她已经有三分的喜欢了。

嗨，满台是充满着民族风情和热乎乎生活气息的歌舞。《三月三》里，有黎家欢腾的情，《草笠舞》里，有少女可爱活泼的憨态，《胶园晨曲》中有劳动的喜悦，《踩波曲》中有潜水姑娘诗意的美……她坐在姐姐旁边陪着看，发现她激动了，两只眼睛瞪得是那样大，没有一丝想瞌睡的意思，嘴巴张开也忘了合拢了。最后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太好了，你们这台节目太好了，你们应当拿这样的舞蹈出国呀！”

那夜里，她和大姐几乎整夜没睡，那滔滔不绝的话里，还有一个重要题目，就是动员她到香港去。

“原来老想让妹妹给你写信，动员你到香港去。你在国内受了几十年苦，共产党的政策又不可靠，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哥哥姐姐都有能耐，想把你接出去享享福。经下午、晚上这一看，真想不到你的管理能力这样强！这就更好了。我希望你替我去管理工厂，一定更赚钱。我身边没有至亲能干的人，让一些人抹油坑骗了不少。有你这样能干有魄力的妹妹在我身边，我一切都放心交给你了。”

“不行？我肯定不行！”她回答得很硬，也许刺伤了姐姐的心：“你们再有钱也不是我的钱。”

“哎呀呀，你怎么这样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无母姐为娘，我将来都可以传给你。”

她不想当伸手派，她从小过惯了独立的生活，她有她的人格，这无论如何办不到！

“不算白送你，你可以当工厂主，自己赚钱嘛！”

“那更不行，姐姐，当工厂主，必定要剥削工人，还要大鱼吃小鱼，小鱼被人吃，别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就是还是个非党员的陈翘，我也狠不下这份心。你别看我外表很凶，我心肠软，是糯米糍粑心，见别人受苦，我受不了，肯定要把你全部家产送给穷人。”

姐姐，让我来告诉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工宣队进团来整我，其中有个人，整得我好凶呀！有一天我又被叫去交待材料，发现就缺了那一位。我说：“怎么没看见×××呀？”一个工宣队员告诉我：“他呀，这回可惨了。母亲病重，送到医院里去了。老婆带了孩子从农村到医院来陪护，一家人只靠他一人的工资吃饭、看病，现在他老娘又病危了。申请救济，上级又不给，唉——”你说怪不？我倒可怜起这个整我

的人来了。一次请假去镇子上，我到邮局去给这个工宣队员寄五十元钱，我想如果写上我的真名实姓，人家非当成“糖衣炮弹”不可，我于是顺手写了“一名文艺战士”，就把钱寄出了。后来他们把这当成学雷锋的一个例子，反复查询，怀疑到我头上来了，就来问我，我连忙否认。“没关系，这是做好事嘛！”“正因为是好事，我才不敢冒认，占了别人的光荣。”姐姐，你想，我对我恨的人都施怜悯，管你的工厂，还不把你的产业卖光了？

还有，姐姐，你知道我在国内的地位吗？我是歌舞团副团长，是省舞协的副主席，全国舞蹈协会理事，党和人民器重我，给了我莫大荣誉。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奋斗的天地，有爱我信任我的广大观众，黎族人民甚至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这已经足够了，我为我自己骄傲，我为什么非要上你那个世界里去，为了获得那几个钱，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热爱的事业呢？

亲人们心里充满着矛盾，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她们不理解陈翘所热恋的那个世界；自然，陈翘也同样不能理解她们的那个世界，无论是物资的还是精神的。

这倒使陈翘产生了一种渴望：真想到那个世界去见识见识，它靠什么魅力使国内的一些人如蝇逐臭，想方设法往那里飞？这魅力对她是不是也起作用？唔，别忘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她们省民族歌舞团恢复建制前，就有二、三十名团员和干部去到了香港呵！

八三年的亚洲艺术节，广东省派出五人小组去观摩、学习，陈翘和她爱人刘选亮名列其中。

知道刘选亮、陈翘到达了香港，那在香港的二十多名老同事凑钱为她俩举行了一次叙旧宴会，地点设在伦敦大酒楼的雅座厅。

宴会开得很晚，人来得更晚。因为在香港，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搏钱”，熟人们也很少见面，借为陈翘她们接风之机，才终于大家相聚在一起了。和陈翘她们一见面，大伙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都象发神经病似地哈哈大笑起来。陈翘本来是最爱笑的人，竟在这场合下甘拜下风了。

“你们怎么都这样爱笑？”陈翘不解地问。

“啊，我们是来求解放的。”一个说。

“哎，我们是用钱来买两个小时自由的。”另一个说。

“你不知道呀，翘尾巴阿猫。”第三个说，他叫着陈翘的绰号：“我到香港这几年，整天搏、搏、搏，累得要死。”

“我们现在都是现原形来啦！”

所有从国内近几年到香港去的人中，为了生活，干着形形色色的工作，有摆地摊的，有当工仔的，有干短工打杂的，自然，也有个别发财当老板的。有些人失望了，想再回到国内来，另一些人失望了，把宝押在儿子女儿身上，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大学，想让下一代出国留学，光宗耀祖。那些个别得意了的人，则一头扎在钱眼里，计算着亏本和盈利。不管是哪一种人，“搏钱”的念头都占据了全部的大脑。奔波、苦恼、忙碌，把“拼搏”的发条上得紧了再紧，直到快断裂的程度，使自己的身子在这“搏钱”的世界漩涡里象陀螺似地转个不停。

大伙又爆发了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

酒店的其他客人和跑堂的都吃惊而奇怪地看着这疯魔了的一群。

每人都端起一杯酒，酒里浸泡着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却都是献给刘选亮和陈翘的。

——祝贺你俩，升任民族歌舞团团长、副团长。

——祝贺我们海南歌舞团柳暗花明又一村。

——祝贺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族艺术的巨大发展。

——祝贺……

大家碰杯，一干而净，酒是辣的？苦的？甜的？各人喝在嘴里都有各自的滋味。

当年团里的一位老同志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你们以祖国的使者身份，来到香港了，多光荣啊！珍惜你们的前途吧！致力于你们的事业吧！再努一把力，冲向世界的舞台吧！我们，咳——”

他说不下去了，皱着眉，猛地将一杯酒一饮而下。……

倒底谁更值得令人羡慕呢？似乎他们更要羡慕刘选亮、陈翘一些，虽然她俩没有什么钱。看来，人世间还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

她试验过了，彻底地试验过了，这个世界对于她没有一点魅力。她把发给她而节余的港币全买了演员化装用的金银纸和演出服上的金钱。以至海关人员对她的过于轻便的行李大为惊奇。

“就这么一点吗？”

“全部的都在这里了，你查吧！”

“好吧，你的行李可以免查。”

她笑了，她回头一瞥那个世界，微笑着向它告别。

**B、“我是官僚地主的小姐，我是华侨工人的后代，
家庭出身不等于我的信仰。我还是我。”**

妹妹余恨未消，惊悸犹在，在香港请陈翘吃饭时，说道：“在国内没有好人，那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在座的客人说：“那你姐姐呢？她还是共产党员呢。”

“她例外，她是唯一的好人。”

也许不应该责怪陈翘的妹妹，而应当责怪极“左”的路线，它伤害了相当的一部份人，包括陈翘。

陈翘父母的早年，都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贴过标语撒过传单。后来父亲从黄埔军校毕业，身佩蒋介石赐给的“中正剑”，成了国民党军队里的中校参谋长。可他又是在四四年和日本侵略军作战时阵亡的。母亲虽然以后没有找到组织，因此离开了团的组织，可她真心实意拥护革命，曾启发不少热血青年投奔革命。这个家庭虽祖籍农村，在农村却没有地。当陈翘长到七、八岁，父亲牺牲之后，家庭就破落了。母亲养不活九个儿女，只得把五个孩子交给父亲的把兄弟、潮汕有名的大土匪头子、国民党乡长陈某去抚养。这陈某有七个老婆，数大老婆最刻毒。几个孩子的粮菜，都得一天去领一回，由大老婆定量发给。弟弟妹妹们吃不饱，经常哭闹。小陈翘就想了个点子，把装米的罐头盒底往外敲了敲，使它的容量加大些。这主意很快被大老婆发现了，她狠狠地敲了陈翘一下脑袋：“哼，你鬼聪明！”又用手使劲一别，盒底反而凹了进去，这下子小弟妹连稀饭都吃不饱了。但在外面，为了装样子，陈翘她们身上的服饰也还光鲜，她依然是乡长慈善事业的证明。小陈翘颇象狄更斯笔下的小奥列佛尔，在孤儿院里，在有人参观时才有少许正常人的生活。等到母亲一次看见了陈翘，见到她竟瘦成一根竹杆，一切都明白了，加上陈翘趴到她怀里一哭，她几乎肝肠全断。她是下决心不让自己的儿女再去享这份“福”了，就都接了回来。而这时，潮汕地区快解放了。

该怎样给这个家庭定成份？给她的父母论功过？给小陈翘定出身呢？今天想来，这也许是道微积分运算题，需要有高等数学水平的人方能解得了，而当时一些干部的政策水平只有高小程

度，他们只会加减乘除，不，只会加和乘两样。因而一顶帽子落到了陈翘和姊妹们的头上——官僚地主家的阔小姐阔少爷。这或者不应当叫作“帽子”，应当称作“负重石”，沉沉地压在陈翘灵魂的背上，让她弯着腰走过了三十年的人生的旅程。

一直向往革命的母亲曾鼓励过若干青年去参加革命这一道“分列式”，按理应当有个极简单的解法，但在极简单头脑的运算下，变得无限复杂起来。为什么一个国民党的官太太，要鼓励青年去参加革命？她怀着什么动机？什么目的？这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青年是不是特务？她本人到底“军统”还是“中统”？该死的小陈翘从小不知好歹，在前头我们所说的那张登记表里，在“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工作”栏上，竟大胆填上了这么三条理由：爱好文艺；无钱上学；妈妈叫我参加革命。妈妈既然是一名“特务”，她介绍她参加的是什么样的“革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小陈翘呀，就凭你稚嫩的心和天真的笔写下的这么一条理由，就足以使一些政审的工作人员以及以后的“造反派”的耳朵里塞上耳机——那是专门翻译“反义词”的耳机，来听你那天真的诉说了。

在农村批判地主的斗争里，陈翘的家庭自然不能幸免了，（笔者绝不是妄加评论这次伟大而正确的运动。）母亲长期卧病在床，只好让嫂嫂去挨斗，嫂嫂按着政策争辩几句，说我们家没地，不该评地主，就被一些人打倒在地，用脚狠狠踏在她怀孕的肚子上。她被折腾得差点流产之后，离婚而去。这时陈翘已经参加革命，挨斗的命运落到十一岁的妹妹身上。她被大人扔进水塘，要她认罪，脏水灌了几口，吐出的仍是天真的话语：“我无罪，我是新中国的好儿童！”于是，爬上来，再扔下去，再爬上来，再扔下去，脏水灌了一肚子，吐出来的仍是至真的语言。打那以

后，妹妹害怕了，动摇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就千方百计申请去了香港。她对国内的印象和记忆，是在最严酷的那一瞬间被截断了的，她也只能从那样一个镜头下续想那并不如她所想的续篇。

身入文工团的陈翘被领导找去谈话了。

领导：“据查，你母亲是个特务，陈翘，我们希望你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坚决与你母亲划清界限。”

陈翘惊愕地张嘴有顷：“那——好吧！我和我妈划清界限！”

一切儿时的回忆又都涌上心来，爱母之情大有掩盖她革命坚定性之势。

“不象呀，我妈经常看《铁流》、《延安三月》这样一些进步书籍，她挺要求革命的嘛？”

“那是伪装，哪个当特务的会把真实嘴脸暴露在革命群众的面前呢？”

“她后来一直生病，长期住医院，我还看她吐过血——”她想到母亲在病床上的可怜相，呜呜地哭了。

领导紧皱起眉头，对于这一滴滴“丧失革命立场”的泪水，他是极不喜欢的。

而陈翘，你也太不识时务了，这泪水绝不能为你的母亲洗涤，只能淋湿你欲行的前路。

“病也可以装出来的嘛！至于吐血，医院里有的是红药水，你妈是医生，这还不懂？”

她幼年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全被解释成一种幻觉了，她也不知不觉相信起事实之假和幻觉之真来。

直到这次谈话半年之后，还是这位领导，找她谈了第二次

话：“陈翘，你妈的问题查清了，不是特务。”

然而，她家庭成份的堪误，到一九八〇年才更正。

她已经成为广东省民族歌舞团的副团长了，党的大门却为她开放得更为迟缓一些。她七三年递交入党申请书，终因这个家庭出身的大包袱，使她跨不进门去。因此她觉得要解决组织问题，必先落实家庭出身问题。好在那时中央三中全会已经开过，许多的政策都在落实之中，祖国已是一派晴朗的天空了。

终于几经周折，在中央落实华侨政策文件下达后，她的家庭被评为“华侨工人”。

陈翘听说之后，哈哈大笑起来，连眼泪也笑出了。这是甩脱重负之后轻松愉快的笑，但在开心中又觉得有几分滑稽：“哈哈，我一夜之间由狗崽子变成领导阶级了！”

在接收新党员的支部大会上，陈翘被全票通过，最后，党支部书记要这位即将被党承认的新党员谈一点感想。

奇怪的是陈翘在这些年的磨难中不但没有被压弯了个性，反而象她喜欢的刚直傲立的槟榔树那样，更直楞了。

“我不以为我过去是官僚地主的小姐，革命觉悟就低了，我也不认为今天是华侨工人的后代，就脱胎换骨了，我还是我陈翘。过去我热爱党，今天还是那个样。老实说，比起董存瑞、黄继光，比起保尔·柯察金，我不够，要我马上去为祖国献身，我还会有思想斗争。但比起目前那些为私利孜孜钻营的党员来，我的条件早就够了！”

哎，陈翘，你说最后那句话干什么？不是要刺痛一些人的神经吗？怪不得人家说你骄傲，叫你是“翘尾巴阿猫”呢！怪不得事前还有人从另一方面不叫你入党，说陈翘现在成了著名舞蹈家了，留在党外比党内有影响，让你去参加政协算了呢！

而广大的群众和党员却说：陈翘是个“玻璃人”，我们早已一眼看透了。

C、“我是民族的舞蹈家，我是‘反动的黑权威’， 危难中没有失落过希望。我仍然是我。”

歌德说过：“我们可以随自己的高兴来认识这个世界，然而世界总少不了光明面和阴暗面。”陈翘经历的不都是阴寒，也有暖融融的春日，而其间主要的日子是她长时期在黎家的寨子里穿行，在生活的海洋里遨游。

一九五六年，海南歌舞团的创作组下去深入生活，作为主要演员的陈翘也向领导提出：她也要下去。领导说，你下去干什么？她回答，作为演员也应该体验生活嘛！自然，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她想着搞创作。

生活的海洋是如此波澜壮阔、绚丽多姿，她惊呆了，她被迷住了，她象一头海豹一下子扎进水底，久久不肯浮游上来。月夜的篝火下，她向黎族的“孀考”（姑娘）学话；深山牧场里，她向黎族“帕呀”（老大爷）收集民间故事。村风朴实醇厚，黎民热情爽朗。她同他们一起饮山兰酒，吃山猪肉、黄猿肉、鹿肉，她装出一种男子汉的粗犷、豪爽和不拘小节的样子，什么肉都吃，什么酒都喝，一下子把她和黎民的感情拉近了。从一个个村子到一个个寨子，她结识了不少黎族苗族的朋友。

三月三，春意在大地上勃发的时刻，小伙子姑娘们心头的春意也关不住了。小伙子和姑娘们都钻进密密的树林子里，寂静的林子此起彼伏地传出一声声歌声，陈翘连忙钻进树林，去倾听那一声声动情的歌唱。夜深了，歌声渐渐细微，小伙子和姑娘越挨越近，终于，连一句歌也听不到了。

一片明月被密密的枝叶细割成无数个斑斑点点，洒落到林间的树干、空地里，她窥见了在一棵弯曲的老树叉上，坐着一对情侣，他们相偎搂抱在一起，用无声胜有声的办法在沟通两颗青春的心灵。她蓦然脸红了，她还是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姑娘呀！她的勇敢退却了，匆忙地退出林子。当她重新看到村头那一堆熊熊的篝火时，一粒火星也飞进她的心间，点燃了她的灵感：啊，一个多么有诗、有画、有情的舞蹈素材呀！

回到团里，她向领导摆了这个素材，还粗线条地跳了几段自编的舞蹈。还蛮有点味儿呢！领导提了些意见，决定指派一个叫刘选亮的男演员，来帮她编男性舞蹈，修改舞蹈结构。

这个长着一对漂亮大眼睛的男演员奉命前来合作了。陈翘有些喜欢他又有些瞧不起他。因为他是陈翘介绍到团里来的，资历比她要浅。谁知这个话语不多的青年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使陈翘不得不刮目相看。在他合作下，舞蹈《三月三》终于脱颖而出。这个来自生活的舞蹈一经编成，就显示了它不凡的魅力。它在第一届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时得到好评，光荣地被选为优秀节目，参加了在怀仁堂向中央首长的汇报演出。随后，几乎在全国每个省都普遍上演，还被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艺术团介绍到世界舞台上。陈翘一举成名了。

荣誉还不是陈翘收获的全部，她心中荡漾起的春情甚至比黎族姑娘们的还要浓烈。她主动进击，选择了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和刘选亮谈话。不过，她显然还没有黎家女儿的大方和勇气，在一个小学的操场上，一人坐在浪木的这头，另一人坐在浪木的那头。

把“月下老人”称之为婚姻介绍人果然是名正言顺，陈翘的“发难”就是从谈月而起的。

“你喜欢圆月还是月牙？”

“喜欢圆月。”

“我可喜欢月芽。”陈翘生来就是爱唱反调的性格。不过这次的反调别有用意，她要借此引出刘选亮的话，哪怕是一场你来我往的辩论。

谁知这个三脚踹不出一句话的刘选亮就此沉默了，这叫陈翘又急又没有办法。

她有些没事找事地逛起浪木来。

“别逛，我爱晕。”刘选亮终于又启“金口”了。

“那好，咱们都往中间坐坐。”她想不到这动作竟能歪打正着。

“刘选亮，我上次给你介绍×××，你为什么对人家不热情？”

“你怎么老讲她呀她的，庸俗！”

“啊，庸俗？你说，你究竟对人家好不好？”

“我不爱。”

“你觉得不合适吗？”

“嗯。”

“那你说，你到底爱谁？”姑娘火了。

“其实我爱的并不是她。”

“那你爱谁？”陈翘又追问了一句。这回她没发火，心在咚咚跳了。她意在引出陈选亮的那句话，那句她怕听又爱听的话。似乎，那句话已到刘选亮的嘴边上了。

他就是不吭声，哎，这个笨得要死的男人，这个怯懦的男人。她投掷过去的不是皮球而是沉实的铅球，而他又是一块软地，就是跳不回来，你说急不急人。

“说呀，是谁？我来帮你！”

他站起身来，迈脚要走了。这使陈翘更加着急恼火，“回

来！”她大喝了一声。那两只迈动的脚站住了。

“不说你今晚别想走！”

“你一定要我说？”

“非说不可！”

“我爱的是你！”

这五个字，这陈翘等待着的五个字，一旦听到，她反而傻了。象一个寒冷的人急需向火，到那火太近他的身边，又下意识地匆匆打灭。

静默，静默，从陈翘嘴里嘟嘟囔囔发出来的是这几个字：

“那不可能！”

“是吗，那不可能吗？”

“是，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那对不起，等于我没说。”刘选亮学着英国爵士的派头，礼貌地鞠了个躬，走了。

他把一肚子委屈、惆怅和莫名其妙的烦恼留给陈翘，陈翘气恨得哭了。

这误会僵化了半年，两人的感情才冰消雪溶。而结婚，却是在恋爱了八年之后。她们俩共同选定了一个大吉大喜的日子，这日子就是“三月三”。

五十年代，黎族地区还处于十分原始的生活状态，刀耕火种、赶牛踩田、手捻稻谷仍然是农业劳动的主要形式。泼辣的陈翘不怕脏，不怕累，在五八年下去深入生活时，她天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劳动。有一天晚上，当陈翘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茅屋的时候，她看到这家的姑娘正就着灶堂的炉火，在精心地编着一顶草笠。这画面又一下点燃了她的思绪，她困累全消。唔，草笠，姑娘们把情人从深山采来的野葵叶，精心编织成轻巧的草笠，再

系上心爱的彩带，成了一件别出心裁的装饰品。它象征什么？象征姑娘的巧手和灵心，是她们对美的追求的外现，也熔进了男女之间的恋情。你看在那晚霞熔进碧水的时刻，戴草笠的姑娘成群结队从田塍走来，绕过山脚，嬉戏河间。这个向那个泼水了，飞溅起水花也飞溅起笑声；那个用草笠挡住了脸，又移开草笠，露出活泼挑逗的神情……所有的生活和回忆都被炉火映红的这一个画面燃亮了，一个《草笠舞》的构思，很快带着丰满的血肉，降临到舞蹈园的百花丛中，成为里面别样红的一朵。

一个黎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则消息：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中，中国的《草笠舞》获得了金质奖章。

不仅有愉快，也有艰苦，而在艰苦中获得的快乐比普通的快乐还撩逗她。在向群众学习《打柴舞》的时候，她的脚腕被木棒夹伤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能走路。为了到一个偏僻的村寨去学习民间舞蹈，她冒雨越过蜈蚣山，汹涌的山水，裹卷着一条条半尺长的蜈蚣从她的脚旁流过，吓得她闭起眼睛，浑身发抖。她曾被毒蛇拦住过去路，人和蛇在近在咫尺之地相互瞪眼相持着，从后面赶来的队员替她解了围；她曾走到山洪泛滥的河边，看着身旁流过的死尸，是黎族群众用空油桶浮水横渡激流将她送过了河……但一切的苦都化作了甘甜，当她长途跋涉走进了一家茅舍，黎族老伯立即拿起弓箭，射杀了自养的母鸡，给她补身子；当演出结束，黎苗同胞对天鸣枪表示感激，唱着山歌送她。她满足了，昂奋了，她觉得一切付出都已有十倍的收获。生活馈赠于她的不但是舞，更重要的是黎苗群众的深情厚意。

此后，她一发而不可收，从她脑海中流出的舞蹈也象那爆发的山洪。《碗舞》、《五指山的春天》、《夜渡》、《哎，小伙

子》、《丹心红旗》……一个紧接着一个。只要生活之源不断，她这条溪流是永不会枯竭的。

但有一天，她这条溪流却真正枯竭了。那是她和她的爱人，被关进一间小屋子里，而屋外，“造反派”正为揪出两个“反动权威”而欢呼“文化革命”的新胜利的时候。

性格如暴雨，如山洪，如“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陈翘，哪能受这样的憋呢？她想不通，实在想不通。她全心全意走了一条与黎族人民相结合的路，一条民族化的路，难道全然错了？怎么一夜之间，团里的同志都把她当成敌人？所有的功劳全化成了罪行？半生功罪，谁来替她评说？尤其把她和她爱人挂牌子游街，她更觉得是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人要脸树要皮，陈翘她最爱面子，她是一直不让人在她的工作、为人上说一个“不”字的呀！

刘选亮却比她沉得住气，他轻轻地劝慰气得满脸通红的陈翘说：“别这样想不开，你看，区委书记、宣传部长都挂了牌子了，你权当象我们以往的化装游行一样，就不用觉得难过了。”

这个刘选亮，他竟还有心苦中求乐。但经他这一点拨，陈翘开始稳下心来了。

结婚五年，她只想到一个劲地生产舞蹈，从没有想到要生一个孩子。事情却是那样奇怪，舞蹈生产不出来了，而她却在不知不觉中怀了孕。

她没有经验，呕吐，想吃酸的，以为得了病，请假去医院检查，才知道那是喜兆。她想打胎，两个大人前途危曳、生死未卜，还要这个小累赘干什么。她要求作手术，求“文革小组”出具证明，谁知，第二天，大标语贴出来了，“陈翘想利用怀孕逃避运动决难得逞！”“击退陈翘的新反扑！”怀一个孩子，竟也成了对抗“文化大革命”了？那好吧，不流产了，索性对抗到底！

为了不使陈翘生闷气，刘选亮千方百计找出办法来逗乐。这时，他和陈翘的性格都走向了反面，不会说话的刘选亮变得话多起来了。他提出用下象棋来消磨时光。“不行不行，太费脑筋！”刘选亮于是到小卖部去买来了一副飞机棋。这是一种掷骰子走棋的游戏，掷几点儿走几步，有进还有退。骰子往下一掷，就“六、六”地轻声叫起来，谁掷到一个“六”，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闹得外面看守这两个“黑帮”的“造反派”队员百思不解，以为他俩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从这时候起，陈翘又学会了另一种笑，从痛苦中发出的笑，一种摧散痛苦的笑，她因此更乐观坚强了。

夫妻俩贮存着一笔钱，“造反派”扬言要没收这笔存款，他们就提前取了出来。他们象接近了“世界末日”的劲头，借请假上厕所，偷偷溜进相距不远的小卖部。谁去都两个裤袋塞两瓶果汁水，怀里再揣两瓶罐头。回来就大吃二喝一番，陈翘有时恶心，就用报纸包住罐头，扔到垃圾堆里去，象两个败家子。

陈翘没有沉沦，她变得更达观，也更会生活了。

顶多回家去当个农民。潮汕地区是侨区，那里的牛棚比海南岛的黎家茅寮还高级。刘选亮象结构舞蹈一样，设想了一幅怡乐的美景：把乡邻家的牛屋收拾出来，三口人住进去，陈翘负责带好孩子，由他去种地，把牛屋里的粪便起出来，堆在门前，搞一块小自留地，种南瓜，种蔬菜，一年到头吃不完。

“比咱们现在的生活还强呢！”刘选亮最后下结论说。

“是吗？”陈翘瞪大眼睛，故作不信。

“我能够肯定，比现在强！”

“嘻嘻嘻”，陈翘又笑了，“不过，咱们总得给孩子留几个钱吧！”陈翘想到了未来。

两口子于是把剩下的钱缝进枕头套里，裹进条帚把里。

“这样，把咱俩扫地出门的时候，你就抱个枕头，我就扛把扫帚就行了。”陈翘放心地说道。

可不一会，他们自想自乐，又发疯似地傻笑起来：是啊，要是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他俩一个抱着枕头，一个肩着扫帚，往门外冲出去，叫别人看见这狼狈可笑的形象，那真够意思的。

别以为两口子都真正快乐了，不，他们都贮着一个共同的痛苦：也许这辈子，要同所热爱的舞蹈告别了。这是他们的第二生命，扼杀了他们的第二生命，还有什么快乐可言？那种笑，那种带着酸辛和泪滴的笑，只不过是自己在欺骗着自己。

浪费了那么一段宝贵的时间、青春，没有谁会补偿给她，要她自己去补偿回来。

她加紧编导了《喜送粮》、《胶园晨曲》、《野营大军过山来》等舞蹈，这些舞蹈标志着陈翘的创作道路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喜送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等几个出国访问的艺术团体带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演出，还在香港拍摄的电影《万紫千红》中，作为祖国的一朵艺术之花，介绍给外国观众。

粉碎“四人帮”以后，反映黎族姑娘劳动生活的《胶园晨曲》拍入了电影；新编的《踩波曲》获广东省舞蹈创作一等奖。……

陈翘，时间已经被你追赶回来了，你，该满足了，可以歇一歇了吧？

不，这个南国的身材瘦小的女性，竟奇生出一个比她的身子大几万倍的设想。“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陈翘激动得常常夜不能寐。

她想在大城市建设一个完全是黎族样式的旅游中心，走向这

个特殊村落的道路上没有汽车，只有牛车，住房的外景是民族化的，室内却完全现代化装饰，餐厅是只大螃蟹，剧场是只大乌龟。夜晚，当国际宾客走到室外时，到处能看见篝火堆堆，舞蹈蹁跹，那边在跳春米舞，这边在跳竹杆舞，远处还有“黎民”在射箭，……村民都是服务员、演员装扮的。她想用旅游赚来的钱来养育她的艺术……

她想在广州建立起一个“南民族艺术中心”，用优美的艺术形象，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各民族歌舞艺术及其发展情况。在这个“中心”里，举办民族歌舞训练班，举办各种民族艺术的展览，邀请外国专家来讲学，定期举办“民族歌舞艺术节”……

我们可以把这些设想称之为“陈翹、刘选亮畅想曲”。

她还到处写了信，把这曲“畅想曲”奏给国家民委、文化部民族文化司、广东省的领导听。

愿这一支“畅想曲”能有一个美好的尾声。

D、**“我洒过伤心的泪，我发出过畅怀的笑， 为了大歌舞失败后的成功。我永远是我。”**

正当陈翹力图将这一大胆设想付诸实施的时候，她被调到《中国革命之歌》的编导组来了。

在第一次她参与讨论结构中，说到“文化大革命”时，忽然听到她一声大叫：“哎呀，那太可怕了！”面孔涨得通红，手脚一齐比划，她编出了一段即兴的“文化革命恐怖舞”，把与会者吓了一跳。从那一次起，她落下了一个外号——“红色风暴”。

编导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都在总政招待所的一个四楼上，人们马上发现了“红色风暴”一在，满层楼的喧闹和欢笑；“红色风暴”一不在，整座楼都会变得悄然无声。

如果有一个音响测定器，就可以在远处测定“红色风暴”存在与否。

但有时，也有例外。

那是在紧张编舞的一个阶段里。

分配给陈翘的是要编一段石油工人下海焊接输油管的舞蹈，名字暂定为《海底奇花》。

舞蹈的框架结构出来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百废俱兴，新的油田在开发，巨大的输油管从海底走过。在即将传输石油的一刻，发现输油管的一处出了故障，几名潜水工人奋勇下海，担任起焊接的任务。他们的行动惊醒了在海底沉睡的珊瑚姑娘，她们瞪大了眼睛，看着这群不速之客，并围着他们蹁跹起舞。……

陈翘的任务，是要在这个框架中“填”进一段舞蹈。

她是一个决不走旁人走过的路的人，如果她当县委书记，也就成焦裕禄了。就拿穿衣服来说吧！别人穿过的式样她决不去穿它，不高兴时，可以穿得窝囊、邋遢，高兴起来，一天换一身衣服。在京期间，她还自己设计、裁剪、缝纫了一件式样奇特的旗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她的“床头柜”。

在舞蹈创作上她同样如此，她永远在想如何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对于一个编导来说，这可能是极为可贵的一点。

怎样真切地表现一个人在水中的泳动感呢？她想到了带轮子的凳子，人趴在或仰卧在凳子上，轮子滚动，人就前进了。待搬到舞台上时，只要切光把凳影打掉，一种海中游泳的形象就活现在舞台上了。

她提出她的这个设想，支持者不多，反对者倒不少。但她依然怀着第一个吃螃蟹人的勇气，开始了自己的试验。

她请道具组做了一只凳子，那凳子只能滑行，不能转弯，并

且不稳当，她自己在房间里试滑。象第一次穿上冰鞋溜冰，不时从凳子上摔跌下来，溜冰者都是在冬天，衣服厚，摔一跤也不觉痛，而她则是在夏天，不是头碰到了墙，就是跌下来摔在地板上，闹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变成了一只“虎斑贝”。

风言风语总是在改革者的失败时刻找到它的“青蘋之末”的。

——这好看不，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拿着凳子滑来滑去，这能叫舞蹈？

也许这些预言是对的，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有失败，那么，就让自己去做个勇于探索的失败者吧！

这时，爱人带着儿子到北京探亲来了。看到陈翘满身的伤，疼得心发颤：“何苦呢，练了一身的伤，还惹起了不少麻烦。我看你还是回团里去吧！就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你到家里去搞试验，爱怎么练习就怎么练习，有谁说你？”

她没有心疼自己，倒先心疼起刘选亮来了。哎呀，大半年不见，爱人竟成了一个白发老头了，怎么有那么多的白发呀！

不用问，她自己心里明白。她是个副团长，名副其实顶了大半边的天。歌舞团由海南搬到广州，完全靠陈翘找的省委书记、省长，软磨硬泡，才得以实现。接着是找地皮，是她到规划局里找了六六三十六趟，到处去求爹爹，告奶奶，才使排在几千多份申请之后的申请提到了前头来研究。接着是打报告要钱，盖住房盖排练厅，都是她陈翘扬鞭出马，方才马到成功的。本来刘选亮只抓业务建设就行了，现在两副担子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他怎能不变成过韶关的伍子胥呢？

就说他来探亲的这几天吧！夫妻俩的悄悄话就够说三天三夜的了，却还得抽出两天两夜来商量演员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团里杂务事儿。团长、副团长的职责掩没了夫妻

的温情。

儿子在一旁不满意了：你们俩没完没了地商量这商量那，难道忘记了我的存在吗？难道忘了我已经十六岁，还第一次来到北京吗？难道你们不能抽出那么小小的一部份时间，陪我去逛逛长城，看看十三陵，给予我那部份应该得到的爱吗？

妈妈，你说过，我一生下地，由于怕武斗，你就把我放到乡下，离开了你。接着我刚回到你身边，你就下放、进干校。后来又是编舞、演出，去北京，到香港……。你很少和我生活在一起，似乎早已忘却了我的存在，你不知道我现在究竟是上的几年级，也弄不清我农村中学叫什么名字。你心里只有舞舞舞，没有儿儿儿。妈妈，儿子不象舞蹈，一生产出来，演出成功，就成为社会产物不必管它了，儿子却不行，他需要你不断的关心和爱抚。……

可是，陈翘仍然不能！不是她不想，而是确实没有时间。编舞正处于紧张阶段，那么多男女演员等待着她呢！领导小组催促着她呢！每一周的进度表限制着她呢！你要她怎么办？她没有神仙的分身法呀！

她只得买了两卷胶卷，让一位朋友的孩子带她儿子去长城玩了一趟，可这两个孩子不会照像，两卷胶卷冲出来一片空白，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爆光了。

按理，刘选亮是可以陪儿子去玩一玩的，可他虽然离团几千里路，重担子还压在肩上，他一天到晚蹲在招待所里，排本团出国名单、节目单，撰写广东民族歌舞团建团三十周年的回忆文章……他和在团里一样繁忙。

临分别的前一天，孩子又可怜巴巴地提出来：“妈妈，你陪我到天安门前去照一张相吧！”她没法拒绝了，她没法拒绝孩子这最低微的要求，如果拒绝，她还算得什么母亲？

她们三人去天安门了，如愿以偿地照了一张相，还到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这一天选得不巧，天正下毛毛雨，陈翘也处于修改节目的矛盾困惑之中，脑子很乱，心情和脸色都象这天气，这相片冲洗出来一看，是一色的灰暗。

她把爱人和孩子送进车站，望着这两个男子汉的背影，望着孩子瘦削的肩膀和爱人脑后的一圈白发，一向乐观豁达的陈翘竟呜呜地哭了。她觉得对不住他们。两个人都来向她要债，一个要爱，一个要分忧，而她都没给，他们两手空空地回去了，留给陈翘的是一片负疚。

陈翘决心把《中国革命之歌》交付给她的任务完成，这就是她献给人民的一片爱，自然，其中也包括她爱人和她儿子的。

孩子，请理解你的妈妈，她具有的爱或许比你需要的博大得多。

她又请导具组从新设计了六个凳子，不折不挠地搞试验，终于象个样子了。她把身体力行编排出来的舞蹈教给男女演员，结果向领导小组一汇报，肯定了，竟被认为是大歌舞中最优美的舞蹈之一。

陈翘的朗朗的笑声又充斥了全楼。

然而，由于建国以后第四、五场还要作大的修改。《海底奇花》虽然优美，还缺乏政治思想上的深度和力度。因此她的成功还只是初步的。

她也许还要大哭三次大笑三次呢。

啊，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具有七种色泽的陈翘！

啊，这个七色汇聚的白光照彻身心，对党、对祖国、对民族具有专一的爱的陈翘！

一九八四年十月

生命的乐章

——记女作家柯岩

这是怎么了？柯岩第二次住进空军总医院，竟被安排在肿瘤病区，与各式各样的癌症病人为伍，那是不是说，她也得了癌症？这完全可能！前一次，患严重的心脏病在这里治疗了大半年，医生护士向她唠唠叨叨地说明这病的严重性，要她卧床休养，不得轻举妄动；而这回，医生护士却一反常态，对她的病情讳莫如深了。但从他们查询病情时那种忧郁、惋惜、躲闪的神色中她猜了个八九。况且，她还在一次偷看病历时发现了Ca这样两个字母呢！

人说，癌症是死神下给病者的通缉令，那么，她这次住院，就将意味着告别创作、告别人生，意味着生命要在这里打下一个没有下文的句点或者惊叹号。这，对于她这个五十才出头的人来说，是否太残酷了一点呢？

得心脏病之前，她在工读学校里体验生活，准备为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写一部中国的“教育诗”。第一次住院后，她连提纲也不写了。而这次，禁令是一样的，被禁者却悄悄地反抗了。一俟

医生护士不在，她便从枕下抽出那叠稿纸来，开始忙碌。她要从死神那里夺取三个月、半年的时间，去完成那桩久违的心愿。鲁迅先生就是那样，在生命最后几天里，还在加紧做！加紧做！鲁迅是强者，她也要做个强者，在生命之曲结尾处，要奏出几个辉煌的强音。

然而，自然地，她有时会停下笔来，靠在床架上沉思默想。她在回顾、反省，在批判，自己这不长的一生，是否充实？是否有为？是否无憾？……

二

“她是个漏网的右派分子！”

“混进党内的假党员！”

“自视清高的资产阶级臭小姐！”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里，个别“左”得可爱的人尊封给柯岩的“光荣称号”。就在那时，当她听到这些叫嚷，就立即在心中暗暗否定。不，不不！是党引导我走上了革命人生，指给了奋斗目标，我是这个党里有用的一员，尽管，自己做得还很不够！很不够！……

诚然，有过一个时期，她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党派。那时她太年青，又天真，还不明白党派是什么。只晓得发奋读书，争取名列前茅，捞个享受奖学金的待遇。难怪她，兄弟姐妹太多了，指望父亲的工资远远不够，她必须自我奋斗！

“无党无派最清高”，她的处世哲学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父亲从铁路上的技术员始，读夜大、函大，当上了助理工程师，又晋升为副工程师、工程师，走的是不问政治的路。但她热爱真

理、向往光明！目睹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的灾难，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她能闭目塞听而安坐在课桌前吗？不能！她终于被卷进波澜起伏的政治漩涡中去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祖国大西南的边缘省分云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那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柯岩正在昆明师范读高二。她被激动了，担任起班上的罢课委员会主席，和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地涌向街头，贴标语、呼口号，为加速旧世界的灭亡、催发新世界的诞生而奔走呼号。

一九四九年五月，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在姑苏城头震响的时候，柯岩正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学习。时代的转折、生活的突变，使这位只有一年大学学历的青年人热血沸腾了。她毅然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准备去解放浙江、福建……当她们这几位同学赶到上海参加集训时，又传来消息说，不是南下，而要北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上海招收戏剧方面的专门人材，她和另外几位同学中选，于五月底登上北去的火车，进了北京。她被分配在青艺创作组——她终生从事的事业由此开始了。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向柯岩提出了新的课题：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这年十一月份，她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妇女生产教养院。

当时，为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把旧社会由人变成的“鬼”再改造成人，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全北京的娼妓集中起来，组成了八个妇女教养院，派出几位老大姐负责去教育、改造她们。柯岩和几位年龄相仿的小姐妹，走进了她们全然陌生的另一种生活之中。

高等妓女，恰如曹禺同志在《日出》中描写的陈白露那样，是外国人和上流人物的高级玩偶，陪美国大兵跳舞，挽大亨们看

戏、打牌，貌似安逸雅致。其实各有各的不幸。二等妓女，待遇就大不如前者了。至于三等、四等妓女，生活简直惨不忍睹。她们住在城门洞旁搭成的土坯房子里，向南来北往的苦力出售她们廉价的肉体。一日三餐，是老鸨们扔给她们一些猪狗食。许多妓女，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就染上了梅毒，被糟践至死，然后拖到旷野去喂狗。她们这些毫无例外的悲惨命运，是多么值得人们泪湿“青衫”啊！从这里，柯岩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阶级压迫，共产党又为什么伟大正确。“人类最丑恶的制度莫过于卖淫制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道理，她不是取自理论，而是取自实实在在的生活。

她从改造妓女和许许多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思想工作中认识了党的事业；她从同志间相互关怀体贴中认识了阶级的情感；她从带队老同志言传身教中认识了党的作风，她开始改变自己的信仰了。她怀着激动之情，赶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带队的老同志。

那位老同志接过申请书看了看，笑着启发她：“可你还不是团员呀！你应该先申请加入青年团。”

“我不，青年团是新民主主义的，我要加入共产主义的党！”

“青年团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你得一步一步地来。”

“那——我就是入，也顶多呆一年，一年后，我还是要入共产党！”

“傻丫头，那得看你的表现，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哎呀，真是倔犟得可笑！幼稚得可爱！连党、团的基本知识还闹不大清楚，就想入党。但是，她毕竟进步了，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她开始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虽然她的申请书写得较早，直到1956年，才被吸收进党的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

她的文学素养，得力于家教。父亲虽然是机械方面的工程师，却酷爱文学。陆放翁的诗大部分能倒背如流，自己还写诗、写小说、翻译作品，竟然还出过集子，署名南海冯六。他虽然没有奢望要柯岩当个作家，但培养她的文学爱好却是不遗余力的。当她刚上小学时，父亲就为她买了童话之类的儿童读物，让她阅读，还教她背诗、写诗，对于她写的每一封信，都加圈加点，还来上几段批语，比老师改作文还认真。母亲则是个“口头文学家”，用不着小柯岩去缠她，就一个个故事从嘴里流出来，什么《高亮送水》啦、《铸钟娘娘》啦，最后倒是柯岩受不住困，趴在母亲的膝头熟睡了。

在家庭熏陶下，她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十岁那年，她开始迷上了话剧。呵，话剧原来是这样真切、实在，就象生活的本身，又比生活更能引动人的感情。那里面桩桩件件事情，激动着她，使得她看完戏以后，还不想走，等观众散完以后，她还呆坐在位子上愣神儿。后来，她又看了《孔雀胆》、《法西斯细菌》，她迷上了话剧艺术，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在这样的氛围和迷恋中，柯岩很早就开始写作了，她曾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过文章，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还在《武汉日报》上发表过散文，那时，她不懂什么叫做生活，又该如何深入生活。

值得她深深庆幸的是，在她还不完全懂得深入生活的意义的

时候，她就不自觉地在生活的激流中体验、感受了。这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制定的文艺方针。因为，青艺的许多领导和老同志都是从延安来的，他们自觉地执行着这一方针，她感同身受，自然也得益非浅了。

从改造妓女的教养院回来不久，她又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和一批刚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一起，登上了当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列车”。西去宝鸡，南下湖南，沿途进行慰问演出。那时，不少地方刚解放，路上很不安全。土匪、国民党残兵不时骚扰列车，他们要时时处于严格的战备状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现场采访，就地编写节目，就地演出。生活是紧张的，然而有意义。往往，男同志刚击退一次残匪的进攻，她们几个女同志就在列车上把节目编好了。然后，化装、背台词，又抢着搭土台子。土台子搭好，点亮汽灯，就唱起来演起来。乐得那些铁路职工、铁道兵战士、当地群众直拍巴掌。这种生活常常使她激动得不能自己。记得，在湖北，她们编一个戏，须用方言演出才能出彩。她在湖北生活过，导演叫她演剧中老太婆，一上台，她刚说了句“走起路来一身轻，我上街替俺老头子去过生”，台下立时响起了哗哗的掌声。这支大城市里来的演出队伍里还真有能人哩！乡亲们这样想。乡音一出，和人民群众的隔阂马上消解了，柯岩再次感受到革命文艺的作用和力量。

再以后，她去朝鲜，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从她进入青年艺术剧院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几乎每年都要下去，在生活中滚它半年到八个月。她去过炮声隆隆的福建前线，去过“大漠孤烟直”的新疆边防，接触和采访过难以胜数的工人、农民、干部、战士……如果没有去过辽宁抚顺、她写不

出《我对雷锋叔叔说》；如果没有去过工读学校，她不会写出那些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不会构思长篇小说。她的每一件较有分量的作品，都不仅是才能，更主要是生活的结晶。

四

当她在“文革”的那几年，肉体 and 灵魂都受到“触及”的时候，她就在被关押的小黑屋里，认真地闭门思过。往日，她走南闯北，步履匆忙，哪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地思考问题，总结创作的得失和反省自己生活的道路呢？“文化大革命”给了她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她有时间来解剖自我，回顾思索，……坏事却变了好事。

有哪一部是“黑作品”嘛？哪一篇是“反党文章”嘛？哪一个构思有着不良的主观意图嘛？没有！确实没有！她是倾注了全部的热忱在歌唱党，歌唱党所领导着建设着的新社会，她的创作道路，都是在党的指引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的。

就拿写儿童诗来说吧！那是一九五四年，党号召作家要为孩子们写些东西。贺敬之和她，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从来没有写过儿童诗的贺敬之同志，先开始了自己的实验。有一次，他挑灯夜战，在书桌前整整熬了一个通宵。他是个十分严肃的诗人，平时或低头吟哦，或仰首索句，直到基本成熟，才肯坐到写字台前，慎重成文。而只要坐下，也必有收获，这是诗人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因此，第二天黎明，柯岩见他还伏在案前，满屋子烟雾缭绕，很以为他一定收获不浅了。谁知走近一看，废诗稿塞满了纸篓，桌上纸笺上写的几行诗，也不满意，被粗笔划掉了。他抬起头来，对柯岩笑笑说：“想不到给孩子写作，竟还这么难！”柯

岩说：“那你休息一下，我来试试！”于是轮到她坐到书桌前了。一天过去，竟写了一大堆，贺敬之拿过来一看，笑了，真还有几首蛮不错哩！就帮她挑选了几首，送交《人民文学》发表。大约，这是“性之所近”之故吧！因为那时她虽属青年，其实还孩子气得很。可这例子，她说出来后，经几家报刊、一些记者的演义，变成了贬贺扬柯的佐证，这使她心中久久不安。她们夫妻一向是相敬如宾的，她决无丝毫抬高自己的想法，结果事与愿违，就是她所始料不及的。

同样也没想到，从此，柯岩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一发而不可收，成了这园地里的一名辛勤耕耘又成绩卓著的园丁。到“文革”时止，她就出版了好几本儿童诗集了。收在《“小迷糊”阿姨》集子中的四十首儿童诗和四个儿童剧，就是她赠送给孩子们珍贵礼物。同时，她去学校、去幼儿园、去少年宫，看画展，参加诗歌朗诵会、讲故事会，成了千万个少年儿童的良好益友。当她第二、第三次出现在这些小朋友面前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忽略她的真名，拍着小手快活地叫道：“‘小迷糊’阿姨来了！”

她是个乐观、坚强的女性，很少有什么艰难挫折能将她折服，但“文革”中的“审查”毕竟太漫长了，致使她常常产生不少疑虑、愤懑和灰心。一天，她被押上街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把她的目光全吸引过去了——那是转抄陈毅同志的讲话。其中有这么几句：我不相信我们这个党只有十几个干净人！我不要人保，我要和所有的共产党员一起去挨斗！……一个无私无畏、刚正不阿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屹立在柯岩面前。她敬佩！她感奋！她自豪！她激动得放声大哭。她从共和国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师身上，又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放眼神州大地，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何止千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柯岩心

里豁然开朗，身上的那一点懊丧、沉溺之气被一扫而光了。

她一挺而起，不仅自己充满了生活与革命的信念，还给贺敬之同志不断打气。那时，贺敬之已招惹了不少大字报。什么“三反份子”、“黑帮”、“反革命”，帽子满天飞。她不能同意，她了解他、相信他。于是，她带着刚满十一岁的女儿，在贴贺敬之大字报的旁边也刷上了一张小字报：“贺敬之同志不是三反份子！贺敬之是好同志！希望他挺起腰杆干革命！”

而这时，她自己的革命之心，急于继续创作之心，也急不可耐了。她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空耗，她不允许这样无限期地消磨青春和光阴。所以，当运动渐近后期，对她的看押有些放松的时候，她果敢地写了一份“声明”，宣布：“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理由是“我不是漏网右派，从没有三反言行，‘黑帮’这顶帽子于我不适！”结果，她自作主张，挟着自己的铺盖，从小黑屋里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柯岩，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不是变得颓唐、消沉，而是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意气风发。

于是，她饱和着血泪和深情，喊出了“周总理，你在哪里？”的心声。这是亿万人民的心声，这声音传遍祖国大地，在山山水水间回荡。

于是，她匆匆的脚步出没于全国科技大会、财贸大会、工艺美术会议、全国妇代会……，她还把艺术的触角伸展到更为遥远的异国他乡，东去日本，西访西德……呵，一篇篇明丽清澈、充满诗意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源源流出，如同生活激流里喷射出来的浪花，五彩缤纷、光艳照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奇异的书简》、《记着啊，请记着》是柯岩在短短的三四年中贡献给读者的诗

歌、报告文学、散文集。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既揭示时代的创伤，更表现了人民医治创伤的勇气。最近这些年来，她的文艺观显现得十分明朗。她不赞成那些只写阴暗面的作品、否定现实的作品，更不赞成那些充斥着低级、腐败气味的作品。她认为文学要给人力量！给人希望！

作为一个作家，柯岩遵循的信条是：文艺作品必须真，必须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写作的需要，也是作人的需要！

柯岩除了自己勤奋创作，还挑起了《诗刊》副主编的重担，白天编稿审稿，夜晚伏案写作……她病倒了，是累的，她被送进了医院。

五

她回顾自己一生，坦荡而磊落，匆忙而实在，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那么，在生命旅程的尽头，也不应该是跌落，而应当升腾；不应该绵软，而应当昂扬。……

她一边拚命写作，一边又顽强地与死神搏斗。她参加了气功治癌小组，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起身，和病友一起到玉渊潭公园里去进行一场夺取生命和延长生命的战斗。

一天，那位老主任在查房时刻来到她的床前，高兴地通知她：“恭喜你，柯岩，经过我们再三复查，你的膀胱癌排除了！”

这是真的？是真的！她就象那一次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癌那样傻愣了一下！她真有点欣喜若狂了，想喊，想跳，想抱住椅子转几圈。好在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还能控制得住感情。待查房的

“队伍”走出她的房间，才嘿嘿地笑出声来。

高兴吧！庆贺吧！这对于她，是双重的解放：生命的解放和创作的解放。她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一篇接一篇、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去了。

啊，她忽然觉得，原来这百无聊赖的养病生活，竟也是真正生活的一个乐章。那白色的粉墙、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衣衫也分外显得圣洁、安谧、温馨。那么，能不能试着为这一段的养病的生活，写它一篇文字呢？例如，关于气功，关于癌症……

她已经有了构思了，她把这篇文字定名为《癌症≠死亡》。她从枕下取出些稿纸，跃下病床，把椅子拉近床头柜，开始奋笔疾书起来。

她有些亢奋，有意思！真有意思！象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高手角逐一样，她和死神交了一次手。她卖了一个破绽，死神猛扑过来，企图一下得逞，谁知一个回合分拆开，死神就吃了亏。原来在不知不觉中，她从死神口袋里偷取了一段特殊生活的体验……

（作者后记：当我采访柯岩时，她的那篇报告文学刚开始写作；而当我这篇报告文学刊出时，她的《癌症≠死亡》不但早已在《北京文学》发表，而且获得了全国报告文学奖。她的创作步伐是很难追赶得上的。）

一九八三年六月

巍巍从战争中走过来

“小呀小儿郎，身背书包上学堂。”他是蹦着跳着去的，结果也让他跳了一年级。这主要得力于家教，从小在家，他父亲这个失业的知识分子就叫他认字，培养了他语文的功底，但算术就跟不上趟了，爱好也便发生了偏向。能追到一只兔子总比同时想追两只强得多，事后他才知道算术差并非坏事。

坐在沙发里，得把两只脚架在小凳子上。他告诉我说：他在领导着一个小组，写《聂荣臻回忆录》。为了熟悉环境和历史，今年五月，他去走了一段雪山草地，在天全县，摔了一跤，结果脚脖骨折，在那里住了十八天医院，至今在地上搁长了还觉坠得难受。“经不起摔打了！”他有些感喟。正巧这时公务员小赵拿进来一支试管，那里面的液体成黄褐色的，“啊，至少三个‘+’，才不过吃了一两饭，饭后还吃了一片降糖灵呢。”原来他的糖尿病又犯了。他今年六十三岁，真有点老了，象一匹伏枥老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来到山西前线八路军的——五师，进了军政干部学校。后来又并入八路军总司令部的随营学校。三八

年春来到了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爱好文学的天赋，开始在艰苦而丰富的生活环境里萌发了。延安有个“文化工作者协会”，那是磁石，他是针，经常被吸引到那里去，从而认识了知名诗人柯仲平。这位诗人戴一个鸭舌帽，披一件棉袄，经常在延河边转来转去，想着他的诗句。他那时的《边区自卫军》长诗刚在党刊《解放》上发表。学生们围上就要他朗诵一段，他有求必应。巍巍在这位诗人的诗的感召下，不但热爱起诗歌来，还成为柯仲平倡导的“战歌社”里的一员。在学校里，他和胡征、朱子奇、周洁夫等人把报纸涂黑，挂到墙上，再把各自的作品贴在报纸上，于是，他的诗作便开始“发表”了。

他曾写过一首五百行的长诗《黄河行》，只在墙报上发表过，犹不满足，便忽然心血来潮，寄给了他并不认识却早已知名的诗人何其芳。那时，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和曹禺的《日出》已得到过《大公报》的文艺奖金，诗人却分外谦恭。不但认真阅读了，还用毛笔楷书，给他写了一封详细的长信，这热情这认真使他至今想起来还受着感动。

没有派系，没有门户之见，笔与笔都不会攻奸，心与心都不必设防，象鲁迅小说《社戏》描写的淳厚的乡风，却又比那还高尚得多。老大哥们不但让他骑上脖颈，还指给他看人生与斗争的舞台。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获得了诗的素养和敏锐观察生活的本领的。

还有一桩佳话。一九四一年，他在晋察冀写了一组《秋季反扫荡诗章》，有人替他寄给了已到延安的艾青同志。艾青想选优发表，一直得不到机会；想寄还作者，又找不到地址。就这样，他一直把巍巍的诗带在身边，从延安带到晋察冀，又从失守的张家口带到根据地乡村。从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带到抗战胜利，

又从解放战争开始带到全国的解放，最后终于在九年之后，在北京城里会面时才交给作者本人，而艾青自己的诗却在战争年代里遗失了不少。

在我们革命的根据地里，有着多么肥沃的文学土壤和充足的雨露阳光呀。就象一出什么戏里的台词讲的：连锄柄插在地里都会发芽，何况巍巍这样一个充满灵秀又执著地追求缪斯女神的青年呢！

于是，他的诗作在晋察冀的《诗刊》上发表了。四二年他写的二千行长诗《黎明风景》，还获得了“鲁迅文艺奖”。

一颗新星，开始出现在山巅之颠。

他不象有些作家，未去延安前就蜚声文坛，走到那里，就打开笔记本、拧下钢笔帽，用采访的形式来认识我们的战士。不，他本身就是那个队伍里扎扎实实的一员。他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学过一期政治和一期军事，以“八路军总政治部战地通讯记者团”记者身份被派往晋察冀的。到那里后，先留在军区政治部的编辑科当了干事，参加了《抗敌副刊》的编辑工作。继后又分配到一个老红军团的第一营里去当一名教育干事。这个团出过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也出过狼牙山五壮士，自然也最适宜于出诗人、作家。他参加过雁宿崖的殊死战斗，不用采访，也便有了《雁宿崖战斗小景》这篇文章，他也参加过消灭日军名将阿部规秀的战斗，因而《黄土岭战斗》这篇文章也就随手而得，不用去作什么资料的采集工作。

既然是一名记者、作家，就免不了采访。在一九四三年反“扫荡”的那段日子里——日寇在晋察冀的北岳地区连续拉网、烧杀掳掠了整整三个月的那次大“扫荡”呀，他被分配到易县某村附近的电话站去任指导员，继后又在整个狼牙山地区作了一系

列的采访。他一个人奔波在烟火未熄的村庄与血迹斑斑的田野之中，看不尽大火后的废墟、烧焦的肢体，听不完血泪的控诉。他记得，那个被敌人剥光衣服的妇女，怎样被逼着跳舞，又被兽兵用烟蒂烧她的奶子的。他也忘不了，那个从死尸堆里逃出的农民，又怎样搭拉着一块被刺刀挑起的肉跑了几十里路的。在完县的龙堂村，敌人又怎样把二十余个未逃脱的老弱妇孺，全部关在一个屋里枪杀和刺死的，屋里那一盘炕，成了血炕。那时的所谓采访，是对苦难群众的抚慰和鼓励。他的那首《好夫妻歌》，就产生在反“扫荡”中，是仇恨和群众苦难在催逼着他，使他处于不断的写作的亢奋之中，欲罢而不能。

该是向敌人讨还血债的时候了。四四年秋，他被调往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从四五年春一直到炎热的八月，冀中区全面大恢复的时期来到了。他跻身在攻占子牙河东据点的游击队伍里，“手榴弹机枪掷弹筒，地雷抬杆朝前涌”，脱口而出的眼前景象变作了歌词，又长起旋律的羽翼，去鼓舞另一地攻克据点的战斗；他和河间支队趴在准备攻打沙河桥镇鬼子据点的战壕里，亲眼见那位外号叫“投弹元帅”的战士爆破失利，被敌人机枪打中而当场牺牲。他心火中烧起来了，从而想起要用火攻，他对支队长喊：“快抱柴禾，烧狗日的！”顷刻间烟火裹没了炮楼，被烧得受不了的鬼子连连往炮楼外跳，不是摔死就被打死。战后他一气呵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平原雷火》。他的采访已经溶进了亲身历经的战斗，以至事后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比放电影还清晰得多的现场镜头。

他终于可以在和风习习的清涼之夜里，一个人漫步在大清河北的千里长堤上，尽情欣赏和重新认识一下我们恢复了繁荣，也恢复了欢乐的笑声的根据地了。——“村村/管子、胡琴、锣鼓

声。/ 村剧团演出了《穷人乐》/《翻了身的万年穷》；……呵，可爱的孩子们 / 天天在街上找我揪打；姊妹们 / 给我做圆口白边的紫花鞋 / 环绕着嗡嗡的纺车声。嗨，在这儿 / 我还有了母亲哩 / 有着好多慈爱的母亲；她们抢走了我的破军衣 / 老花眼伴孤灯 / 直到天明。”

他在品赏一下短暂的欢乐之后悄悄地离开了，象饮下了一杯美酒，就赶紧离席，不敢使自己沉醉。因为他还要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他那时已是一个骑兵团里的政委。部队来到灵武县驻防，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说是那个专门同刘志丹作对的政治土匪张廷芝带着几百骑兵流窜到这一带来了。那天团长有事，他一接到命令，集合了三个连队，就出发了。追出去几百里之遥，后来竟又在韦州的王胡子台发生了遭遇。他把枪一挥，大喊一声：

“冲啊！”便身先士卒杀入敌阵。敌人刚在埋锅造饭，仓皇应战，在枪与枪的对击、刀与刀的相碰中，敌人终于留下了六十来具尸体，逃向沙漠了。

有这样丰富经历的诗人和作家，难道他还会缺乏诗的灵感和诗的素材？

他早就这样叮嘱自己，也这样叮嘱他的诗——“记清楚：在这苦战的年代，你应当把智慧也用于战争，把战争也当成诗。”

二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巍巍来到了朝鲜前线。

他起初领受的是这样一个任务：熟悉和了解美军，以便展开政治攻势。因此总政在组织这个小组时，除了干事和处长，还有新华社的夏皮诺同志，他本是个英国人，自然精通本国国语。

他们去君子里的志愿军司令部报到，又被分配到一个俘虏营里去了解美军动态。这任务半个月就完成了，按理即可返回国内。但他们每个人都想到最前线去看看，熟悉一下这不同于国内战争的新的生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老的军事名言使他们找到了继续逗留下来的依据，他们截了一辆大卡车，开始驰越汉江。

在一个深沉的黑夜里，车轮飞快从江冰上碾过。江冰快化了，冰层又不厚，水花飞溅到车帮上，也漫进了驾驶室，但他们终于和驱赶的冰浪一齐涌上了南岸。

和前面的车失去了联系，在这个陌生国土的漆黑夜里，在这片战火烧焦了的废墟上，根本找不到什么向导，他们只得催促司机一个劲地向前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不知谁说了声：“停一停，这里有块路标，看清了再走。”几个人一齐下了车，打开手电一瞧，夏皮诺同志惊叫了一声：“啊呀，是美军的路标，我们快到敌人的阵地上。”

有位同志说：“刚才过来的地方有一条绳子，好象是拦的一条界线，被咱们闯过来了。”

一行人又回去找，才找到那条两军阵地的界线，唔，“楚河汉界”，竟是一发之隔哟，他们又赶快往回开。本来是来了解敌军俘虏情况的，差点自己也送给敌人当俘虏，真玄哪！

终于在汉江南岸的阵地上，找到了我军一个师的指挥机关，巍巍他们呆下来了，一呆就是一、二十天。他亲眼看见师指挥所被炮火打着了，指挥员们把地图一卷，迁移到旁边的一个屋子里，那边烈火燃燃，这边从容谈兵，他感叹指挥员们的沉着镇定、视死如归，他把这战争奇观写在了《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这篇文章里。

他走访了一个军又一个军，一个连队又一个连队。仗打得艰苦而卓绝。在“书堂站”阻击战中，为了挡住敌人，尽管整个山顶都被敌人炮火掀翻了，尽管蜂拥上来的敌人象蝗虫一样密密麻麻，尽管飞机掷下的汽油弹已使战士们处于火海的包围之中，但他们仍没有后退一步。战士们把打光了子弹的枪往地上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年轻的马玉祥，那个站在那里象红高粱一样纯朴可爱的战士，两次冲进烟火，救出朝鲜儿童。而当他也和战士们一起，守在防空洞里，一口炒面一口雪地品尝这生活的艰苦和艰苦中的荣耀时，一个已经有了回答的问题顽强地从脑海中跳了出来——谁是最可爱的人？不是理智的总结，也不是灵感的一闪，而是那么执著持久地占领着他的思想和情绪，迫使他去写这一名篇，讴歌我们永远值得讴歌的战士。

一个肚子里无货的秀才对他老婆说：我写文章比你们生孩子还难得多，因为毕竟你肚子里还有！巍巍是从不会有这种感受的。缺乏素材而要强作文字的情况几乎没有，在取之不尽的战争生活的海洋里，那跳出来的题目、句眼比比皆是，他总是觉得写不完它，哪怕他有三倍的神力和三倍的时间。

《火与火》、《前线童话》，他是在坑道里、掩蔽部里，把纸铺在膝头上写成的。回国后不久，他调到解放军文艺社来任副社长，又继续这未竟的宏愿。三、四天一篇，五、六天一篇，象不会枯竭的泉，汨汨地向外冒着。《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初稿写出来了，李瑛同志的爱人冯秀娟主动要过去，帮助他誊清，作者的眼泪滴在草稿上，冯秀娟同志的眼泪滴在了她娟秀的字里行间。社长宋之的拍板：这篇稿子好，送出去吧！他交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邓拓同志有眼力，有魄力，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

放到一版头条——社论的位置发表了。文章发表以后，他还在《人民日报》亲自召开了有魏巍参加的记者座谈会。邓拓同志含着热泪，亲自朗诵了一遍，然后说：我们《人民日报》也派去了许多记者，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呢？我看主要是感情问题，对战士了解不深，对他们的感情了解不细，对生活的“深入”二字还没有下足功夫……这些话说得魏巍竟不好意思起来，在座的记者中，有许多是他的老战友、老相识，这样高抬他，是不是有点那个？

更觉得有愧于心的是打那以后，到处都请他去作报告、演讲，中山公园还召开了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让他走上讲台去讲那些“最可爱的人”，仿佛他成了“最可爱的人”的化身。其实，他不过是在自己的袖口上，沾湿了朝鲜群众向他忆苦的眼泪，不过是在自己的胃里，消化了几把炒面和雪，他不过是枕着枪声、炮声、炸弹声，和战士们腿捅腿地在一个地道里睡过几觉，或者说，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志愿军要撤离朝鲜回国了，他感到今后再去朝鲜深入生活就困难了，于是他提出申请，又去了一趟朝鲜。这一次，他又感受到了过去从未感受过的动人心魄的生活。那不是——一个两个、一百万两百万人在哭，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哭，哭这样的好军队要离开他们的国土，从此就难以相见了，“相见时难别也难”，这感天动地的场面也使他潜然下泪。他去到了阳德郡，亲见了深秋送别的感人场景。天还未明，一些朝鲜乡亲早早地站列在路两旁了，他们手里拿着红红的枫叶，衣很单，在萧索的秋风里一个个冻得发抖，可谁也没想到离去。志愿军的脚步移动了，人们的眼睛潮湿了，但谁都忍着，竭力喊着口号，不使自己哭出声来。但后来，正如他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姊妹篇

——《依依惜别的深情》里所描写的那样：“可是，当战士们握着老妈妈的手，叫了一声‘阿妈妮，再见！’不知道是哪个老妈妈忍不住了，捧着战士的手，第一个哭出了声。接着是姑娘们、孩子们哭出声来，然后是那些男人们无声的眼泪，低低啜泣。这时候，战士们简直是在朝鲜人民送行的泪雨中行进。这不是哪一个人在哭，这是全朝鲜民族在捧着赤心送着他们至亲至爱的友人！”

还有那么两个姑娘，一定要送到车站，没让她们去，当场昏倒在地上了。巍巍和其他同志把她们抱进吉普车，送到部队营房里救醒了。给她们端来好饭好菜，她们谁也不肯吃一口，痴痴呆呆地望着这些新盖的营房，问道：“他们回到国内去有这样的营房住吗？”

啊，你再了解我们的战士，你能完全了解战士心底的私人秘密吗？你能知道他们经过无数次的轻装以后那个小包袱里面还隐藏着什么吗？巍巍同志可算得是了解我们战士的了，这时却还得睁大惊奇的双眼，看他们一一把小包裹打开。为了最珍贵的中朝友谊，战士们自动把机密泄露了。“这里有爱人分手时连夜做成的手帕，有一参军就背着的绣花袜底，有家传几代的瓷碗，有姐妹的绣花荷包，有洞房花烛之夜的合欢杯，还有未婚妻用红毛线织成的腰带。这些爱物，就是他们本人，也只是在没人的时候，才取出来看一下，接着又匆匆藏起，可是，今天他们拿出来了，而且用红纸题了诗句，摆在这里。”把它献给朝鲜的亲人。

巍巍自己也有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一件羊毛军大衣。那是他在宁夏当团政委时，上级发给团一级干部的。那里面的羊毛，都是精选的胎羊毛，据说每根羊毛都是有九道弯的。由于羊毛细、质地好，穿起来特别暖和。所以凡是出差下部队，他都毫无例外

地带在身边。这时，他也从肩头取下，披到了一位七十五岁的朝鲜民间诗人朴仁俊的身上。这位老人也回赠了五六个他自糊的白纸信封，打开来，都是赠送志愿军的送行诗章。巍巍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诗句。“还乡千里路！雁叫三月秋/两国兄弟谊/苍江不尽流。”……

他不能不感谢在战斗生活中那些激动着他的场面，无论是激越的，还是沉郁的；无论是高昂的，还是低回的；抑或是怒火万丈的，还是感人泣下的……因为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这战争生活的馈赠。

三

如果不算七十年代他以友好代表团的身份去到朝鲜的话，他到朝鲜也一共去了三次。

第一次，他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急于报道那些难以忘怀的战争场面，五二年再赴朝鲜开始，他心里就萌动着一个计划，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与这样一个伟大而不平凡的、又十分宏伟壮观的战争相协调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是一场集中了我军全部政治优势、优良作风和美军的全部军事优势的巨大对抗，而又迫使克拉克上将代表美国在唯一没有打胜的协定上签了字。他觉得只有写一个气势浩大的长篇，才无负于这一场战争。

他抱着这样一个明确的目的，再次去到朝鲜，而且是从当年四月直到五三年一月，一共整整呆了九个月的时间。

他不仅走访了一个军又一个军，还访问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后勤兵站和野战医院。他在寻找他们的共性，同时更注意研究他们的个性。

他仔细观察过炮兵战士开炮的情景。当一名炮兵得有不怕死的劲头。一个个脸被薰黑的战士在坑道工事里脱光了膀子，“为祖国，开炮！”一发发炮弹向敌人阵地射去，坑道里弥漫浓烟，浓烟遮没了他们的身影，只有炮身的不停抖动证明着他们的存在。美军的炮火是够猛烈的了，他们也在寻找着我们火炮的位置，炮找炮，炮打炮，看谁不在乎，看谁勇敢，就象步兵战士同敌人面对面对亮开了刺刀。

那些工兵战士呢？可爱得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大都文化程度很低，口齿木讷，拙于言辞，找他们采访，半天也谈不出子午卯寅来。可你看看他们的驻地吧！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他们对于自己建筑的桥梁、工事，全都怀着一种超乎母爱的情绪，临搬迁时，总要站到自己的建筑物前，默默地呆上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到战地医院里去吧！那些头部负了重伤的昏昏迷迷的战士，此起彼落地喊，“老首长，放心吧！”“通讯员，告诉炮兵开炮！”，有的拉住了魏巍的手：“我要再上前线，得块表，就送给你！”快要离开人间的那些重彩号，说起话来更加动人，他甚至用不着记录，至今还能记得那些感人至深的临终遗言。

他自然没有忘记，去到朝鲜人民军的部队里参观访问，他仔细调查了一个部队，那里面的干部、战士，差不多有一半到百分之七十的亲人被美军或南朝鲜伪军残害。所以他们打起仗来，分外地勇敢。而他们的生活，却是异常艰苦的哟，一月的津贴费只够买一盒火柴，军装也只有一套，夏天到河边去洗衣服，把衣服晾在石滩上，光屁股蹲在树丛里等待着衣干。……

他又去了平壤，认识了这全部已成为废墟的首都。全市只剩下一幢半楼房，那半幢楼房是一个宾馆，只能招待他在那里吃一

顿午饭，早饭与晚饭得到郊区去吃。那一幢楼上站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警察，名叫姜英子，这姑娘的英勇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敌机来轰炸，她不能躲避也不去躲避，炸弹掉下来了，涌起的气浪把她抛起来，重又掉在房顶上，她继续爬起来，屹立在楼顶上站岗瞭望。七三年他重去平壤时，特意想访问一下这位已人到中年的姜英子，可就是没有找见。也许她还在吧！也许，她早已牺牲在那个牺牲了千千万万人的年代里……

一九五八年从朝鲜回国以后，那个长篇的三部曲《东方》，已经躁动于母腹之中了，谁又能想到，从动笔到完书，竟花去了他整整二十年时间呢？

不但朝鲜战争，他有手到擒来的十倍于书稿的素材，就是以冀中平原为背景展开十八余万字的故事，他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原型。

那个郭祥的主人公，其中一个主要的模特儿，就是叫“燕嘎子”的冀中军区任邱县一个区小队的班长。他机灵，多谋，风趣，幽默，他神出鬼没地伏击敌人，却从来没有被敌人咬到过，真有点象西班牙久经沙场的斗牛士，一块红布就能把野牛摆布得满场乱转。有一回，他奉命深入郑州城去执行任务，正遇上敌人的哨兵，他接近了敌人，一抠扳机，枪子子火了。敌人马上用枪指着他说：“你干什么？”他嘿嘿一笑：“自己人，和你闹着玩呢！”

《东方》里杨大妈的性格，更多的是取材于大清河一带赫赫有名的刘大娟。无论部队还是民兵，都忘其姓名而亲热地称呼她为“官大妈”。根据冀中地区方言，“官”字是指属于大家的意思。魏巍同志第一次见到“官大妈”，是一九四四年去晋察冀边区参加群英会的路上。那次去山区的路上，在保定南边沙河踏水

过河的时候，魏巍和其他几个青年干部抢着背几位大娘过河，他刚好背的就是“官大妈”。这位“官大妈”是颇有性格的人物，她敢说敢道，又机敏果断。在敌情紧张的时候，她竟能和那些游击队长、政治委员、县委书记一起在灯光下，共同商议军机大事。她敞披着夹袄，挥动着烟袋锅子，谈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又大多中肯可行，很有一种指挥员的英武气概。艺术作品中的余太君在生活中也许并不存在，《东方》中的杨大妈却确实有其生活的原型的。直至今日，魏巍同志还同“官大妈”一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官大妈”的儿子不久前还代表大妈来看过魏巍，带来了家乡的醉枣、花生、地瓜。

“秋华，醉枣还有没有啦？”他爱人刘秋华同志立即端来了一碟醉枣，让我边吃边采访。那是冀中平原又甜人醉人的新生活？还是魏巍同志与老区人民的友谊？也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

那么，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东方》理应该早点呱呱坠地的，然而，十月怀胎，分娩的时辰竟比怀胎的时辰还长得多。

到一九六五年，这三部曲已经写了一半，这时他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还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后来成为“四人帮”在军队文化部的亲信的那个人，传话给魏巍，要他停止《东方》的创作。魏巍并没有听他的，还在继续地往下写着。到文化革命一开始，那个亲信就抡起“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朝魏巍当头砸来。“魏巍这个老虎屁股有什么摸不得的！”随着他这一声吼，不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都打成了毒草，连他本人也被北京军区文化部的造反派关押起来批斗了。

还是在一九五七年时，他曾经有一个发言，题目叫《本质论——错误的文艺思想》，这是针对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谈自己的认识的。文化部这位“四人帮”的亲信也把这陈年老账翻了出

来，作为一发“重型炮弹”，交给了造反派。在一次北京军区文化部的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批斗魏巍的会上，这篇文章被抛了出来。这算是要把他定成“反动文人”的压轴戏，所以，当时“群情激愤”，大喊大叫：“抓出来！抓出来！可抓住一个漏网的大右派了！”在这样的境况下，《东方》的手稿自然早被没收，他更无心绪再拿起这支沉重的笔了。

一九七〇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东方》的手稿回到了魏巍手中。不过，林彪、“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主义依然是乌云压城，“三突出”、“三陪衬”的创作模式仍然当成了文艺界的“圣经”。郭祥、杨大妈、金丝、小契这样颇具个性的人物正和魏巍自己的性格一样，是不合流的。是前功尽弃，照“四人帮”的指定的路子去套一部小说，还是走自己的路？这不仅是摆在魏巍面前的文艺创作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考题。魏巍决心照自己的路走，准备承担可能袭来的一切危险。他准备着自己的作品不被发表，那就让它服务于没有“四人帮”的时代，让它藏之名山，传之久远吧！

一九七五年秋，在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批示以后，在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七十五万字的初稿终于带着哭声和呐喊落地了。

正当他想精雕细刻，认真加工修改的时候，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刮了起来，而周总理的逝世又在全国洒下了一场人民群众的悲愤的泪雨。

有一件事，改变了他那带着忧郁的看法。那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在无边无际的人潮、泪雨、花山和诗海中，他看到了沉默中火山的爆发，压抑里怒海的掀腾。而他，也是这火山的一颗火星，怒海的一朵浪花。“祖国大有希望！东方

大有希望！”他进一步认识了人民，从而也认识了自己。他急匆匆回到家里，彻夜不眠。在第二天一大早，把珍藏了三个月的悼念总理的诗词找出来，选了三首，用毛笔工整地抄在纸上，带着他炽热的爱，也带着他鲜明的恨，又来到天安门广场，贴上自己的诗词。啊，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开会期间，你曾说过：“魏巍同志来了没有？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现在，我来了，站在你的英灵前，坦露出我那颗深沉怀念的心。我还不够作你的朋友，只能作你的学生。但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你，这颗心没有背叛，它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童贞，铭记着你的嘱咐。

终于，我们的共和国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这胜利的喜悦，催动了他的笔，又经过一年的精心修饰，《东方》最终完成了定稿。

对这书的评价自然不用我来叙述，因为《东方》这部书已被整个东方所承认。

一九八四年八月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上

序

有人以为，军人的牺牲在战场，而平时，只有享受。不然，为什么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说呢？这“养”，岂不是享受的代名词？我要说：不！且不说青藏公路、成昆铁路、引滦入津工程中，每公里土地上都掺和着一名战士的鲜血，就是那守卫边陲的成千上万活着的干部战士，他们又曾牺牲了多少青春、爱好和爱情？

六月，当我以客轮和军用快艇交替、火车和汽车代步，穿行在完达山区、三江平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畔，攀登一个又一个瞭望架，走访一个又一个连队的时候，我接触了许多基层干部，他们牺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爱情！因此，我想把了解到的“少年维特式”的烦恼，说给已婚的大嫂和未婚的姑娘、说给居住在内地的人们听听。

我在一个部队里挑了三名基层干部，三个七三年入伍的城市兵。军队干部在每个年龄区域里都有各自典型的问题，而这些个在坚冰厚雪里献出十载青春的青年，渴望得到的是一条系牢爱情的赤绳。

让我打开月下老人的“花名册”，为读者进行一次晚点名：

孙耀堂，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东方第一哨”的指导员。爱人贺晓燕，大连荧光灯具厂工人。

张洪根，边防×团“夜老虎连”指导员，不久前调到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爱人是上海豫园托儿所保育员，名叫于莉萍。

张仲华，在珍宝岛守岛八年，担任过该连副指导员，八一年五月调到附近连队任指导员至今。女朋友小王，上海一家缝纫机厂的工人。

A、两个指导员的爱情刚在初春里透出 胚芽，而另一个指导员已在匆忙地 撷取秋天的果实了。

北疆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迟，黑龙江的六月，恰似江南的三月、北京的四月天气。边防干部的爱情和这气候一样，在二十五岁以前还“冬眠”着。孙耀堂和张仲华要不是有机会来到大连海滨，也许还会“冬眠”得更长久一些。

七八年，他俩同时被选拔住进了大连陆军学校，而且凑巧分在一个班上。一间宿舍十个适龄青年，那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个半夜里爬起来，拧亮了电灯写情书；那个的女朋友在星期天一早到宿舍门前一声脆喊。这种耳濡目染的爱情启蒙活动，象春天大连的海风，吹得他们心底那种压抑的需求在渴望着释放。

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间，两人都秘密地开始了各自的恋爱史。家在上海的张仲华探家时认识了一位女朋友，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护士。谈了几回，他看中了人家，人家没有看中他。倒不是看不中他的形象，他这个一米七〇身高，不胖不瘦、眉眼分明的小伙子，敢同大城市里的俊小伙比试比试。看不中的是关于——姑娘回绝信上列举的理由是“脾气不合”——鬼才相

信呢！张仲华想，还不是嫌我远在边防，没法天天守在一起向她表现表现“脾气”。

孙耀堂认识的贺晓燕就是大连人，他比张仲华占了地利之光，可以挑星期天去看女方。劳动公园的藤萝架下、星海公园的黑石礁旁，经常留下两人的倩影。姑娘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孙耀堂能陪她看个电影、压压马路就满足了。当然，事后她才体会到，要实现这个要求竟比登天还难。只是危机还潜伏着，不必管它，正象怕冷的人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且不考虑严冬还要来临一样。孙耀堂不失时机地利用他在大连的有限时机，在姑娘心里射进了一支爱情的金矢。他是八月底回到部队的，四月到八月，爱情和气温齐升，他因此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张仲华前仆后继、不畏险阻的努力，是在“第一战役”失利一年之后。母亲为儿子婚事着急了，又添了几茎白发。但终于有了伍子胥过昭关的急智，她到对门王家去串门儿，和小王的母亲唠嗑上了：“王师母，我说句笑话，你别动气，要是让阿囡配阿拉仲华，倒是天生的一对，青梅竹马的，一定不会吵架。咱们是邻居加亲戚，再好不过的，依看那亨？”笑话是真话，用笑话来说，一方面觉得把握不大，另一方面是先寻好退路，老太太自有老太太的外交艺术。

王师母乐了：“仲华倒是个老实孩子，阿拉从小看他长大的，也放得下心。不过这事还得问问老头子，她本人。”

第二天，王师母回话了，她爹与她本人，都同意“轧朋友”。母亲立即把这个好消息禀报给儿子。五十六岁的“先锋官”扫清外围，就等主将出马了。

奇怪的是这恋爱一发生，就有些发育不全，剃头挑子一头热。张仲华一年探一次家，一次一月，这次已过半拉月了，他希

望十几天内能把关系定下来。他经不起持久战，只想打速决战。但是小王呢，总是以太极对少林，以柔克刚：“急什么，还勿晓得依啥时转业呢，等回来再说！”

当六六年张仲华家搬到南临南京西路、东瞰乌鲁木齐北路的闹区时，他们就相识了。那时，仲华十三岁，小王才七岁。虽然天天见面没多少话说，不知不觉中却潜在着感情的积累。一旦被大人们点破，才意识到这积累已到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而经母亲一提，她没有迟疑便应允了下来。不过小王却是个有定见的姑娘，她发觉这一声“轧朋友”的答应，象被劫了生辰纲的杨志，从此便进退维谷。退，爱情的红线一经扯出，颇有剪不断、理还乱之势。她这才发现，原来她那个所谓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有着遗忘了的爱情。进，她是不愿意离开繁华的上海、牺牲缝纫机厂上好工作的，那末万一仲华“傻劲”犯起来，要在部队干一辈子，她就年年岁岁渡鹊桥？

她是一个好姑娘，在缝纫机厂，她每年都要被厂里或是公司里评为先进生产者。只是这问题干系重大，它不象少调一职一级那样吃点小亏，那将是每年十一个月的孤身独居呀！不，甚至可能是一辈子的遗憾。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那不过是诗人的浪漫。现在上海的姑娘，谁的身边不朝朝暮暮守着一个恋人？这是时髦！在这一点上，她和绝大多数姑娘一样，无法不抗尘走俗。

两个同年生、同年入伍又同年进步校的他与他，恋爱一开始就象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杰纳斯，面朝着两个方向。

比他两个年长两岁的张洪根，恋爱倒晚了两年，但他奋起直追的劲头很令人眩目。他八一年三月回上海探家，认识了豫园幼儿园的保育员于莉萍。姑娘三十一岁了，比他大一岁，由于在江

西农村插队九年，耽误了找对象的最佳时机。张洪根是共产党员，连队指导员，人品条件都没啥说的，据介绍人说：找边防军人，住房子还有照顾，她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张洪根连跨三步，一月之内从相识到恋爱进而结婚。如果把相识比成春季，那他经历了夏的火热和秋的丰硕。当那两位指导员的爱情刚在初春里透出胚芽，而他已经在匆忙撷起秋天的果实了。

他感到幸福，在一家饭店里摆开了五桌筵席，门口还停着两辆出租汽车（请原谅他的铺张，他也许对迟到的爱情太激动了）。新娘子长得很美，好多来宾说：很象电影演员张金玲。而且她应酬得体，周旋自如：一会儿给这个客人斟酒，一会给那个客人点烟。形象和表演和谐统一，反衬出从边防来的张洪根，倒确实成了木头疙瘩、土迷糊，只会傻笑不说话，被别人一个劲地灌酒。

他醉了！不仅这场面、气氛，和那甜甜的葡萄酒，还有婚前姑娘信誓旦旦的话：“我长期在农村插队，一个人生活惯了，随你的便，你愿意在边疆干几年，就几年！”一个边防军人最需要的就是这许诺，只要有了它，什么都不再需要了。张洪根是带着巨大的激励奔赴连队的，他决心在边防上大干一场，甚至一辈子！

B、在北疆，夏天的火热是短暂的， 冬日的酷寒却十分漫长

张洪根返回部队后的三个月中，每月收到小于一封信。三封信一个趋势：爱情的热度在递减，矛盾的温度在升高。三封信都是一类内容：原来以为能照顾一间房子，房管局说当兵的太多了，照顾不过来，现在住你家那间小阁楼里，太不方便。上下班要挤车两个多小时，骨头架子都挤散了。你快转业回来吧！不回

来也得赶紧想办法要间房。言词越来越激烈。最后的一封信，还加了几句愤慨之言：我嫁给你算倒了霉！家庭条件这样困难，你又回不来，我一个人在上海，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后悔当初挑花了眼，象我这样的人，怎么跟上你了？

长期的插队生活形成了她孤僻的性格，喜欢孤独又惧怕孤独；她平时和亲友邻居极少交往，常常作茧自缚似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又切望身边有爱人陪伴着。这种性格上的弱点，是在婚后才显露出来的。但毋庸讳言，狂热年代造成她冷漠的心理，而今天的社会环境还不足以融化她这种冷漠，不然，她心头的爱情之火也不至于冷却得如此之快！

张洪根感到大有乌云压城之虞，连忙每信必回，好语劝慰。但如汤泼雪，收效甚微。

也许是鸿雁也惧怕北国的严寒、边境的冷寂，从此，再也没有替张洪根捎来过书信。

这年的十一月下旬，张洪根探家来到上海。他想告别北国的冰雪，但寒冷却在上海等待着他。一进家门，就发生了小小的争吵。

“怎么不给我写信了？”

“心里不高兴就不写！”

“我写了那么多信，讲了那么多道理——”

“你那些话我也能说，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当饭吃还是当房住？”

吵架就象一串响鞭，第一个响罢，连二连三地收煞不住。

于莉萍说人家的男人都先下班去接老婆，她也叫张洪根去接她。张洪根在家的一天是繁忙的，擦地板、抹桌子、买菜做饭，等他把饭做好，赶到十六路车站时，于莉萍已形色狼狽地从车上

跌下来了。头发蓬乱，一双鞋被踩得满是鞋印，合成革的红挎包被挤断了带子，唯独不受损失反而增添了的是满肚子气。恰好，迎面走来了“受气包”，“你为什么不来接我？没你我也不会遭这个罪！今天你看到了吧？我天天是这个样子！”

自知欠情太多，只得赔小心：“我做饭，忘了，对不起。”

“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人家下班都有男人接，十二个月就让你接一个月，还只顾玩，你做饭不好早点做？”

张洪根解释中夹着一点微弱的争辩：“当兵的站在你们幼儿园门口傻等，象什么玩意儿？总不太好。”

“那你不好不当这个兵？当了八、九年了，还嫌没当够？”

这以后，张洪根干活更加勤快，对小于也更体贴了。以前他常常讥笑那些患“妻管严”的丈夫，现在他只能暗暗嘲笑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是“夜老虎”连里的训练尖子，擒拿格斗，飞檐走壁，样样武功精湛，但在老婆面前，只会节节败退。这败退当然不尽在家庭生活的琐事上，因为每一件琐事的背后，总要联系到他转业回上海的问题，因而这种败退，变成了服役态度的动摇。

和结婚的情景骤然相别，他这次是带着一种凄然的心情返回部队的。他原想用家庭的温暖对抗北疆的风寒，然而没有办到！

在秋的丰硕后面，等待他的是一个漫长的严寒的冬天。

无独有偶，孙耀堂回归部队以后，也陆续收到了女方三封来信。从第三封开始，恋爱的热线变成了冷线。不过这个“冷”，细品起来与张洪根的略有不同，这是冷静的冷，而不是冷淡的冷。

姑娘在第三封来信中说：听我们厂的师傅说，两地生活对双方都不利，精神会受到极大的痛苦，家庭生活也会带来极大的不

便。我很早失去了父母，原想找个可以依赖的爱人，现在看来也成泡影。将来有了孩子，怎么抚养、靠谁带？越考虑问题越多。我想问你一声：你能否调到大连来？或者提前转业？

这似乎已成规律，当爱的浪漫转化成爱的现实，热转化成冷的时候，都要众口一辞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转业？

问号的可怕，就在于它有个钩子，要钩住战士巡逻边防的腿、戍卫边疆的心。

孙耀堂越来越感到通信的局限。诚然，信也有优点，当面脸红的话，写入信中不致于红脸。但边防交通不便，最快的信也得个把月打来回，倘若冰雪锁路季节，就得隔上两个到两个半月。这样，一年也只能问答上六、七个问题，比电影上的慢镜头还要慢一万倍。再热乎的爱情，不冷冻在路上才怪呢！因为问话答话以后，便是漫长的期待、猜测、疑虑、担忧，是两种结果的判断的不息纠缠。它多么容易使人急躁和沮丧啊。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承受不住这种折磨的。而遭受爱情挫折的男子和女子，又是意志最脆弱的人。

孙耀堂决心利用休假的机会拐到大连去一趟，他忍受不了这种慢镜头式的对话。

八〇年六月，他在大连住了八天，自然，这时对话比八年的通信还快。

贺晓燕提出：“首先是两地生活能不能解决？长期两地生活，怎么受得了？”

孙耀堂回答：“部队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两地生活，人家能过来，你为什么过不来？”

“我从小没父母，受苦，想找个好对象享享福，谁知还受苦——”

“两人长期在一起并不见得好，平淡，还会吵架，不如分开又见面，久别如新婚，我们等于一年结一次婚。”孙耀堂想用点诙谐来冲淡这种凄苦的气氛。

“那不就是一年离一次婚啦？结婚的时间短，离婚的时间长。”贺晓燕也会讲话，她挽转话头，用幽默来加重愁苦。

“两地的生活不是长久的，我在部队也干不了一辈子，这几年暂时克服一下呗！”

“这可是关键的几年，要建立和建设一个家庭，还要生养孩子。到了老头老太再呆在一起，还有啥味道？”

“生孩子问题，可以送到我家里去，或者让我妈来带。”

“人家一双一对地看电影、逛公园，我一个人过星期天，真乏味。”

“不可以学习学习嘛？你还是初中文化程度，少玩玩，多学点本事。”

“一到电影院，我感触很深，一对对你挨我靠，就我——”

“将来我探家一个月，天天晚上陪你看电影，把一年的场次都补上。”

别看孙耀堂能回答全连百十人的思想问题，却回答不了一个贺晓燕提出的问题。问题是那么多，一个接一个，又实际又具体；回答却那样避重就轻，躲躲闪闪，绵软无力。而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回答也只是一句，那就是：做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是要付出极大的牺牲的，贺晓燕同志，你有没有这种牺牲的决心和准备呢？这个问题，只有贺晓燕自己用心来回答。

孙耀堂有些害怕回部队后那种折磨多于喜悦的通信，他希望姑娘能给他一个明晰的答案，而答案依然模糊：“眼前现实困难确

实很多，让我再考虑考虑吧！”他没法不允许她考虑，虽然这一声“考虑”，会引起他无数个夜的失眠，和失眠时无数次痛苦的思考。

孙耀堂回到东北边境以后，期望着爱情不再出现曲折，遗憾的是爱神老在戏弄着他，使他还要遭受更多更大的曲折。

八一年，贺晓燕改上晚班，每晚要十点才下班，到家可就十一点多了。有一个晚上，当她穿越一条偏僻小巷时，从暗影里跳出来一个流气十足的青年，两手一伸拦住了她的去路。

“交个朋友吧！美人儿。”青年涎着脸说。

贺晓燕又惊又怕：“你，你闪开，我有朋友了。”

“有了我们也可以认识认识嘛，我盯你两天了，就想要和你好。”他边说边往她身边靠。

恐惧使她的嗓子变了腔调：“再敢过来，我，我要喊人了！”

“别喊别喊，——不许喊！”

恰巧这时一男一女两位老人走进小巷，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成了救命恩人。男青年吓了，她壮了胆。一闪身，跑过去了。

回家来，她有些后怕，捂住被子哭。二哥跑过来看她，她一五一十哭诉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二哥贺新展皱了皱眉头，说：“明晚我来接你。”

三、五天以后，二哥就有些不耐烦了。他在上工人夜大，考不及格就要被淘汰。每晚上贴出两个小时来，他陪不起。他是个极其刻苦发奋、追求上进的青年，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贵。退一步说，就是在马路电灯下甩扑克的青年，也不愿意每晚上花两个小时去接送自己妹妹的，除非是他的恋人。

“我学习任务这样紧张，长此下去陪不起，你这么大了，不

好找个对象？”

这是万无一失的妙计，热恋的人每晚都渴望在一起见见面，踩踩马路，让爱情随他们的脚步一道前进，这一定比哥哥送妹妹有意思得多。

说实在的，贺晓燕常常希望自己有这样一种生活的乐趣。

有几次，贺晓燕就是跟着一些年轻同事成双成对的背影走的，但很快就不愿意了。她除了有对比的触景生情的凄楚感，还为自己掌握不好“跟踪”的距离而苦恼：太近了吧，偷听了人家的情话，象是犯了罪；太远了吧，她还是害怕。而且，她又设身处地地代别人憎恨自己，谁在谈恋爱时不讨厌这条多余的“尾巴”呢？

二哥是她们兄弟姐妹的掌门人，颇有权威，晓燕有些怕他，所以至今还隐瞒着自己的秘密。这时她推托说：还不准备考虑这个问题。

贺新展显见得有些武断：“你不考虑也不行！年龄大了，再拖几年，谁还要你这又老又丑的老姑娘？”

他作惯了主，就自说自话托人介绍了一个旅大警备区的军医。条件是够好的，家在旅大，人也在旅大，不但能经常陪她散步、看电影，将来孩子有了病也用不着半夜爬起来敲别人家的门了。

这些个优越性，二哥苦口婆心全说到了，却没有说动她本人。她身旁有一个空位，已经留给孙耀堂了，虽然她每每生气于这一点——孙耀堂老是缺席着。因此，她用各种理由推托，始终没有和男方见面。二哥挺生气，却没有找到生气的原因，又给妹妹介绍了一位大学生，同样没见上面就吹了。二哥骂妹妹：“我不管了，叫你一辈子找不着对象！”

以上情况，贺晓燕用信分段分期如实传报到乌苏里江畔。可想而知，孙耀堂的焦虑和痛苦是要比听说书的听众大上若干倍的。倒不仅因为他是个中人，而是因为“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刻确实太漫长了。

当孙耀堂读到小贺被歹人拦截、二哥为她选择佳偶，小贺以万分焦灼的心情呼喊：“要是你当时在场，我也不至于受欺侮了。你什么时候能转业回来呀！要是再不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的时候，他经不过这种悬念的熬煎，错把贺晓燕的呼喊当成了准备“吹灯”的前奏。

他决心争取主动，不要让人家把话说白了，还死乞白赖不愿散伙。他觉得他应该接受世俗的挑战，决不跪下双膝，去乞求那种庸俗的爱情；也不为了这种爱情，抛弃心中应该坚持的信仰。于是在一个晚上，他查完铺回来，就铺开了信纸。

信中的话语是极度平静的：“你提出了许多问题，我知道都是会在前途中碰到的。我远在边防，实在无能为力为你解决。从这一点来说，我现在是无能的情人，将来也是无能的丈夫。为了你今后的幸福起见，我考虑再三，同意把咱俩的关系结束在今天晚上。如果那位军医你看中了，就迅速下决心吧！你年龄也不小了，早到了该解决个人问题的时候，我预祝你们幸福！”

写完信，平静的表面被汹涌的波涛搅碎了，他陷入了极端的苦痛之中。他想用极度的疲劳来打发难眠的长夜，而在这方面，连队的工作是永远也干不完的。连长被汽车撞伤，住院去了，主管干部就他一人。除了巡逻、瞭望，光连队的自身建设就有二十七项实施。什么挖永久式菜窖、盖猪圈、修弹药库、建暖房等等。正需要他成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转动的机器。他去找战士谈心，他去查铺查哨，他去……直到疲惫不堪，才摔倒在自己床

上。数数，一百、二百、五百，疲劳终于战胜了苦痛，他朦胧睡去，但恼人的痛苦又在梦中紧追不放，使他透不过气来。

经过这一夜，他似乎悟出个道理来：当一名称职的边防军人，就得割断情欲，不要爱人！——“爱情啊，你快变了心吧！要是命运这样注定：他，为了信守一个盟誓就非得拿牺牲一个喜悦作代价。”*——好了，信已发出，苦根已被斩断，从今往后，就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张仲华也想用会见来维系和巩固自己的爱情，就在八二年的春节再返上海。但小王的性格和贺晓燕不同，她个性倔强，有定见却过于偏执，不愿敞开思想来和张仲华彻底谈一谈。也不愿意荡马路、逛公园。两人的交谈，只限于在各自的家里，多半是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因此，对话都是简短的、时断时续的，说话时，小王还有点心不在焉、王顾左右的味道。

“你还真能干的，想熬个大官还是怎么的？”

“可不，我还真想好好干几年，趁年轻的时候。”说的是笑话，又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

“那你就干着吧，还考虑成家干什么？”

“这并不矛盾，当边防干部也不能一辈子打光棍。我这次来，就想同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可商量的，不散就这样处着，要散就散。”

话没法继续下去了，继续下去的是电视剧里的故事。

隔了一会，小王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来：“还傻干，不好跟你哥学着点？”

哥哥比张仲华大两岁，六九年入伍，在友谊关内的吴圩当空军地勤兵。他兄弟俩一个北国，一个南疆，恰好都在边防，曾被乡邻们传为佳话。七六年部队同意他退伍回来，就担任了上海货

车制造厂的秘书。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住进了家境蛮好的老丈人家中。房屋宽敞，电话、彩电、电冰箱齐全，孩子由丈母娘带着，不必小两口操心；夫妻俩一百多元工资，生活乐而忘忧。老泰山不要女婿忙家务，只盼望女婿成龙。哥哥也真不负老人的期望，自学三年外语，考上了电大专科。旧戏里描写过形形色色落魄女婿在老岳丈家的后花园读书的故事，都没有他哥哥的完满。相比起来，张仲华吃亏就“老”了。

小王要求的就是这种生活。这种要求并不太高的小康式的生活，只要张仲华一回家，理想即刻就可以转化为现实。但这要以张仲华马上转业为代价，也就是说需要他付出另一种牺牲，一种不再继续承担一个战士的义务的牺牲。他，能在一、二年内就办到吗？

张仲华站起身来，踱到窗前，把帘子扯开，又把窗打开半扇，想透进点清新的空气来，然而窗外的空气和屋内的空气一样浑浊。

这就是繁华的南京路了。对于这座不夜城来说，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夜街。霓虹灯此明彼灭，变幻着花样吸引着顾客；汽车喇叭长叫短闹，一刻也不让两旁的人家耳根清静；路上行人挤擦擦、匆匆忙忙，刚从这另店里出来，又涌进那另店里去。年关将近了，他们都在争购年货，乐而忘疲。本市口音的，外乡口音的，打招呼声音、叫喊声音和吵架的声音混成一片，使这本该冷静的冬夜，也显得过于嘈杂和燥热。城市的弊病是吵闹，而珍宝岛的弊病是孤寂，无穷的孤寂。在吵闹中生活的人们能理解这种寂寞吗？恐怕难！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室外是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他带着战士们在珍宝岛上潜伏，以保护白天垒好的堤坝不被对方破坏。他套着长统毡靴，裹着皮大衣，还觉得冷气直往心里

钻。用不到两小时，眉额上就结起白霜，身体发僵，连爬起来都感到困难，有时就得让战友直挺挺地抬他到屋子里去。这到底为了什么？当然也是为了保卫这座城市和这条繁华的街道。但又换得了什么？没有换来敬重和爱戴，反而换得了隔膜和歧视，连等价交换原则都不具备！处于幸福中的人们并不理解战士牺牲的价值，反倒把他看成“傻瓜”一个。光荣贬值，实惠升值，爱情被世俗的偏见污染。他，到底该在边防上坚持，还是撤退呢？看来，最大的后拽力还不是前方的艰苦，而是后方的安逸，是安逸对于艰苦的蔑视！……

张仲华自己不能战而胜之，只得请求援军，这援军就是小王的母亲。老太太劝说了一大堆话，收回的却是一句冷冷的回答：“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我不着急，你们着急干啥？”一句话噎住了母亲，吓跑了张仲华，退了二路兵马。

在战场上，张仲华会是个勇士，而情场上却是一员败将。他这回是在后方吃了败仗，狼狈地逃窜到前方去的。

C、每个人都执著地追求幸福，而痛苦却 同样轻而易举地降落到他们身上

孙耀堂痛下绝交决心以后，贺晓燕反倒下定了要好下去的决心。因为，不仅仅是情人眼里出潘安，在不是情人的眼中，孙耀堂也具备了足够的男性美。他一米七六的个头，面目英俊，两眼炯炯有神。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小孙还有内秀，不仅有一肚子知识、才学，而且有表达这知识的口才。这样的小伙子该是挑选到仪仗营里去的，不然就是屈了材料。贺晓燕确实丢撇不开哟！这样，象生了一场大病的孙耀堂，又精神抖擞起来了，他并不能象少林寺和尚那样超然脱俗，所以就十分甘心情愿地回到五行中

来了。

说话间到了八二年三月，孙耀堂在省军区轮训了一个月后，写信给小贺，希望她到哈尔滨来玩几天，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爱情。谁知事与愿违，为此差点断送了爱情。

贺晓燕回电报说，她将于四月一日乘二七五次车到哈尔滨，约定小孙到剪票口处接站。谁知在三月三十日，孙耀堂接到团里急电，说他的连队发生了严重政治事故，要他尽快赶回连里。军令如山倒，他只得在三十一日急返部队。

轮训队的人员全都来自边防连队，学习结束，都返回边疆去了，孙耀堂想托付一个人帮助接站也找不到，他只得在火车上干着急，而越急离哈尔滨越远。

一夜的火车，使贺晓燕十分疲劳，头发蓬乱，面容憔悴。下车后，满以为孙耀堂会在剪票口迎接她，但待到所有的旅客和接客的人散尽以后，她失望了，眼泪象珠串似地从脸上滑落下来。她自觉这副狼狈相，会被四周的人认作疯子，也顾不得了。她想走开，又担心孙耀堂在她走开的后一分钟里出现，就一分钟接一分钟地等待下去。向左走二三十步，再向右走四五十步，始终眼盯着那块地方，满怀希望又满怀失望，肚子饿得咕咕叫仍然锲而不舍。就这样，从早晨五点半，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才完全绝望。这才想起她还有个远房的姨妈在哈尔滨市，就硬着头皮找去。

姨妈看到小贺这般模样出现在她面前，很是诧异。问她干什么来了，她说来看看姨，再问就不开口了，大姨只得弄饭给她吃，叫她住下再说。

她希望未灭，第二天找遍了省军区的所有招待所。该是根大海里的针也被捞起来了，她却依然找不到孙耀堂的影子。

再一天，她说要准备回大连去了，自个儿上街去买点东西。谁知下午回到姨家，竟嚎啕大哭起来。她这副神不守舍的模样，早被小偷瞟上了，小偷用刀片划开了她的提包，偷走了她一百多元的全部现款。大姨只得出钱帮她买了张火车票。

回到大连，她就生了一场大病，半个多月起不来床。倒不完全是劳顿所致，更由于是被欺骗引起的愤懑、被戏弄产生的羞惭、以及识破孙耀堂“嘴脸”后的失望。她的精神崩溃了，五毒攻心，高烧四十度，说的胡话尽是：你堂堂的军人为什么骗人？为什么骗人？——啊，试问钟情的男女，谁能够不饮酸茹恨？只因为情与苦恨，原本是携手偕行。

心火发光了，心便寒了，却还没有死心。上班以后，每天跑二趟收发室，总希望见到孙耀堂的来信，听到他的解释，希望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个原因。然而，又是八天杳无音信，她这才下定决心：斩断情网！

可偏偏孙耀堂又来信了，信中解释了提前回连的原因。但那原因确是军事秘密，他不得不在关键之处含糊其词，这含糊其词又使多心的小贺更加多心。她心里同时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不，我不信！不信！

六月，孙耀堂休假到大连，当面负荆请罪。贺晓燕还是咬牙切齿地说：编得倒挺象，哄小孩去吧？孙耀堂急得跺脚发誓，仍然无效，只得去搬将。恰好团参谋长李广洲也在大连探亲，欣然从命，办了一桌菜，邀请小贺赴宴。宴会上，他如实讲了连队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才解除了贺晓燕的“信任危机”。

爱情的苦果尝够了，两人都有了苦尽甜来的盼望。贺晓燕鼓了鼓勇气，把心底的秘密报告给二哥：“我认识一个军人，在黑龙江边防当兵，已经三年了。”

二哥这才大彻大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怕你不同意。”

“现在告诉就同意啦？你也不认真考虑一下，这能行吗？两人相隔几千里地，那里又很艰苦，你能跟他去吗？”

遭到二哥一顿权威性的训斥，她一声不敢吭。但不要以为她就服贴了，不，她心中的权威不是二哥，而是爱情。

在参谋长爱人和鞠凤启股长这两个大连老乡的不断工作下，贺新展答应同孙耀堂见一见面。相亲是在二哥的家里进行的。二哥亲自上灶，烹炒了六个菜，一边喝酒，一边闲谈。小贺没有发言权，但取得了旁听的资格。

二哥是个爱才的人，而在这一方面，孙耀堂决不缺乏才气。他当过宣传干事，现在又当指导员。给战士讲课，他就得把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知识汇编起来，选择运用。这回他十堂课作一堂课讲，又使出了十分气力，那有讲不好的？从第五次中东战争讲到马岛战争，从美国的中子弹讲到苏联的米格——25型飞机，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讲到部队两用人才的培养……说得二哥连连点头，满心喜欢。最后，他把手向小妹一摆：“去，煮挂面！”

孙耀堂提悬的心落下了，溅起一片喜悦的浪花。因为他来前曾听战友交待过：希望你吃到面，别吃到饺子。饺子是叫你滚蛋，而面呢，长长的，是要缠住你。所以老百姓讲：送客饺子留客面。让小贺煮面，说明这场考核是通过了，哎，比考博士学位还紧张的一场考试啊！

是的，孙耀堂和贺晓燕终于让长长的面条缠在一起了。

但在差不多的同时，过早地缠连在一起的张洪根和于莉萍，中间产生了更大的裂痕。

为了帮助于莉萍解决住房问题，部队先后派出了罗干事和袁

参谋，专程来到上海。从市房管局一直找到豫园房管所，磨破嘴皮，最后终于让分配房屋的同志松了口气，答应明年解决小予的困难。但于莉萍不满意这种应诺，认为是房管局的托词，便把来探家的张洪根也派遣出去，和房管局去“泡蘑菇”，非要把住房弄到手不可。

张洪根虽然也有内秀，但讷讷拙于辞令。他最怵头的就是办外交，他觉得在上海要弄一间房子，还不如让他钻到敌人阵地上抓个舌头容易一些。但于莉萍每回下班回来都要他汇报“战果”，使张洪根丝毫不敢作假。不然，准得一场好吵。自然，张洪张探家的这一个月是一无所获的。但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又不是一无所获，因为，于莉萍怀孕了。

这情报是大嫂报告给大哥，大哥写信告诉他的。自从婚后小于发出的“三道金牌”以后，一直就单方面断了通信。张洪根却准时得很，每月都要向“亲爱的”单线联系，但始终没有感动“上帝”，按说，他的努力比老愚公还要尽心尽力得多。

大哥来信不是报喜，却是报忧。他说：小于怀孕四十多天了，她对大嫂说要整掉，你不转业她就不要孩子！大嫂劝不住她，要我写信快告诉你。

张洪根这下真急眼了，小于已经三十二岁，他也三十一了，再不要孩子，到什么时候要呢？

他连夜写信，列举了要孩子的种种理由，也讲了自己的心情和愿望。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亲自送往邮局。他满以为还及时，结果晚了。大哥来信说，小于已经自作主张，去医院打胎了。

他气得够呛，第一次壮大胆子，修书一封，责备他的娘子。然而，依旧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再一次探家，他没忘记当面兴师问罪，但小于对于责问的责

问，更加咄咄逼人：“依倒知道要小人，我来问依：房子呢？没有房子，养在哪里？谁看呢？依有钱请保姆，还是自己转业回来看？我每天上下班格样子吃力，有精力照顾小人哦？”几句话说得张洪根哑口无言。

的确都是实情，房无一间，钱有欠款，怎么生？怎么养？看护孩子是双方的责任，你张洪根远在东北，用什么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既然你连自己的义务也履行不了，凭什么再去责难女方？没有履行好做丈夫义务的人，也同样是没有权利做爸爸。

张洪根坐在床上，两手捧住脑袋，久久说不出话来。——“当金黄的太阳升起来，第一次照上你爱的盟约，我就预期着明月来解除那情结，系得太早太急。我只怕爱得容易、就容易失望，引起悔心。”*

他有十一个月不在爱人身边，他就有十一个月的失职感，他想用一个月的拼命体贴、拼命的家务劳作来补偿；但女方却有十一个月的积怨，也想通过这一个月来发泄。因而这一个月便积聚了十一个月的爱与恨，搅得这两口之家动荡不安。但那十一个月他却是一名无可指责的军人，他立过两次三等功，和同年入伍的同志相比，他是最先提到指导员这个岗位上的。他带领的侦察分队曾被沈阳军区授过光荣的称号。他几乎达到了一个平时军人荣誉和贡献的顶点，可惜没有发生战争，要不然他会成为英雄，或者成为烈士的。他渴望那种牺牲，它比平时迅疾得多，因而也少其痛苦。然而，却没有！

他无愧于祖国，虽然有些愧对自己的爱人。不，对于自己的爱人，他也能自豪地说：在那十一个月里，她是幸福宁静的，她不会听到枪声和炮声。自然，比起其他女同志来，她是多了点“爱的寂寞”。但在这方面，作为军人的男人是同样存在的，又有谁去

安慰和理解他们呢？

反过来，他也理解小于，同情小于，她的日子过得是够艰难的。家里什么也没有！若是有个电视机，或者有一架收音机，也许能帮她消愁解闷，然而，她只是徒有四壁而已，这怎能不使她更添烦闷呢？军人在平时也有牺牲，这牺牲要求补偿，例如爱情。嫁给边防军人的姑娘也在作着牺牲，也渴望补偿，以获得社会的敬重，获得由于爱人长期不在身边所带来的艰难的弥补，这里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可她却一样也没有。社会可以发给独生子女的家长一张优先购买食品的证明，发给离休的老首长一份到处走走的车马费，却没有给一个边防军人的妻子多一点社会的爱。

张仲华三年（实际上只有探亲的两个月）的恋爱生活，既没有孙耀堂那么多的曲折变化，也没有张洪根那样大起大落，而是象一汪平静得没有波澜的死水。是鲜花，总有盛开的时候；是疮疖，也该有化脓攻破的日子，而他呢？——希望，奔腾在年轻的心里，经不起岁月的折磨！爱情的玫瑰长着密密的刺，它欣欣吐苞的处所，总是春寒料峭。*这种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和平共处”真使他有些受不了了，于是，在八三年的一月份，他发起了一次“冬季攻势”。他请求组织上发函到小王的工厂，作一次婚前调查，然后，又开了一封结婚证明信。探家来到上海，他决心毕其功于一役。

可能是那封外调信飞得太快，而他本人又动身太迟，张仲华临行前收到家中来信，说小王这几天情绪不好，见到他家的人也不说话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张仲华快点回去。

到家的第一晚两人见了面，小王劈头就问：“你们部队还来信了解我在工厂的情况？”

“是啊，这是部队的惯例，婚前都要作调查的。”

“谁让你们调查了？谁叫你让部队调查了？本来厂里的同事都不知道，这下可好——”

小王这个秘密保守得是够彻底的，连楼下的邻居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厂里同事了。而今，张仲华走了一步进攻的棋，他想要赢得社会承认，以便造成既成事实；但却因此伤害了小王，她原不想公布于社会，以便进退都有个主动。这本是做姑娘的一点小心计，现在退路被截，她那能不恼火呢？

“我还带来了部队的证明信，如果你同意，抽个时间，我们去领结婚证。”张仲华小心翼翼、轻声慢语地亮出了底牌。

“不领！不结！依要等依等，等勿了拉倒！”小王回答得十分决绝。

一场“冬季攻势”就此烟消云散，棉花店失火——不能再弹（谈）下去了。

这次探亲，还带来了一个为张仲华不能容忍的后遗症。因为他是按结婚假加探亲假去的，回到部队以后，领导、战友都来贺喜、开玩笑。这个说：“小张，怎么还不拿出喜糖来呀？”那个说：“张指导员，蜜月度得不错吧？”越是烦恼，人家越逗乐；他需要炭火，劈头给浇来一盆冷水，他的心凉透了。

D、一个甜桃，一个酸杏，还有一位呢？

——摘的是一根苦瓜

他，张仲华，摘的就是一根苦瓜。恋爱三年多，他也三十的人了，还在保持等距离运动：他跟进一步，对方也走快一步；他停下，对方也停下。也许，他命该跑一次爱情的马拉松，而不是一百米。

他心里明白，虽然在一方是他，另一方是她的天平上，都放

着一颗同样大小的砝码，但他的那颗砝码，轻了许多，天平也就倾斜了。可这颗砝码，在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的那些年代里，曾经是最有份量的一颗。

一位老首长告诉过他，当开赴朝鲜的军用列车停在丹东车站时，许多上高小、中学的小姑娘拥上来了，挤在窗下，递进来一本本日记簿，让“最可爱的人”签名留念，交换通信地址。然后，便是火辣辣的书信往来，相互勉励的话写满了好几张纸。朝鲜停战，部队陆续回国，小丫头长成了大姑娘，许多“叔叔”却降成了同辈人，不过，他们很乐意屈尊俯就，因为这时已经从恋爱变成两口子了。这位首长的夫人就是这样抛日记本而不是抛彩球得来的。啊，那时，首长们提起那时就有些神往的年代，是把艰难困苦中搏击的军人看作是光荣的化身，而又视光荣为无价之宝的。今天，在世俗的眼光里，金子成了黄铜，安适的享受和实惠的砝码重于一切。唔，当《九九艳阳天》歌曲里那位小英莲成了老妈妈以后，她的女儿竟把她当初三年五载、十年八载的等待，看作了愚蠢的行为，难道说现在还不如《柳堡的故事》那个时代嘛？

他烦躁地打开收音机，想听听音乐，音乐是美好的，却构成了同现实的对比。哦，那是苏联红军时代的歌曲，名叫《喀秋莎》，——“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提倡、崇尚军人的这种牺牲精神，热烈呼唤喀秋莎般的爱情，但这种爱情在现实中真会有吗？这首古老的歌曲，在首都舞台上唱起来了，但，有多少姑娘听它呢？

他不是圣哲，是个懂得七情之欲、需要有个家庭、既想做丈夫又愿当爸爸的人，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转业回上海。

这是每个有志于献身边疆、保卫祖国的军人都耻于主动提出

的问题，他曾为此自责和苦恼了多少个日夜，但终于只得向上级提出来了。

今年的春节，张洪根在上海探亲。他根据部队传出的消息，告诉于莉萍说，今年的转业名单里很可能有他。这个消息对于于莉萍无疑是一剂兴奋剂，她一贯勤俭节约、仔仔细细过日子的习惯打破了，第一次买了三元钱鞭炮，从年三十放到初一、初二，乒乒作响、喜气洋洋。她是喜庆佳节，又预祝丈夫从此将守在她的身边，艰难的独居生活要随着这串响鞭而结束了。

三月十日，张洪根离开上海，十五号到达部队，才得知因为今年转业名额少，这次又没轮到他。他虽然有点情绪，还能正确对待，但怕小于因此要痛哭一场了。果然，他的信去了不久，就收到了哥哥的来信，说你这次不能转业回来，小于知道以后哭得十分伤心，你得多写几封信，安慰安慰她。他及时写了，他写信永远那样积极主动，但他真恨那每张信纸的份量太轻太轻。……

真正欢乐的响鞭是为孙耀堂放的，这天也是三月十日。

孙耀堂陪伴着他的未婚妻坐上公共汽车，向我们雄鸡形地图的那个最尖角驰来。

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使小贺精疲力竭，神情沮丧。

多么颠簸的不成其为路的路呀，颠得她五脏六腑都要抖落出来。这路被冬天的寒冷一冻，又经夏天的爆热一晒，全酥了，再经雨天运木料、煤炭的卡车一掏，一个深坑又一个深坑。车摇人摆，三曲四折，颠得贺晓燕直想呕吐。再看窗外，无边的草甸子，漫漫的丛林，稀稀落落的草舍人家，全遮没在一片茫茫的白雪里，看不见一个活跃的生命，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萧索、凄厉、旷漠，真象孙耀堂向她介绍的那样，“大草甸子走不完，一封书信捎半年，蚊虻小咬三班倒，虎狼熊猪（野猪）样样全”。

这个人，竟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十年，今天，还要把我拖到这地方来，真是——贺晓燕看着想着，情绪灰冷了，不理睬孙耀堂了。她原来就没有咬定要到部队来结婚，只是答应来边疆看个新鲜。满意，就在这里结婚；不满意，住几天再回去。能进能退，能缩能伸，贺晓燕是个老实姑娘，却也有两窟。这是难怪她的，她虽然爱上了边疆的人，却并没有爱上边疆。

公共汽车嗤地煞住了车，贺晓燕站起蔫软的身子，在孙耀堂陪同下走下车来。忽听得一声“敬礼”，把她吓了一跳。这才发现，道路两旁分列着百十名战士，在连长孙凤保威严的口令下，前队的“仪仗队”刷地举起了右手。他们的肩头、帽顶上落满了白雪，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下了多久了？他们等候多久了？她全然不知道。她只看见他们的帽耳朵没有放下，耳轮冻得通红，那敬礼的右手，一式的整齐，一个个就象是塑在路旁的雕像。· 难道是在欢迎她？在向她敬礼？向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向一个二十八岁的城市姑娘？她做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志愿嫁给一名在边疆服役的干部，就受到如此隆重热烈的欢迎。她不知所措，觉得担当不起这如山的敬重。她想还礼，可她没有军装，也不知道此刻该采用什么样的礼节，才能回报这样的盛情。她面窘身热，象喝了酒一样兴奋。她从漫天的冰雪中走来，进入了一条能融化心头冰雪的火热的甬道，冰冷的心活跃了，向她的胸壁猛烈地冲撞，象要跃出那厚软的胸膛。

战士们屹立着，一动不动，只有那双双会说话的眼睛在行着注目礼，跟随贺晓燕的身影缓缓转动，流露着深沉的爱戴、热烈的赞美：向你致敬！姑娘，向你致敬！向你的勇敢与果决致敬！向你的牺牲精神致敬！能理解我们平时这种牺牲的姑娘实在不多，而为了补偿这种牺牲、甘愿付出自己牺牲的姑娘就更少更少，因

而你的行为就更显得崇高可敬！有了你的理解 and 爱（这爱胜过一枚金灿灿的勋章，胜过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我们哪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辈子生活、战斗在这片荒漠的土地上，再苦而无怨，死而无怨。因为，有你这样一位美丽的、可爱的、纯洁的姑娘的爱，在我们的身后，作着最强有力的支撑！啊，姑娘，向你致敬！

整个欢迎队伍是肃静与热烈的对比，走过“仪仗队”，进入了锣鼓、鞭炮队。震撼人心的锣鼓，振荡耳膜的爆竹，把贺晓燕带向了第二个情绪的高潮。她的手掌鼓红了，眼中的泪花在闪烁：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你们！我既不是首长，也不是慰问团，只是一名到此刻还没有取得正式资格的家属，就得到了如此不同寻常的光荣。我不配，不配这样的欢迎，因为我的爱给得太少太迟，我的犹豫（直到下车为止还存在的犹豫），给耀堂带来了太多的牵扯和折磨。也许他为此要分出一多半精力来应付的吧？而本来，这一多半的精力应该是用来净化你们的心灵、巩固边防建设的。是你们给我上了这一课，我平生所上的最好一课，谢谢你们，同志们！

贺晓燕不再迟疑了，就在当天晚上，她与孙耀堂结了婚。

事后，她知道了部队是如何全力以赴来欢迎她的到来的，这使她更加感动。

连长在队列前向全体战士喊：“同志们，指导员的对象明天要来了！从风景优美的大连海滨来到咱这荒凉艰苦的边疆，容易吗？咱们大伙得热情一点。”

战士对着连长叫：“用得着关照吗？指导员三十岁了，找个对象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咱能亏待指导员、亏待她吗？”

四班长任立志、老兵孔繁秋赶着粉刷新房；通讯员王成海张罗着桌椅板凳和床铺；副指导员张家军筹办香烟糖茶；副教导员

赵书元和书记琢磨着写对联；还有几名战士当跑腿的，穿梭于连队与供销社之间，采买痰盂、塑料花、大红纸；鞭炮缺货，哪里都买不到，又不能不要，结果是教导员的两个小孩献出来的，她们说要献给远方来边疆的阿姨；在一百八十里地之外蹲点的教导员李来和主动打来电话：“今晚孙耀堂就结婚吗？几点开始？七点？！我争取六点赶回来。”……唔，这是一个全连、全营的行动呀，把她的到来，当成了部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

她开始认识这些边防军人了，认识了他们的热忱、坦荡和丰富多彩的感情。孙耀堂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之中，她，能不感到欣慰吗？她爱上了这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因而也更爱这一个个人组成的集体中的他。

由于连队住得分散，贺晓燕从第三天开始，就同孙耀堂一起，带着香烟糖果，到分散的执勤点去慰问。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她穿上皮大衣，裹着头巾，爬到了雪爬犁上，向风雪迷漫处进发。她开始体验起边防战士冬季的生活来。

她冷得簌簌发抖，紧靠在孙耀堂的身上，听他在慢慢讲着巡逻中的惊险事儿，话语不断被扑来的风雪呛断。

孙耀堂讲到有天在乌苏里江上巡逻，雪爬犁遇到了上面是雪、下面是水的“清沟”，翻了，营长储贯忠半个身子掉进江中，要不是他两肘撑住冰洞的边缘，早给江水卷跑了。她哎呀一声，替营长感到后怕。

孙耀堂讲到自己巡逻遇上了狂风卷动雪尘的“大烟泡”，迷失了前进方向，转悠了三小时，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冻、饿、疲惫，差点回不到连队。她听了连忙抱住爱人的胳膊，怕他会因此被早已消逝了的风雪刮跑。……

她攀上二十四米高的瞭望架，看一片白雪里的异国边界，惊

呼这里离对方竟然这样地近。下梯子的时候，她学会了关照战士：“风大冰滑，下梯子的时候要当心！”

她让一个排的战士都坐好，然后给每个战士点烟。她学会了向战士们讲演：“你们远离父母到边境来当兵，够辛苦的，这次我体验了一下，感到在内地工作实在很享福的，这是与你们在这里守卫边疆分不开的。”

近朱者赤，她已经成了连队的半个指导员。

临别时，她又流泪了，向教导员倾诉了自己的心里话：“我挺后悔的，不该拖了孙耀堂这么些年……”

爱屋及乌，她不仅爱上了边疆人，也爱上了边疆，孤寂在她眼中显得繁华，冷漠在她眼里变得热烈，这就是——神奇的爱的魔力呀！这不仅是对孙耀堂的爱，也是对祖国母亲的爱呀！

孙耀堂在旁边听着，心儿快乐得颤动。他实在感到太幸福了，以至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紧紧抓住小贺的手，送她上车站，直到她疼得叫了起来，才赶紧松开。这才确信，幸福早已真切地来到他的身边。

贺晓燕临上车时也讲了一句于莉萍曾经对张洪根讲过的话：“多保重，你愿意在边疆干几年，就几年！”所不同的是，她的话是作数的。

他的心醉了！边防军人的心是容易满足的，他们缺得很多很多，而需要得很少很少。也许，他们只需要这样一句庄重的而不是儿戏的话，就能支持他们在战场上、在和平和环境中，作出一个战士应该作出的全部牺牲。

一九八四年一月

* 均引自《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

“我就是想在奥运会上听听国歌”

这是一个朴素的却又了不起的愿望——“我就是想听听国歌”。也许每个运动员出征奥运会时，都怀揣着这样一个愿望，但敢于面对世界的新闻记者，说出这样的话来，非得有一番勇气不可。不，单凭勇气是不够的，还得真正有慑服对手和观众的力量。

她，吴小旋，倘若你初次见到她，真会怀疑她是否有这种力量。娇小玲珑，才一米五三的头，既不象郎平那样高大，也不象周继红那样墩壮。你真不敢相信那一双纤纤小手，会一动不动地托起一支九斤多重的步枪。

然而，正是她，获得了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射击的一枚金牌和一枚铜牌，成了我们祖国的骄傲。

让我们通过瞄准镜，看一看她如何取得这样优异成绩的。因为奇迹才刚刚发生，国歌的余音还在她和我们的心头回响。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她站到靶场上，举起了气步枪。压力，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确实太大了。她的身后有教练和自己的同志；再后面有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观众；再后面，万里之外，几乎整个中国都盯在电视屏幕上。在那亿万双眼睛里，一定有她父亲、母亲和爱人焦灼的目光。她有些过分紧张了。啪！啪！啪！她打了几发试射，全是九环。九环，在这里应当算是低环数，如果继续

下去，夺魁的希望就从靶纸上飞了。

她放下枪来，静了静心，作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再端起枪，打了五发，又有四个九环。看来还没有克服心慌，怎么办呢？教练李素芳把她叫了出来：“小吴，稳定一下情绪，避免紧张，注意技术动作！”她缓缓地点了点头，咬住了嘴唇，又走进射击场。

“你呀，真没有出息！有什么可紧张的？”她暗暗骂了自己几声。骂自己是她进行自我控制的一种方法。随后，开始思想漫游，想这想那，就是不许想眼前的荣辱得失。她又把目光投向了左前方，那是一片青青的草坪，草坪上有两块黄褐色的石块。哦，这草坪，象不象个牧场，要是没有枪声，也许会有几十头奶牛在这里吃草、打盹，慢悠悠地来回走动。那石块在草坪上趴卧了多少年了？它是那样木然，什么枪响都惊不动它……

她的心境宁静了，再度端起枪来，连续打了五个十环。第一组，她打了九十六环。她的平时成绩比这要好。唉，就是前五枪打坏了！

第二组十发子弹的射击，她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因此打了九十九环。第三组、第四组发挥得较为正常，都是九十七环。四组射击的总成绩是三百八十九环，她平时的成绩总在三百九十环以上。而这次，却差了二至三环。正是这有限的几环，使她屈居第三，得了块铜牌。她只比第一名差二环，比第二名差一环。

吴小旋懊丧极了。她本可以打得更好一些，然而——打枪和其他运动不一样，跳高，三次机会中一次跳过就算通过；打球，一次处理不好也有下一次机会，唯独打枪，每一发子弹打出去以后就有去无回，将成绩永固在靶纸上了。

她甚至不想上台去领这一枚铜牌，绷起脸来，没有一丝笑纹。队长张福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满意，但你应当打起精神

来，把下一个项目的比赛打好！”

在奥运会上获得铜牌，应当算是了不起的成绩。照相、采访，记者们包围了她。她坦率地对记者们暴露心曲：“我打得不好，只得了个第三，我的目标就是要拿金牌，就是要听一听国歌，看一看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升起！”

这是长期积蓄在心头的愿望的倾吐，是对迎接下一次战斗的宣言。那么，这究竟是大话，还是充分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八月一日，一天休息。这一天，她几乎都是在加州大学那五楼的五百八十三号房间里度过的。气步枪射击，一站就是几十分钟，她的腰疼病又犯了，那是劳损引起的尾骨隐性骨裂，求过许多名医，仍未断根。一到劳累之际，疼痛就钻出来捣乱了，象一个一心要同她作对的坏人。她只得大半天躺在床上，想使身心都获得些休养。可是思想这东西太活跃了，轻而易举地突破这六面墙壁，飞向祖国、飞向过去……

一九七三年，她刚上初中一年级，身体虽然瘦弱，却酷好体育，还是江干中学的乒乓冠军。在一次偶然的会中，她爱上了射击运动。就在这年八月，她被选入了杭州市射击队。一九七四年四月，进入了浙江省射击队。

她身体瘦小，单薄，还略带一些娇气。但正是在这瘦小的身体里，有着最顽强的意志，迷上一项事业，就决心一条路走到底，非干出个名堂来不可。

果然，汗水浇灌出了优异的成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届全运会上，她以总成绩三百八十六环，打破了女子气步枪四十发立射全国纪录。这以后，她又曾经两破纪录，成为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一九八二年冬，在印度举行的亚运会上，吴小旋打男子气步

枪项目，在十一个国家三十八名运动员的竞技中，她以五百八十四环的优异成绩，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由于这个项目在这届亚运会上首次把发射四十发子弹改为六十发，她的个人成绩，就成了男子气步枪的亚运会纪录。

……

气步枪一直是她的拿手项目，她本来是指望一举在奥运会上夺魁的，谁知打了个第三名。现在，她只剩下一次机会了，那就是要把女子标准小口径步枪打好。这不仅是这届奥运会上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这也是她在射击场上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她已经二十七岁，作为一个运动员，这是老化了的年龄，她可能等不到下一届奥运会，更等不到再下一届奥运会了。

对于女子标准小口径步枪的射击，她自觉还是有实力的。今年四月，洛杉矶奥运会靶场落成式的比赛，苏联、民主德国的射手都参加了，她得了第三名，成绩是五百七十七环，比第二名差一环，比第一名也只差两环。她设想明天上午的这次射击，心理上和技术上会碰到什么障碍，该怎样去克服？万一有风怎么办？大风、小风还是间歇风？这都不可怕，困难对每个运动员都一视同仁，如果你的意志不如别人坚强，那首先被风刮倒的是你而不是别国运动员。只要沉得住气，掌握好修正要领，自己反倒能够“好风凭借力，托我上青云”的。

小口径步枪比赛需要两个半小时，要是腰疼病又犯了，那只好咬着牙拼了，拼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再趴下，或者被抬进医院。总之，决不在枪膛里还有子弹时趴下，不，甚至摇晃一下都不行！

第二天上午九时，她又站在射击场上了，只有丝儿微风，吹得草尖微微晃动。这太好了，她曾作了大风的最坏估计，这种估计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使她增添了不少信心。但，另一种估计不

幸成了事实，她的腰又疼了，一阵又一阵，象锥子刺似的，而且向她的肩背散射，她每打一枪，都要和疼痛搏斗一番。立姿，本来也不在话下的，由于这疼，二十发子弹，她只打了一百八十七环的成绩，还急出了一脸的汗珠。这个成绩太不理想了，她的心又沉入了深渊。

照这成绩打下去，希望越来越遥远了。有两条道路在等待她，一条就是破罐子破摔，一下子把全部子弹吐噜完，管它什么第一名还是最后一名；另一条就是坚持拼下去，不打光最后一发子弹决不松劲。她，选择的是后一条路。

趴在地球上，作第二组射击，腰，看来得到了暂时的休息，可思想，却不肯再休息了。“能得到金牌多好！要是万一——”这念头又顽强地钻出来，扰乱了她的心绪。这并不是一个坏的念头，却不该在这时出现。荣誉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你恋得它越紧，越为它患得患失，它躲闪得越远。

她又去看那两块黄褐色的石块了，和她具有一样肤色的石块，静静地趴在那里。得向这石块学习，身体和思想都要凝固起来，别象那一棵棵小草，有一点风就摇摆不停。

思想终于又安定了下来，她卧姿射击是一百九十七环，这就是说，她打了十七个十环。但立姿的成绩太差了，两项成绩相加，她屈居在第四、五名的位置上。

只有最后的二十发子弹了，这时，她的思想反而特别冷静。她只有一个念头：谨慎细微地处理好每一发子弹，顽强地坚持到最后一发的射击。她终于带着女性的细腻又带着男性的果决处理了这二十发子弹，取得了一百九十七环的好成绩。

打完之后，她一溜小跑，冲向她的教练李素芳。李素芳这时刚记录完她的环数，迎面走上来。“差不多了，我看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吴小旋这时脑子转不过弯来，她听不懂教练的话，她的思想还继续在那儿瞄准、击发。

“我说你差不多能拿到金牌了，你看，你的总成绩是五百八十一环，比第二名多三环。”李素芳激动地说。

射击比赛临时的报靶成绩，最后常常会有更改。例如，一发子弹打在九环与十环的弧线上，当时被认为是九环，仪器一检验，可能是个十环。第一、二名之间，可能就只差这一、两环，而这一、两环，就将决定谁是世界冠军或亚军。但李素芳熟知，临时报靶成绩出现更改三环的情况是很少的。

吴小旋终于听懂了，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她扑进教练的怀里，李教练也紧紧抱住她，两人同时流出了激动的泪，这泪水浸湿了对方的面颊。

成绩在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中国的吴小旋获得了第一名。一旦显示，它将记入史册，尽管显像屏上的数据会消失得很快很快！

她如愿以偿了，兴高彩烈地站立在领奖台上，听到了激昂的国歌，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国旗。她这时激动的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她觉得，国歌，是唱给祖国听的，唱给远方的亲人听的。她就是要让祖国和全世界都听见这雄壮的旋律！

一九八四年九月

普通一兵和他的妻子

他和她都太平凡太普通了，如同我们脚下的泥土，棕色的、黑褐色的泥土，随处都可以看见。

他这个有着七年军龄的老兵，在北京卫戍区51115部队里，也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员。他仅仅是一个班长，叫他代理排长，也只是拿战士的津贴，干干部的活。她呢，一个普通军人的妻子，就是在她那个生产大队里，也说不上什么榜上有名的人物，要不是因为这一次意外的事故，也很难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么，这次意外的不幸事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件大好事。它让珍珠脱去泥沙显露华彩，也让我在浩瀚的人群中发现了他和她……

王奎义被批准探家了，回到山东胶南县新建大队这天，正好是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王奎义以三倍的用心记住这个日子的，因为他必须在一个月后的这一天，回到自己的连队。

对于这个还带着一身农民气质的士兵，这次探家自然被当成一个最佳时机。他妻子种了五亩半责任田，地瓜、玉米、花生，都等待他去收获；冬小麦，也正要他去下种。一个已同公婆分家

独立的女人，带着一岁零两个月还未脱奶的孩子，又养了一头猪和十几只鸡，可以想象是多么辛劳。她默默地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从未在给丈夫的信中流露出半句怨言。用她孱弱的肩膀，挑起一副重担，让丈夫一年又一年地安心服役。当丈夫的却从那一封封看不到埋怨的信中理解了妻子的体贴，日积月累地贮存起对妻子的负疚和感激。今年他正好能在秋收秋种的时节回到家，又怎能不把九个月欠下的内疚争取在这一个月中偿还呢？

这就需要他十倍的努力和十倍的速度。头一天在家，第二天就和妻子一起下地种小麦。他爱人张花仙，和曲金岭、曲金礼两家帮工，平时她都受人家恩惠，此刻丈夫也自然要用行动略表感谢之意。这样，十多天干下来，竟把一个棒小伙子累垮了。一场重感冒，逼着他在床上躺了五整天，连战友、老泰山家都去不得，更不用说下地劳动了。尽管身体在炕上静止不动，焦灼的情绪却象每天上几把发条，一天比一天拧得更紧。病没好利索，他就强撑着下地，又把一亩二分地瓜犁了起来。这就到了十月的十七、八号。天老是阴沉沉的，看来难得个大晴天，他不敢帮妻子切地瓜干，怕烂在地里，就休整了一天。这一天他老跑到院外来看天气，要么有一搭无一搭地逗闺女玩，或者是坐在炕上抽闷烟。对于他，休息一天比干一天活儿还难受。

妻子毕竟是理解自己丈夫的，就说：“既然天气不好，你就提前回部队吧！俺也不指望你了。”前两次探家，她丈夫都是提前两天回部队，那八一年春节探家还是来结婚的。既然燕尔新婚都没拖住他的腿——

王奎义感激地点了点头，就算是理解和允诺了。

十月十九日，王奎义开始作走的准备。这准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妻子，他想尽量减少一点妻子过日月的艰辛。他在村里请

来了两位社员，自己做下手，打了两个水泥缸，准备留给家里装粮食。晚上，他请两位社员喝酒吃饭，特意还叫来了自己的父亲和大爷作陪。本来他是要向父亲提一个“走”字的，因有外人在，他父亲是大队的支部书记，要主持今晚的社员大会，酒也喝得匆忙，饺子也吃得匆忙，话呢，欲说还休，被连续不断的烧喉咙的液体和烫嘴巴的饺子压下去了。

开会的人跟着他父亲走了。跨出门去，父亲甩进来一句话：“锅里水开了，灌上吧！”

大半天没顾得喝水，加上酒和饺子又都是致渴剂。他极度的干渴被父亲的这句话钓了起来。他泡了一杯茶，放在炕桌上，又把暖水瓶灌满，放到炕桌的旁边。然后他脱掉了鞋，上炕品茗。他觉得今晚能把这一暖瓶水统统喝光。

他的对面，坐着个哑吧，是房主曲金山的兄弟。农村中的愚昧还经常可见，这个曲金山就是因为老婆不生孩子，要换换水土，而去闯关东。盖这样一栋房子少说也得一千五百元。王奎义不但连一百五十块钱也没有，还在连里欠了个一百八十，因此结婚这两年来，一直是借人家的房子住的。望着这房子，常常使他愁下眉梢又上心头，哪年哪月才能住上自己的房子呢？但此刻，这种愁绪却没有妨碍我们的主人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面对个不说话的哑吧也许更为合适一些，他将要尽力品尝一下茶的香味和家庭的乐趣，一年中他只有这么一个月，而这一个月中，能这么宁静怡乐地坐在妻子和小女儿身边，也只有这么一次。

啊，这个一岁多的小莎莎，他对她真是又爱又怜。去年探家，她还没有出生；今年探家，已经会叫爸爸了。不过前些天，妈妈无论如何逼她，她就是不肯当着面叫爸爸，只是乘他不在，用小手指指镜框里他的照片，对妈妈说：“这是俺的爸爸！”现在她

已经承认，这个坐在她和她妈妈炕头上的解放军，的确是她的爸爸了。

小莎莎冲着他蹒跚地跑过来了，也许她也知道爸爸很快要离她而去，想跟爸爸亲热一会吧？谁知她一个跌绊，两只小手按在了暖瓶上，暖瓶冲着他倒了过来，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两脚就突然感到一阵烫灼。啊，一整瓶开水全部倒在他的脚面上……

爱人吓呆了，孩子吓傻了，都直楞楞站在那里，象两座被惊恐凝住了的雕像。而他呢，一阵“触电”的感觉之后，随即是难忍的疼痛，他仰倒在炕上，两腿在空中乱蹬，麻木的感觉开始向上蔓延，直贯头顶和双臂，黄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

二

母亲被哑吧叫了来，好心的乡亲们闻讯也都赶来了，献出了各式各样的土方和对他的关怀。

“光土办法不准能行，我看还是赶紧送公社卫生院吧！”

一辆独轮小车后面绑上了一个辘轳圈，上面放上被褥，改装成最原始的救护车，由两位青年轮流推拉，赤脚医生和爱人在旁边保护。在这黑漆漆的夜里，车轮碾上了北山的小路。大队到公社十五里路程，十五里上坡下沟难走的小路，终于走完了。待到卫生院的值班医生拉开电灯检查，只见两脚和小腿已开始肿得老粗，脚面上已长起象花生米一样大的一个个水泡。医生只得用针管把水泡里的水抽出来，用生理盐水洗净以后再上一层獾油，并给了他一包包的药片。回到家已是半夜时分……

第三天的夜晚，烫灼引起的狂躁已经过去，他重新获得了冷

静思考的权利。这时他才发现，这冷静思考又使他掀起了另一股更狂躁的情绪——

看来是要超假了，难道就让它超吗？因为这两脚的烫伤？他从军七年，在遵守组织纪律上从没让人说个“不”字，现在居然要留下一个缺憾了，而且是他军营生活也许快要结束的关头，让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怎么想呢？越到最后，越该给部队战友留下个好印象啊！

战时的习惯靠平时养成！领导多次这样教育他，他也多次用这话教育新来的战友，那么假如真的要打仗，他就要因为这点轻伤而退下火线？从而失去一次杀敌或立功的机会？

这是什么？是营部车管助理员梁明忠的声音：没事就快去快回！新司机要到营里来了，不合格的要重新复训，营里决定让你负责！……

这又是什么？是指导员康现军的声音：你是知道连里情况的，王奎义同志，副连长在负责阅兵训练，副指导员家属来了，我呢，拖着这个病老婆，又是气喘，又是心脏病，三天两头跑卫生队，现在连里又没有连长，三个排就你这个代理排长，所以支部研究决定，把全连的事务工作交给你管理，现在有十三名老兵要走，二十名新兵下连来，你掂量掂量吧！……

还有他那位副班长，在说什么？什么也没说，正在低着头听他说呢：你看，你这兵比我还老，还是一个志愿兵，超假超了十六天，咱们都是骨干，怎么给战士们作榜样？……副班长是个七六年的兵，长期给首长开小车，散漫惯了，乍来连队，经不了这紧张，这也有情可原。要是他这个当班长的也超假，怎么有嘴再去说战士？……

这一夜是静悄悄的，妻子以为他睡了一个好觉，哪知他的思

想整夜在跑马。

到第四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实在憋不住了，把妻子端来的饺子往旁边一推，说：“花仙，我的假期满了，该回部队去了！”

妻子睁大了一双吃惊的眼睛，“你两条腿不能走，怎么回去？”

“我不能走还有你嘛，你不能送送我吗？”

“我不送，也送不了你。你是一米七十的大个，我才一米五七，到时候躺在半路上，抱你背你俺都没能耐。”

她说的是实话，她觉得丈夫现在连一步路也不能走，长途汽车、公共汽车和火车要倒换四回，那是不堪想象的。

王奎义草草往嘴里扒拉了几个饺子，就不吃了。等到妻子收拾完碗筷，就说：“去吧，把俺大大、娘、弟弟和妹妹都叫来，咱们开个家庭会议。”

她盯着自己的丈夫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唔，那神气、眼光、那说话的口气，都是异常坚决的，她不说话了，顺从了丈夫的决定。

他半倚半靠在被子卷上，对面坐着他的父亲，母亲和妻子都坐在炕沿上，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坐到了炕边的凳子上。这是一次至为严肃的家庭会议。

“大大，娘，今晚我跟大家说件事。”王奎义说话了，话也是直来直去的，更确切地说，他不是招他们来磋商事宜，而是宣布他经过深思熟虑，马上就要执行的一个决定：“我想明天回部队去了，现在部队对各方面都抓得紧，尤其强调组织纪律。二者也经常打信嘱咐俺，当兵就要当个好兵，听首长和党的话，别让老乡回来告诉你们丑话，让你们脸上也挂不住。我想过了，再呆上两天三天、十天八天，我还是不能走，误假给处分是小事，破坏

部队纪律事大。所以，我决定了，走！大大是支书，村里工作忙，走不开，弟弟年纪小，我让花仙送我，刚才同她商量，她也同意了。”

父亲点燃了烟卷，抽了一口，吐出一溜长长的烟雾，缓缓地说道：“奎义这话对，咱们在党的人，对部队的纪律不能马虎，超假也不作兴，只是——”

王奎义自然知道父亲那没说出来的半截话，他坐起身来，在窗台上掐灭了半截烟，也及时掐断了父亲那下半截话。

“娘，大大同意了，你表个态度吧！”

“哎呀呀，儿啊！娘不放心！要是你撂在半路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另外车上人挤脚踏的……”做母亲的在儿女的身上一律的善良，她拿不出办法加以劝阻，有的只是流不完的泪。

“娘，”王奎义怕这一哭影响了会议的气氛，扭转了他既定的方向，连忙硬着心加以制止：“现在全国都讲精神文明，指路让座的事有的是；这条路我和花仙又都熟来熟去的，两个大人，那能被撂在路上了？娘不必担心！”

看来，在这个家庭中，除了父亲，王奎义就是第二个“权威”。儿子的话语一出，母亲的哭声也变得细微了。说实在，看着母亲流泪，他也不好受。但这时他必须坚强，他必须用一个战士的坚强去征服一个儿子的软弱。

老父亲拍板了：“行啊！让部队看看咱们的孩子，没个歪样！走吧，奎义，爹就不送你了，让花仙送送你。花仙，你到部队多住几天，照看照看奎义，猪呀，鸡呀，地呀，都不要记挂，有我和你娘顶着。就是莎莎——”说到这个只有一岁多还未断奶的孩子，老父亲踌躇了。

“让俺妹子来照应几天，交给俺弟媳妇也成；在她那里争口奶吃。”张花仙说话了，话虽然是平平常常的，但已见她经过了深思熟虑，把事情都安排妥贴了。

家庭会议到晚上的十点半结束了。

张花仙炒花生、煮鸡蛋，直忙到半夜十二点，两人才都躺到炕上。

“花仙，还生我的气不？”

“谁生你的气，跟你处了这些年，还不知道你那倔脾气？”

——哎，他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他呢？订婚前，人家闺女都向男方要八套衣服、几床被，“三转、一提溜”，我说知道你们家困难，要四套衣服一台缝纫机吧！答应得好好的，结果一套衣服也没买，缝纫机还是俺去东北一年，挣了陪嫁过来的。结婚那天，俺穿的是作闺女时做的小红袄。我问你为啥挑个大年三十结婚呢？你说这天谁也不会来串门，咱移风易俗，一桌酒席也不摆！俺问你：这天日子是不是吉利？你却说：哪天结婚，哪天就变吉利了！俺没争、没辩，全听你的，可这次你更倔……

——啊，花仙，我真得感激你，也为我自己得意，我找了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有些方面，我是做得绝了些，我想你是会原谅的吧？领结婚证的那天，我家里穷，只掏出五十块钱来，让你到百货店里去买暖瓶、脸盆什么的。你看我，还想在这时候再“考验”“考验”你！临时来了个小馊点子：花仙，五十块钱不能全拿走呀，留给我两个钱买点鞭炮放。你还真的又退给我五块钱，结果钱不够花，连面梳妆的镜子也没买上。正是这一次“考验”，让我看到了你纯洁晶莹的一颗心，亮闪闪的，照耀我在部队安心服役，今晚，你答应说送我去，这是对我很大支持呀，花仙，花仙，叫我怎么谢谢你呢？让我，作为一个军人，向你行一

个致敬礼吧！……

三

对于王奎义，携带的也许只有二、三十斤炒花生的纸箱子和五、六十斤重的小提包，而对于张花仙，却还得加上一百二、三十斤的伤号。

就这样，由王奎义的哥哥和一位远房哥哥用自行车将他们驮到公社汽车站，两口子就上路了。

来到胶县，张花仙初尝了旅途的艰难。汽车站到火车站有三里多地，她得把丈夫背下汽车，再扶上三轮车，到火车站后，又得将丈夫背进车站。

车站的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妻子只得把丈夫放到装花生的纸箱上。可是王奎义经过方才汽车的颠簸，血已往两脚上涌，搁在地上，胀得难受，连太阳穴上的神经也一跳一跳地痛。

车站食品柜上的服务员问清了他的伤情和归队意图以后，好心地找了一张躺椅，让他躺在上面休息。从下午一时到晚上八点五十六分，王奎义和妻子得在车站里坐等八个小时，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够累的了，何况他呢？

渐渐地，他带伤归队的事迹已为车站的服务员知道了。绿灯，一盏盏地为他亮了起来。剪票的服务员提前半小时为他开门，食品柜的服务员帮着看行李，让张花仙可以一心一意地背负她的爱人。

张花仙把丈夫背在背上，通过观望的旅客，通过剪票口，走向火车站的地下道。这几百米的路途，对于她是何等的艰巨？她又矮又瘦，体重只有九十来斤，而王奎义又高又沉，起码有一百

二十多斤。走不多远，就压得她气喘吁吁了。更困难的是她还时时防备丈夫那受伤脚，不使它碰到地上，不时地要把丈夫的身子往上托一下，高和重，丈夫的两大优越性，此刻都变成了让她最不能容忍的缺点。要是背负百来斤大米，实在吃不消了还可以扔在地上歇一歇，而这个大活人，别说扔，稍稍磕碰一下都使她心疼。她已经感到精疲力竭、唇干口燥了，却还得爬那几十步台阶，才能走出地道。她不知道那台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迈上去的，她只感到比电影《小花》里那个何翠姑还要艰辛十倍，因为那起码是两个人抬一副担架，而她呢？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在站台上，他们又遇到了好心人，车厢服务员让他俩先上车，还给他递过来一只小马扎，让他坐在过道口，因为他是中途上车，车上人挤，连过道上都站得满满的了。

看来，这走路的通道口的确不安全，上厕所的，背着大提包上下车的，都得从他面前经过，他爱人不时得为他搬动伤腿，免得让人碰到或踩着。

不想没过多久，列车长走过来了，关切地问明情况后，他马上把王奎义和他的妻子安排到餐车里去坐下，还说道：“好好在这里歇着，晚上可以在这里躺躺，白天吃饭也用不着出去。”

不知道这以后的事是不是列车长安排的，餐车里走进来一位补卧铺票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要给他和爱人补两张卧铺，说是他坐在这里，总不如躺到床上舒坦。

过分的好心反而使他有点难堪，也有难言之隐。战士探家，一般是不能买卧铺的，买了也不能报销。要他多掏出二十来块钱睡上一夜，就等于他或者是她妻子白干一个月，因为他的津贴费每月只有二十四块，而妻子没包产到户时的最高工分也每天只有八角整。

“不不，不用到卧铺车厢去了，这里蛮好，太感激你们了，这里吃饭也用不着走路，挺方便的。”

就这样，他在餐车里一直坐到第二天中午，来到了本次列车的终点——北京站。

在北京站，王奎义无论如何不叫妻子背他了，他觉得那样不但难看，还让花仙累得不轻。他提出，等旅客走完以后，让花仙先背纸箱提包走一小段，再来扶他走一段路。可是他不知道，对于没有拐棍连走一步路都困难的他来说，横竖都得把他这百十来斤身子压到妻子的身上，扶或背，并没有什么两样。

走到北京站的大门口，他俩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走出剪票口，看见地上一片湿，天还在下着小雨，纷纷扬扬的，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张花仙说道：“好了，总算熬到头了，你快打个电话，让部队来辆车接你回去。”

这问题，王奎义不是没想过，越想越感到为难。叫一辆大卡车吧，连里就有，可进不了北京站；要是让团里派一辆小车——那是领导开会、下部队用的，他只是名战士，是不是合适？是的，他是战士，他始终用战士的立场在思索问题。

所以，当花仙提出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时，又被他无情地否决了：“不行，卡车进不了车站，咱还是走，好歹已经到北京了，还有五十来里地，用不到天黑就到了。”

丈夫的脾气她多次领教过了，他认准的理，九头老牛也拉不转，有什么法子呢？舍命陪丈夫，今天陪到底了。

下了九路汽车，又上了到通县的342路汽车。终于在下午两点半钟，来到了杨闸。他部队的营房，距离杨闸只有一里来地了。

妻子想走，丈夫却叫她等一等。

“来，让我换一身军装，你也得把头发梳理一下。”“这干

啥？天下着雨，换上也得淋湿罗。”

“那不行！”王奎义的倔脾气又上来了：“我是个军人，我得堂堂正正地站到首长和同志们面前，不能是这个窝囊相。”

妻子只得把提包里的军装取出来，替他换了个利索。而他呢，又拉着妻子，把她蓬乱的头发理了理。“现在，咱们走吧！”

这一里地，对于王奎义和他妻子来说，无异于攀登一次泰山的十八盘。作为妻子，所有的力量几乎全部在前面的旅途中耗尽了，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先将行李往前挪五十米，再回来把王奎义拖五十米，然后又得去挪动行李……

妻子的脸变得煞白而毫无血色，让王奎义看了一阵阵心疼。可他爱莫能助，只得老老实实地把全部重量压到张花仙的身上，压得她歪歪斜斜象一个醉汉。她的步子越来越小了，但是她还是不停脚，因为营房已在望，胜利已在望。

啊，也许没有亲眼看见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在这样一个个头矮小、身子孱弱的妇女身上，会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竟拖着丈夫走完了这五百米路，不，走完了一千八百多华里路，而竟没有倒下，甚至，连一声痛楚的呻吟也没有发出来。

这五百米，他俩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营门的哨兵正好是王奎义带训过的司机，他连忙把下岗的哨兵叫住，把王奎义背了过去。而这时，卸掉重负的张花仙竟然两腿发软，眼冒星花，差一点跪在了营房门前。

下岗的战士把王奎义背上三楼，正要往驾驶班的宿舍里进，却被王奎义止住了。“不，先上连部！”

正巧，副连长从连部走了出来，王奎义让战士靠上前去，他抖抖索索地举起右手，给副连长陈苏明行了一个军礼，并且说道：“副连长，我回来了。我、我没有超假！”

四

指导员康现军第二天早晨赶到卫生队看望王奎义。

王奎义见面的第一句话，还是为了销假。

“指导员，我昨天四点钟回来，没超假。”

指导员看了他两脚的伤势，又心疼又生气：“连队工作再忙，也不在乎缺你这一个人。你不好来封电报——”

张花仙这时已站在王奎义的身边，她把话插了进来：“指导员，俺得回去了！”

“什么时候？”

“今天中午。”

“不行，你不能走，王奎义烫伤这样重，也要你帮着照料几天。孩子带来了吗？”

“没。”

“啊，还小，不放心！这样吧，我派人把孩子接来，你安心在这里住上一个月。”

“太麻烦了。我把奎义交给你们就放心了，有大夫们照顾，比我强。我在这里没有用，你们还得照顾我。”

指导员再三劝说，她就是不愿再呆下，她还告诉指导员，奎义已经托一位复员的老乡去买车票了。

指导员没法，只得回连去找炊事班，让弄两个好菜，招待招待张花仙。

“奎义，还有事吗？”等到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张花仙轻声问道。她表面上坚决要走，其实内心里也是矛盾。她的心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挂在莎莎身上，一半挂在王奎义身上，人在哪头

都心神不宁。

“回去告诉家里老人，还有胜利（大队）的老人，请他们都放心。”

“嗯，我会同他们讲的，你好了给我打封信。”

“你带上一盒烟，一包糖，乡邻关心我来问情况的，就掏一支烟，拿两块糖。”王奎义知道妻子口袋里钱不多了，就把床头的烟和糖拿给她。

“没别的事了吧？”张花仙又问了一句。

“没了，你呢？”王奎义心里很有些不好受，但问出来的全是干巴巴的话。

“没了，不知地瓜干烂了没有，这几天下雨。”

“烂了就烂了吧！……”说到这，王奎义咬了咬牙，下了逐客令：“没别的事你就走吧，快点走吧！”他挥了挥手。

张花仙慢腾腾地走到门口，眼泪随着脚步差点儿掉下来。她没回头，握着门把手停了一停，又颤微微地说了一句：“奎义，我走了。”

王奎义此刻已躺倒在病床上，闭上了眼睛，他只是挥了挥手，什么话也不愿说。

张花仙没回连里去吃午饭，在同行的老乡那里吃了一顿便饭，就登上了通县去北京的公共汽车……

一九八四年七月

“铁腕夫妻”和他们的事业

《北京日报》四月二十六日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昌平县南邵公社四合庄二队，去年人均分配一千六百二十一元，名列郊区农村分配水平之首，提前十七年达到了‘小康水平’。尤其令人振奋的是，这个队一九七九年人均分配只有一百零五元，比全市平均水平还少三十五元，时过四年竟增长十四倍，翻了近四番！”

报社的同志告诉我，四合庄二队是最早走上商品生产的社队之一，现在拥有八个工厂、一个农场。每个劳动力一年能向国家提供一千五百元的税金，为集体创造二千元的前提留资金。劳力的年均收入，则高达三千六百元。是“京郊小康第一家”。而领导四合庄群众创造这一业绩的，是一对夫妻——张玉敏和她的丈夫陈万华。四合庄的群众戏称他们为“铁腕夫妻”。我的心怦然一动。两天后，我揣着采访本，带着了解所有过程、所有细节的渴望，风尘仆仆地走进张玉敏、陈万华家那宽敞明亮的客厅。

**凭着最初和最后的印象，我认识
的是两位全新的人**

经过土地改革那场翻天覆地、迅雷不及掩耳的暴风骤雨，千

千万万个“赵光腚”穿上了裤子，分得了土地，过上了人的生活。然而，三十年，中国农民究竟前进了多少？中国农村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还记得王国福吗？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住的是长工屋，吃的是窝头菜饼；天天扛着镢子下地，领着群众苦干，可就是不能使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还有梁生宝、杨水才……三十年了，我们文学画廊里的先进人物，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优秀典型，哪一个不是身着补丁衣服，肩扛锄头、镢子，裤腿高挽、大汗淋漓的普通劳动者形象？

可是，站在我面前的张玉敏和陈万华，却不是这类传统的典型。

他们站在我面前，热情有礼地和我握手。两个人都穿着干净的鞋袜，张玉敏一身浅色西服，陈万华则穿着蓝色毛料中山服。两个人都齐齐整整，就象要出门似的。

“你们今天休息？”

“我们哪有休息日？连晚上都得天天忙到十二点！”

“那你们……？”

“哦，你是看我们穿得整齐吧？我们是搞管理的呀……”张玉敏微笑了。

是呵，他们已经不是梁生宝，不是王国福了。他们是拨乱反正以后成长起来的农村干部，他们认为，只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而不能使治下的百姓过上富裕生活的，不说愚笨，至少也是不可原谅的渎职行为！他们追求的，不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虚名，而是事业——成功的事业 实实在在的事业，为群众造福的事业！

他们住的，也决不是“长工屋”了。四间耳房，四间大北

房，院子里摆着一盆盆花草，喷水池里一条条美丽的金鱼正姍然游弋。足有三十六平方米的客厅里，摆着一圈做工考究的沙发……如果不是早就知道四合庄的富裕程度，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农村干部的家。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待在四合庄，参观，采访，出入各种场合，亲眼见识了这对夫妻身上的新气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但对农民，就是对国家干部来说，张玉敏、陈万华也堪称一对新人！

客厅里的指挥官——

作为四合庄的首脑人物，张玉敏、陈万华是繁忙的。各厂原料的来源，设备的更新，产品的推销，干部的管理，厂与厂之间的协调，还有乡里、县里下达的各项任务，都需要他们去考虑，去处理。但是，他们是聪明的。摒弃一切形式主义，讲究实效，是他们对付千头万绪的秘诀。他们办公，不是去田头，不是在车间，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尤其是抓工业的陈万华。和同僚们研究问题，跟外单位代表洽谈业务，自然在客厅里进行。指挥生产，检查情况，他们也在客厅里进行。他们的写字台上安了一部电话。对各厂生产的检查、指导，和市郊有关单位的联络、交流，都通过电话传出。他们说：“我们是搞管理的，重要的是管理水平，办事效率，而不是和社员一起制一块砖，搬一片瓦。”实际上，他们所付出的劳动，比起一个制瓦工人来，要重要得多，难得多。白天的紧张繁忙是不用说的，就连晚上，不过十二点，他们客厅里的灯是决不会熄的。尽管这样，张玉敏陈万华还是不满意，他们说：“如果有适用的电脑，我们准备买一个。效率是生命啊！”

吉普车上的经理——

如果以为，总经理陈万华只会在客厅里指挥生产，只会用脑、用嘴，那你就错了！陈万华不但是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官，还是个有几种技能的多面手呢。我到四合庄的那天，就见他戴着墨镜、开着公司的吉普车，到县里去联系业务。他早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驾驶考核，获得了驾驶执照。到城里办事、到县里开会，甚至到治下的几个工厂巡视，他都开着车去。张玉敏说：

“万华是个急性子，走路、搭车他都嫌慢。”据说，他驾驶卡车的技术也是很过关的。在保温瓦销售旺季，司机们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曾亲自出马，开着卡车给用户送货。而且，他还是个四级水平的抹灰工。他会修汽车，会拉二胡，会讲演，还会写一手漂亮的文章！

案头研读者——

看看这份报刊订阅单吧：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市场信息报、企业管理……这些报刊的主人，是两个37岁的农民。张玉敏和陈万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们深知办工业、干事业，离不开科学文化，离不开知识信息。他们很注意从报上接受信息，更新知识。他们还自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历史。由于他们开的是“夫妻店”，他们两个人都无暇顾及家务，于是，三个孩子，寄宿学校的寄宿学校，放任自流的放任自流。一日三餐，也不烧了，不是到食堂打饭，就是到父母家里就餐。省出时间来，他们看书，看报，研究规律，研究动态。去年陈万华因劳累过度，咯血了，住了七个月的医院，就整整读了七个月的书！

争相聘请的经济顾问——

在张玉敏、陈万华的三角橱里，有一份鲜红的聘请书，上面写着：

特聘请张玉敏、陈万华为小汤山乡经济顾问

小汤山乡政府

原来，几年有方的经营，张玉敏、陈万华精明敏锐的经济头脑，卓有成效的管理手段，已是远近闻名。不少社队在决定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都慕名而来，向他们发出了聘请书。不要小看这件事，它说明这两位正当壮年的农民，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熟悉市场，熟悉管理，熟悉经济工作，是党的新经济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在他们身上，你已看不到多少传统农民的气质了。他们的风度和气质，是梁生宝、李铜钟、甚至牛百岁也望尘莫及的！张玉敏就曾经穿着挺括的西服，和市妇产医院院长张颖杰、北京十座立交桥的设计者之一黄顺善一起，同三十多位外国妇女界代表会谈了一个下午，回答了外宾关于中国妇女方面的许多问题。陈万华也曾在自己的客厅里，谈笑风生地接待了新近归国的阿原夫人和几位台湾人士，向他们介绍农村现在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分析今后农村的发展趋势。他们，已经是风度翩翩的企业家了。

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就是：社员比支书横，工人比厂长冲。领导者往往既要注意上下级关系，又要注意干群关系，于是乎顾虑重重，不敢批评，不敢管理。一个领导者，往往逐步变成了协调关系的和事佬。但是，在四合庄的五天时间里，我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东西。

四合庄有许多具体的奖罚条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婆媳打架罚儿媳，干群打架罚群众。”

不要小看这条简短的条例，没有高度的事业心，没有敢作

敢为的铁的手段，是不敢在干部社员闹纠纷时惩罚社员的！

听听张玉敏是怎样解释的吧！

“我们定这条规矩，目的是树立干部的权威。干部在领导、管理时，有缺点、有错误，社员可以批评或者越级反映，但决不允许和干部吵闹、斗殴。否则，干部还有什么权威？还怎么开展工作？”

八二年底，业务员陈万民和从外面聘请来的办事人员闹纠纷，受到张玉敏、陈万华的批评。陈万民不服，和张玉敏大吵起来。结果，按章办事，事后陈万民不但认了错，还一分不差地罚款五十元！

在四合庄，这样的事情是很自然，很常见的。不但对社员是这样，对手下的干部，张玉敏和陈万华也是严厉的。“你干得好，就荣升，多得，重奖。干不好，就免你的职，罢你的官！你砸我的牌子，我就砸你的饭碗！”他们经常在干部会上这样说。四合庄的厂长们，白天是不敢喝酒的，因为书记、经理早就有令在先：厂长白天喝酒，喝一次降一级！

难怪张玉敏、陈万华被称为铁腕夫妻！难怪他们的一言一行，总使我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然而，这些还仅仅是表面的，印象式的。作为一对铁腕夫妻，张玉敏和陈万华的魅力，还在于他们所开创的事业上！

涉深水者得蛟龙，但你敢吗？

怕不怕淹没在深潭里

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四合庄二队，是个穷出了名，落后出了名的生产队。粮食亩产四百来斤，劳动日值五六角钱。社员的日常用度，全指着鸡屁股——一只鸡蛋换上二两盐，一碗醋，两绞

线。家家穷得叮当响。生产队越穷，干部就换得越勤，走马灯似的。每一位队长都是一个滑轮，绞索扯了不少道，重物却提高不了几厘米。每一位队长上任时都雄心勃勃，就职演说一个比一个漂亮，下台时一看，却都只迈了一个“鹤翔步”——看似跨得很大，落地时却只迈了三趾远。这种局面，当时在公社水泥制品厂当工人的“党外人士”张玉敏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咬咬牙，心一横，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来兴：

“你让我回二队吧。我来干这个队长，保证日值一块二！”

“人家没犯啥错误，不好免吧？”张来兴说。

“什么叫犯错误？”张玉敏见书记抹不开情面，急了。“让每个社员少收入一百元，比自己贪污一千元还严重！”

张玉敏是个敢作敢为的女人，尽管书记没有点头，尽管她当时连党员都不是，她仍旧立刻辞去了公社水泥制品厂的工作，回到二队，暗地里开始了她的“竞选”活动。好在这样的穷队谁也不稀罕，人家还巴不得撂挑子呢。年底选举，她满票当选了。

就这样，这个四合庄二队的第十六任队长，走马上任了。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当时的大队长陈万华，受支部委托负责抓二队工作。于是，一家“夫妻店”正式开张了。

应该说，张玉敏比她的前任们都幸运得多。她登上二队这个小小的舞台时，中国这个壮阔的舞台上，党中央已经拉开了变革的序幕！

张玉敏和陈万华一起，参加了县委召开的推广生产责任制的三级干部会议。县委领导传达完中央文件，提出了落实生产责任制的设想，会场立刻炸开了。会上会下，简直是一百只麻雀炒盘菜——尽是嘴了：

“责任田，责任田，一步回到解放前！”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穷都穷，富都富。搞包产，不又得贫富悬殊？”

“一会儿一大二公，一会儿包产到户。还不知将来咋变哩，看看再说吧。”

.....

干部们怀疑着，嘀咕着，犹豫着，也互相观望着。也难怪，他们“放卫星”时插过红旗，“学大寨”时摆过擂台，结果都错了。谨慎，是他们这些年来用教训换来的财富。

“我们看这政策好，回去就贯彻！”张玉敏和陈万华一琢磨、一商量，首先表态了。他们正在考虑怎么使二队的生产来个突破，党的新政策，给他们送来了尚方宝剑，他们当然立刻响应。

回到四合庄，他们立刻召集社员会，调兵遣将。五个作业组成立起来了。联产到组，责任到人。社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原来一百挂零的劳力全压到地头刨食吃，现在，只要七十个劳力，农业生产就搞得井井有条！粮食产量也上去了！

张玉敏和陈万华却不满足。野心也罢，雄心也罢，反正他们要干大的，要让他们的社员彻底富裕起来！他们盘算：粮食产量再提高，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不了多少。何况亩产再上，也有极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人。再说，实行责任制后省出了三十多个劳力，应该考虑搞多种经营，搞工业。

什么叫胆略？当别人还不敢吃螃蟹时你第一个吃了，这就是胆略；什么叫气魄？当别人还怕西红柿有毒时你第一个尝了，这就是气魄。张玉敏和陈万华在别人还在犹犹豫豫，迈一步看两步地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就已经认定：地里刨食挖不出金砖来，要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只有往工业生产、商品生产上靠！

漆黑的六面体，包围着他们，那是他们的魔方吗？鞭心马而驰八极，思想在夜的星空下似乎更自由，更驰骋。张玉敏、陈万华躺在床上，各自睁着眼，转动着他们的“魔方”。

“面朝黄土背朝天，鸡婆屁股里开银行。难道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这样继续下去吗？”

“种一块小麦够自个儿吃的，种两担棉花够自个儿穿的，养一头小猪够过年吃的。这样的自给自足经济，为什么不能变一变？”

“三十个劳力，先办个小厂，探探路。”

“守着石棉资源，为什么不能办个保温材料厂？”

.....

五颜六色的“魔方”，色彩开始趋向一致了。

“万华，我想办个工厂……”张玉敏用胳膊肘捅捅陈万华。

“办保温材料厂！现成的人力，现成的资源，咱们明天就干！”陈万华“腾”地坐了起来。

妇唱夫和，英雄所见略同！一个是二队队长，一个是分管二队的大队长，这“夫妻店”里一通过，重大的决策就算形成、确定了。

说干就干。他们是农民，比端铁饭碗的自由。不用打报告，不用画圆圈，一个保温材料厂的蓝图付之实施了。

二队实在太穷了，他们只得白手起家。没有标准木材，砍下杨树作木模；没有钱买雪花铁板，上废品公司买旧铁筒来切割。他们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一个鸡蛋等于一个零蛋，他们是从零开始的！

为了这个从零开始，张玉敏和陈万华把全部心血、全副精力都投了进去。大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小到跑材料，订合同，

他们都一一过问，一一抓紧。家底太薄，不一件一件算计，一分一分积攒，不行呵。

保温瓦生产出来了，一列列排在场子上，张玉敏、陈万华和二队的社员们看了，欣喜若狂。这是金钱、财富，这是他们苦心经营才问世的第一批杰作呵！他们怎能不欣喜若狂？

但是狂喜只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他们很快就掉进冰窟窿了。砖打出来还不是钱，要到用户手里才能变成钱。他们厂子初办，字号不响，信誉未立，谁买他们的保温瓦呢？

登广告？不行！字号不响，登广告也白登。

接连好几天，张玉敏、陈万华冥思苦想，搜索枯肠，终于找到了对策：用可靠的质量，周到的服务赢得用户，打开产品销路。

于是，他们一方面狠抓质量——设立质量检查员，严格质量检查制度。谁要是操作马虎，造成次品，谁负责赔偿原料损失。同时向用户保证，产品卸车后再过数，破损的拉回去；使用中发见有不合格的，保退保换，决不含糊，并且实行“送货上门，不收运费，供货及时”的服务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推销员，把一些活动能力较强的社员派出去，专职跑推销。推销额和推销员的经济收入挂钩，逼着推销员们竭尽所能，各显神通。

一个刚刚起步的队办小厂，就这样以可靠的质量，周到的服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短短几个月，四合庄二队的保温材料厂就赢得了信用，场子上堆着的保温砖、保温瓦，全都变成了金钱！

一年下来，保温材料厂收入十万元，超过了农业收入，社员人均分配二百四十二元，翻了一番。劳动日值一元八角八分，比张玉敏立下的一元二角的军令状，还多出六角八分。胆量和气魄转化成了金钱。

投石探路成功了！张玉敏和陈万华大受鼓舞。现在，他们已

经有了一定的资金、设备，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办工业的初步经验，他们可以甩开膀子想大的，奔大的了！

工业收入调养了农业，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加上责任制的更趋完善，农业生产这路人马中又省出四十个劳力。

万事俱备。张玉敏和陈万华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他们梦寐以求的，不就是为他们的社员挣一份大产业，挣一种富裕充足的生活吗？

石棉灰厂办起来了……

水泥构件厂办起来了……

小五金加工厂办起来了……

塑料加工厂办起来了……

八〇年到八三年，连续四年，每年张玉敏、陈万华都把一张新厂的蓝图摆到他们的社员面前。他们越来越认定：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他们要带领他们的社员，在四合庄二队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演奏一曲农、工、商的雄壮交响乐。

他们胸有宏图，稳扎稳打。办一项，成一项，成一项，再上一项，滚雪球似的，产业越滚越大，实力越滚越雄厚。农业方面，也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劳力消耗逐年下降。到去年止，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只有十一人，而粮食总产高达三十万斤，平均每个劳力产粮二万七千斤，是全市的冠军。

吃螃蟹就得冒着被螃蟹夹住嘴唇的危险。“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何况在我们这个有着厚重的“左”倾保守土壤的环境！多少人不敢干，不愿干，不会干，却非常善于嫉妒、中伤敢干、愿干、会干的人！

尽管四合庄二队集体致富的道路堂堂正正，尽管张玉敏、陈万华一开始就秉公办事，清清白白，谣言、诽谤却如秋风里的落

叶，扑扑簌簌地朝他们泼来。

——哼，四合庄二队吗？谁知道怎么富的！不搞投机倒把，能富那么快？

——枪打出头鸟，别看他们夫妻俩现在折腾得欢，将来政策一变，你就看吧！

——听说没有？那个陈万华被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抄出好几十万！

亲戚朋友都替他们担心了。

“憋着点儿，玉敏。别冒得太快了。走一步看两步，稳妥一些。”

“万华，见好就收吧，弄到这份上，不容易，再上也难了。你见过哪个干部是光光荣荣下台的？就此打住吧。”

但是，嫉贤妒能的人也罢，亲戚朋友也罢，他们都忘了，张玉敏和陈万华是以铁性著称的。谣言、诽谤，他们不怕，他们问心无愧；政策变，他们也不怕，他们既然决定干一番事业，为民造福，就早已准备担风险，出代价。他们说：“我们相信党的政策会长期稳定。万一政策变，我们也不怕。我们本来就是农民，顶不济就是回地头种地。再说，人心是杆秤，是非社员心里清楚就行。”

是的，谣言、诽谤、风险、挫折只会吓住胆小鬼，真正的强者将微笑着踩过这一切，义无反顾地前进。

张玉敏、陈万华这对夫妻将，在初步的成功和如风的谣言面前，在想些什么？

两个人都是弄潮儿，不过不是在钱塘江上，而是在改革洪流的潮头

看过那几本书吗？《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

向》，《组织的人》，《第三次浪潮》。这些书进入了美国的每一个家庭。约翰·奈比斯特、威廉·怀特和托夫勒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没看过。”陈万华老实地回答。随即便问：“能买到吗？”

是的，未来学、网络组织、信息社会，对于这个农民企业家来说还是新鲜、陌生的。但是，中国农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今正在奔涌着的新浪潮——改革，却是他所深知、所密切注视的。他把昨日的成功当成起点，把周围的流言当成动力，他正在改革之河的岸边伸腰展臂，做准备动作，他马上就要再次纵身跃入这一滚滚的洪流了。

四合庄一共有三个生产队。当二队由最穷变为最富，用最强硬的弓，把红箭直射向蓝天的时候，三队的人均收入只有五百六十元。而一队，才只三百一十八元。身为四合庄大队大队长的陈万华是不会不考虑这之间的平衡的。当然，他的思考要比这更深远。他在考虑，一部份人先富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要让全大队都富裕起来才是他大队长的责任；他在考虑，面对着日益激烈的竞争，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集中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他还考虑，五十八户的二队的发展已趋近极限，为了长远的利益，必须改革，改革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荣誉都让玉敏得去了，其实，我是后台。”这是玩笑话，又是事实。现在，后台老板不甘寂寞，跳到前台来了。“母系氏族”变成了“父系氏族”。该是陈万华挑大梁的时候了！

爱琢磨的大队长谋划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把三个生产队的干部召集到一起，亮出了宏图规划。一天加两个晚上，大小干部围在一起，争执、探讨、回答。香烟喷出的雾气越来越浓烈，

而思想，却越来越清晰。可以向社员宣布了。这酝酿的时间，对于一个官僚机构来说是过于短暂了，而对于他们，却已经过于漫长。

第五天上午八时整，四合庄大队全体社员大会召开了。陈万华坐在主席台上，发表他的施政纲领、就职演说。

“同志们：

“今天，我们四合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成立了！（社员都大吃一惊！他们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名称的，一个个面面相觑，竖起了耳朵。）在今天这个不寻常的会上，我要向诸位说明以下几点。

“一、四合庄，无论二队还是整个大队，要大发展，大起飞，必须彻底改革！改革体制，改革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我们干部们商量了几天，决定：打破生产队、大队体制，成立四合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二、二队的社员说了，三个队一掺合，不是把我们的收入拉下来了吗？同志，是要让你们受点委屈，拉两位兄弟一把。我们是农民，但是，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得有那么一点胸怀。但我告诉你们，无论眼前和将来，你们都不会吃亏。说眼前，我决定以最差队的资财作为基数，你们财产不是多吗？折价入公司，公司记下这笔帐，逐年还清。说长远，不说你们也清楚，再上两个厂，争取上半年建成一个大企业，比你们二队小打小闹出息得多！

“三、讲一下公司的人事安排、生产指标和实行的方针……”

对于他，当大队长真有点屈才，当总经理才人尽其用，所以他自动加冕，毫无愧色。社员在吃惊过后，也许会有一百个疑问，但他的报告里，早作了一百零一条回答。有些人，开始冷

淡、怀疑，被他几句话煽风点火，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完了？完了！话讲完了，问题也解答完了。“统一领导，联产到劳，累计进奖。交够国家，留足集体，余下归己。”这就是公司的总原则。

三下五除二，噉里咔嚓，他一下子安排好了工厂厂长、农场场长，分配原则，和各厂开工的时间。

他是专制吗？也许有一点。你听听他说的，“给你们诸位厂长组阁权、制定工资权，以及开除工人的权利。但你们都听好，规定时间开不了工，或者没有赚钱赔了钱，休怪我陈万华翻脸不认人，到时候就摘掉你们的‘乌纱帽’！”

真有人“乌纱帽”被他摘掉了，那是汽车修理厂厂长陈万明，一个就职了二十天的厂长，比袁世凯当皇帝的时间还短。

总公司成立之始，两天内连发了三道“金牌”——1984年1、2、3号通知。纸是普通的信纸，撰写方式是圆珠笔加复写纸。但是最简陋的形式有最高的权威。限令半月之内制订出一切措施！

半个月过去了，他又耐心等待了五天，然后召开了会议。

“陈万明，你们厂的制度订了吗？”

“还没订完呢。”

“人员配齐了吗？”

“差不多了吧？”

他恼火了，“我这是问你呢！技术人员怎么解决？”

“想去请两个，还不知谁肯来。”

“什么时候能开工？”

“可能得到——”

“够了。”陈万华不让他往下说了。“大概、也许、差不

多，就凭这条，你这个厂长就不够格。你这叫拖拖拉拉，贻误战机！行了，你交权听令吧！”

不管陈万明如何目瞪口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免去了他的职务，当场任命了新厂长。

杀一儆百，厂长们都噤若寒蝉了。

“张保顺，你们珍珠岩厂呢？”

“再给我们五天期限吧！”

“给你七天。”他依然紧绷着脸，让厂长们看了都害怕。不，他们也许根本没看他，一个个都低着头，在紧张地开动脑筋哩。

这是不折不扣的一对“铁腕夫妻”。奇怪的是他俩的手段越硬、越“铁”，手下的干部群众却是越信服。

最胆大包天的还不是他这“铁腕”手段，而是故意不向上级报告的先斩后奏。因为他很清楚，这种打破体制的大变革，如果先向上级请示，十有八九要告吹。就是不告吹，公社转到县，县里再上报，层层研究，公文旅行，他这个总公司猴年马月能成立？而时间，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是最廉价的，对他，却是每分每秒都珍贵！

“老陈，你来干啥？”

“我来请罪”，他向公社领导一抱拳。“我们没有报告，就打破了三级所有，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希望上级能体谅和支持我们的改革。”

他以为会有阻力，至少得挨一顿剋吧。没想到，公社领导大力支持——他们也在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呀！不想改革，不敢让农民富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有了上级的支持，张玉敏、陈万华还有什么后顾之忧？他们

把原来的改革步子迈得更大了！

他们完全抛开了“大锅饭”的做法。各厂、场向公司承包，每年向国家和公司上交一定的利润，其余的收入就全是厂里职工的。工厂办得好坏，产值、利润大小，跟厂长的经济利益有关，跟每个工人的经济利益也有关。这样，厂长和工人们，能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发展产品销路，讲究劳动效率，提高生产力吗？何况工厂内部，还有各种具体的责任制呢！

他们大胆实行权力下放，给厂长松绑。公司只任命厂长、场长，不任命厂级以下干部。厂长、场长有权组阁，有权任命副厂长、副场长和厂内的其他干部，有权开除职工。被厂长开除的职工，别的厂不能任用，必须由公司教育、考察之后再酌情安排使用。厂长们还有财权，只要完成公司下达的计划、利润指标，就有权决定本厂职工的分配原则，分配方法。厂长们有人权，有财权，手脚没束缚，上面还有一个可以随时撤他们职的铁面经理盯着，他们还能不尽心尽力搞生产，搞管理吗？

他们赏罚分明，奖惩严格，一手抓住政治工作，一手按住经济杠杆。他们一方面每年都搞评先进、立功、发荣誉证书、共建文明村的活动，另一方面，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综合百分赛”。劳动态度，劳动质量，技术水平，甚至计划生育、积肥等等，都纳入“综合百分赛”的内容。综合奖分为特等一千元，一等八百元，二等七百元，三等六百元四个等级，年底每个职工按得分多少分等领奖。在罚的方面，他们也很“狠”。无故损坏机械设备，个人出钱修理；打架斗殴，罚款五十元；超计划生育，罚款五千元……职工们说：“公司用高额奖金在前面引着，罚款在后面督着，大家能不老老实实干吗？”

不要小看张玉敏、陈万华这两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就是

他们举起了创业的旗帜，抡起了改革的斧头！五年前，谁能想到，他们不但有企业家的气魄，还有企业家的风度。

看看他们连连走出的几步棋吧，你不能不由衷地折服。

——设办事处。在北京城内，租了一个房间，聘请了几位退休工人，专门负责研究市场，提供信息，推销产品。

——成立智囊团。请国务院一位离休参事牵头，汇拢食品工业、机械等方面的专门人材，业余为他们出谋划策。

——聘请法律顾问。和市法律顾问处签订合同，以每月二百元的费用，聘请了两位法律顾问。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到撕合同、打官司的时候，法律顾问就不再形同虚设了。

——发展“网络组织”。朋友、亲戚、同学、同行，各方面的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一专之能，都广为联络，广为交往。搜集信息，搜集情报，启发思路，促进发展。

不能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这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企业家，决不是鼠目寸光之辈，他们是有远见卓识的行家！

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都不是唐·吉河德式的大战风车，只凭一时刚勇。张玉敏和陈万华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改变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又使自己的知识大量放射，去影响下面的干部和职工。看看陈万华怎样以各种“家”的姿态出现，去理论地指导那个小小的世界吧。

“经济学家”陈万华。“资本主义有竞争，社会主义也有竞争，虽说不是你死我活，也会争得个你穷我富。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咱们第一要提高产品质量，要有信誉。第二要研究销售规律。我发现，保温材料销售上半年是淡季，下半年是旺季，别的厂都是淡季少生产，旺季多生产。咱们倒过来，就象夏季要准备好冬季服装，冬季要准备好夏季服装一样，一旦旺季到了，产品

就能迅速抛出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思想家”陈万华。“解放战争、土地改革，要依靠贫下中农。四化建设，这一条不灵了。真正的贫下中农，现在六七十岁了。年岁大、没文化、脑瓜子不灵，要他们领导企业，三天就得砸锅！现在得有经济眼光，得敢于启用新人，启用能人。有高山必有深谷。他能耐大，就容易骄傲。那怕什么！用就是了，批评就是了。”

“历史学家”陈万华。“项羽的武艺比刘邦高，为什么会有‘霸王别姬’？不会用人！韩信就是从他手里跑掉的。刘邦用了韩信，打下了江山。得胜返朝时，骑在马上问左右：‘我为什么能胜项羽？’有人拍马屁，说你是真龙天子，如何如何英明。刘邦大怒：‘全不对！我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安国不如萧何。只是我善于用这三个人’。我们当干部，就得善于用人，别学张献忠考秀才，两根木桩拴一根线，高的杀，矮的也杀；也别学周瑜嫉贤妒能。有才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越兴旺。”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陈万华是个组织者、鼓动家，被称为四合庄的“撒切尔夫人”的张玉敏呢，也有她的特殊功能。她虽号称“铁夫人”，却仍旧保留着女性的细致与敏感。她接受和反馈信息的速度之快，实在不亚于她的丈夫。

今年三月，她参加了北京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同组有一位食品研究所的工程师，张玉敏马上就盯住了他。

“老安，你对中国食品工业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一句话就聊到安家琦的本行上，这使他兴奋。

“食品工业，大有可为。彩电会过剩，电冰箱会过剩，你见食品过剩了吗？中国人多，搞食品的永远不会失业。”

“那你说，要搞个食品方面的工厂，搞什么好？”

“以我拙见，搞食品添加剂最好。目前这还是冷门，但将来会是热门。”

张玉敏眼睛瞪大了，闪光了。这是信息，得赶快捕捉住。

“老安，咱们两家合干吧！你们提供资料、方案，我们……”

一个人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以后，会收拢其他方面的触角，用于这个特定的方向。张玉敏舍弃了逛商店，穿时装，当家庭主妇的乐趣，却对办工厂、搞企业有浓厚的兴趣、敏感和触角。

会后，安家琦带着他们的副所长来了。小客厅里举行了郑重其事的会谈。两轮、三轮，很快达成了协议，签署了合同。而同时，添加剂厂的厂房立即动手兴建，——一个月后，四合庄食品添加剂厂的厂房盖好了，正准备招财进宝。

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踱方步，打太极拳，练鹤翔桩的。在那些砸了大锅饭、松了紧箍咒的地方，有多少血气方刚、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在那些改革洪流汹涌卷过的两岸，又有多少勇敢顽强的“弄潮儿”？“早知潮有讯，嫁与弄潮儿。”四合庄有了张玉敏、陈万华两个“弄潮儿”，科学、效率、财富，都争相到农村来安家了。

是不是风暴正在袭来？你听 天际有沉稳的雷声

从天际传来了沉稳的雷声。带阴电的云与带阳电的云发生碰撞，中间划出道道耀眼的闪电。一场暴风骤雨就要到来了，这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暴风骤雨！

但是，有一个人没听见，他的四围门窗紧闭着，什么声音都传不进去。他在办公室里抽烟、喝茶、看报，不，报纸也没有

好好看，因为报纸上也充满了新气息，他视而不见。他的名字叫“官僚主义”。

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这样一件小事。他出访日本，早上到大街上散步，他迈的是国内的常规步子。起初不在意，很快便发觉，他挡了别人的路。日本民族是懂礼貌的，被挡在后面的人不得已要超过他时，还转过身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脸红了。

他的步伐很象机关、国营工矿企业的速度。从后面赶上来的，是中国农民。当农民不但在收入上，而且在工作效率上也超过了机关干部、城镇职工，并向落伍者行鞠躬礼的时候，这礼节是否也含有一点讽刺意味呢？

今天的四合庄，社员住房差不多全都翻了新。走进社员家庭，经常可以看到院子里摆着几辆崭新的摩托车，墙上挂着“万元户”的奖状。电视机、录音机，更是早就普及了。

保温材料厂厂长陈万民一年的收入是六千元，他的妻子寇连兰跑推销，去年净挣了一万元。这个家庭一下子买了三辆铃木摩托车，每辆都在二千元以上。

“你儿子还小，爱人不骑车，买那么多车干啥？”

“我好玩车。”他说。“不过，前天借出去一辆，给撞坏了。”

他点燃一支“友谊牌”香烟，一副满不在乎的劲头，就象只是打掉一只玻璃杯。不，要在几年前，儿子打碎他一只酒杯，他会用筷子狠敲那个小脑袋的。

“唉，想换个彩电，就是不好买，还想到全国去周游一次，顶多花二三千块吧！”

他向社会提出新的问题了，“譬如一个水池，光进水不出水，就要漫出来。农民手头有了钱，就要求高消费。东西买不

到，钱花不出去，生产积极性就不容易提高。”他叹了口气。

职工王会敏可以引为骄傲的是，她新近买到了一台二十吋“日立牌”彩电。

“你怎么买到的？”

“在西单，有人卖侨汇券，三块钱一张，我买了五十张。没办法呀。”

“你爱人在哪里工作？”

“他是县科研所副所长，一月挣百来块钱。挣这么点钱，还天天忙得贼死。”

财大气粗，她说话也不一样了。要是过去，她这个农村妇女有一个吃国库粮、拿高工资的丈夫，她会多么自豪啊！

.....

一个巨人站立起来了，用一只大手向城市倾泻他手中的商品，这商品的竞争力是如此之强。它会冲击城市的商品生产吗？他用另一只大手在向城市索取，要彩电，要冰箱，要摩托，还要各式各样的汽车。这需求城市能很快满足吗？两只手再聚拢来，攥紧了一根绳子，他要与城市拔河。教育人材，科研人材，工程技术人材，会被他一下子拔过去吗？……农村，正在向城市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正在发起一次强大的冲击，这是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

凭那座小洋楼，那间考究的会客厅作证，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正在缩小；凭寇连兰的收入作证，农民与工人的经济地位将要倒置。国家职工一年的工资顶不上农民一月的收入，他们的心理状态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张玉敏说：我觉得知识不够用了，准备去上人民大学的经济管理系，市妇联正在帮我联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差距，在部分农民身上被消灭了。这三大差别的

变迁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冲击社会结构？冲击不合理的体制？冲击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因循守旧的工作作风？冲击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概念？

我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到白洋淀参观。一个农民问道：“您说，一斤‘大团结’是多少张？”

“……”他答不出来，也许这位专家从没装过那么多钱。

“您说，一尺的‘大团结’呢？”

“……”他仍然回答不出。

而这位农民却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两个数据。经济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变得无知了。

是的，张玉敏、陈万华是今天农村改革者的代表，他们的事业，展示的是今日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他们和所有的农村改革者一起，正在用以往千百代农民从来不曾有过的决心、气魄和铁的手段，发动和领导新的暴风骤雨。这场以商品生产、迅速致富为其特征的巨大变革，必将荡涤一切旧意识、旧习惯，一扫农村停顿、迟缓的小农经济生产，冲击城市，波及全国。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不再停留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它将迎着我們大踏步走来……

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这场新的风暴吧！

一九八四年八月

有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内乱”过后，人们常常为日益好转的社会风气表示赞赏，也常常为那些至今还仍未克服的不良社会现象而忧虑。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党风、社风能否尽快地根本好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地促进其好转？您如果一时不好回答，就请您来参观一下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先进典型——柳荫街。让这条街道告诉您，让这里的人们告诉您：污垢怎样变成清洁，愚昧怎样变成文明，落后怎样变成先进，宿仇怎样变成至亲……每一颗心都象这整洁的院落，拂去尘埃，坦露出高洁的美来；每一个人都象这街旁的绿柳，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了存在的位置。这都是因为有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把促使社会风气好转的钥匙，才使这里的军民团结和由这种团结带来的变化，快异得叫人吃惊，才使这一具有古老历史而又新奇的街道，增添了新辉。

三百年河流成大道

北京西城区，南起前海西街，北到后海南河沿，有一条五百来米长的街道，入街口墙上钉着一块红漆铁牌，写着“柳荫街”

三个大字。当春风薰拂，柳枝摆动，游人身临此街的时候，犹如进入了公园的林荫大道。路两旁是高大的榆槐和成排的柳树，铁栏圈起的草坪、花坛里，泄绿涵红，各色的鲜花竞相争艳，如姑娘的人面、彩裙。街的南头垒石为山，丁香、松柏交错其间，形成一座街心公园。公园北头，竖着一块精致的木牌，上面是徐向前元帅隽秀的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

大道如带。是录音带？录像带？可惜都不是，如果是，它一定会卷曲起来，又舒展开，向你叙述这条街古老又崭新的历史。

俗话说：三十年媳妇熬成婆，三百年大道流成河，而这条街的历史，却是三百年河流成大道。这河修于明代弘治年间。文献上记载，“太监李广，盗引玉泉，经绕私第”，这就是这条街历史的滥觞。它的上游源于西山玉泉，绕经李广私第，向东流入前海。此河成月牙形，河上架桥，叫李广桥。到了清代，权相和坤看中了这块地盘，兴建了他的府第。和坤高官十四年，贪污受贿合银十亿两，相当于当时朝廷二十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乾隆死后第五日，嘉庆帝就将和坤“令赐自尽”，房屋赐给其弟永璘，为庆王府。此后，咸丰皇帝又把庆王府收回，转赐他的弟弟奕訢，称恭王府。《燕都游览志》载：“德胜桥下泛舟东行，转而南，得紫光桥，径僻，岸无行人，古槐浓荫，覆阴如罨画溪”。可见当初两岸景美，中道河深了。

解放前夕，这河已面目全非。两岸垃圾堆积，河中臭水滞塞，这儿成了蚊蝇滋生的猖獗地。河岸上贫民窟里，捏糖人做小毛猴的、住地窖卖后海冰块、拉洋车的、卖老豆腐的、打小鼓收破烂的人家都拥挤在这里，草房和油毡房挤挤擦擦，低矮而潮湿。那时还没有自来水，穷困的人们只好和这条臭水相依为命，涮锅盆、洗衣裳，又向里面倾倒煤灰垃圾、人粪狗屎，洗涤污脏

的同时，又不断倾泻着污脏。臭水沟里，淤积的是穷人的苦难和血泪。和恭王府形成了天堂和地狱的对比。

建国以后，这里和“龙须沟”发生了同样的巨变，臭水沟改成了暗沟，上面修起了柏油马路，命名为李广桥街。因为这里土质肥沃，水份充足，适应柳树的生长，所以植树若干年后，早已成了高柳摇窗、绿荫掩路的柳荫世界了。“覆阴如罨画溪”的美景更胜往昔。因此，人们又赋予了它名副其实的新名字——柳荫街。

每家人家都有棵难种的树

在柳荫街有着七条胡同，住着九百四十六户居民。他们该是当年臭水沟畔贫苦百姓的子孙。比起他们的祖先，正象这柳荫覆掩的大道相比于臭气冲天的污沟，生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排排垂柳象征为幸福之树，党的福荫不就是那浓郁的柳荫嘛？至于每个具体的家庭，那就得具体分析了。每个家庭的建立都为了追求幸福，但天灾人祸、各种人为的不幸又往往落在这些家庭之上，使愿望和结果大相径庭。他们栽的可是棵樱桃树哟，樱桃好吃树难栽，那球形的鲜红色小果是每个家庭的追求，却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获得的。

你看，西口袋胡同19号楼里的一位大娘，疯颠颠地跑到街上来了。她流着一脸的泪水，踏上了后海的薄冰，想扎进冰窟窿里，好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世间的痛苦，她呼天抢地地喊：“天哪。我遭了什么孽，让这两个不孝的儿子来作践我呢？”她对生命一点依恋也没有，身体向前扑去。就在这当口，她的儿子关炳和飞车骑到，撂下车子，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母亲的后衣领，猛往回一带，母亲差点

摔倒。他两膝扑通跪地，抱住了母亲的双腿，气喘吁吁地哀求道：“妈，你不能死！你死了，咱们这个家就完啦！”

这位母亲生下过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多子多女给她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幸福而是更多的懊恼。前年，她的小六子因诈骗同厂工友的三千多块现金，被判处三年徒刑（监外执行）。她这个已经退休准备颐养天年的老妈妈，不得不织毛衫、做衣服，每月八十、一百地为儿子还债。一笔儿女债，一把辛酸泪，旧债没完，又添新累。眼前膝下这个关炳和，因为婚姻上有第三者插足，早已经和第三者动过刀子，被公安局拘留过。现在又在腿上刻下了“复仇”二字，准备过罢春节，就要同第三者同归于尽。她，几十年抚儿育女含辛茹苦，实指望苦尽甜来，谁料想吃完苦瓜又啃黄连呢？丈夫不管事，两个孽子又如此这般，她没法子，竟自作主张到法院去要求离婚。并且说道，离婚后她可以把退休金交给国家，自己住敬老院去，这个办法颇象旧社会做尼姑遁入空门。但法院的同志明确告诉她，有儿女的人不能进敬老院！哎，明明是儿女作孽，进敬老院还被儿女拖累，她，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一家一户的这些挠头事，把法院也忙得不可开交。住在西口袋胡同11号的谢文英，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去叩打法院的大门了。春节前夕，西城区人民法院只得派出了孙亚荣同志，坐镇居委会，来处理谢文英和霍世英的离婚案。

谢文英的家庭成员并不复杂，一个婆婆，一个丈夫，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矛盾的复杂性，谁也理不清道不明。就象曹禺写的《雷雨》中的人物，谁与谁摆在一起都有矛盾，婆媳纠纷、夫妻争吵、母女不和，二十六年来日积月累，至使这家庭关系冰冻三丈。前些天，谢文英已把行李搬到了厂里，发誓不再进家门，现在，又向法院提出第——连她自己也忘记这是第几次的

离婚要求。

谢文英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着丈夫如何听婆婆的挑唆，用铁锤打坏了她的腰，四个儿女都长大了，连一声妈都不叫。说到伤心之处，竟然泣不成声。而每每这个时候，丈夫却高门大嗓嚷起来：“都是你对？你怎么在家里成了孤家寡人，连孩子也不叫你妈？”

“还不是你妈从中间挑的？孩子是我的亲骨肉，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你管过孩子吗？什么都不管，连孩子穿的都是她们大姨做的，要不是你妈使坏，她们能不理我？”

“是你不孝敬我妈，孩子们看不过，才嫌弃你。我妈快八十岁了，拉扯我就容易？她见了你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当儿子的看了啥滋味？我，我打你是轻的！”

“同志，你、你看他，在法院面前还打打打的呢，要是你们不在，他又得把我往死里砸！”谢文英瞅准时机又递了一状子。

法院、居委会、男女双方的领导，四堂会审，车轱辘话听烦了，孙亚荣把手一挥，制住了谢文英的哭闹和霍世英的狠劲，“好了，案情大体明白了，你们各自都有责任，谢文英不尊重老人，不对！霍世英打爱人，也犯法！将来如果再发现老霍打人，或者孩子们打母亲，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发现谢文英虐待婆婆，也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至于离不离婚，我看居委会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的孩子都结婚生孩子了，双方又没有根本的原则性问题，我看还是以和为贵……”

有些人家的矛盾并不外露，也不那样大吵大嚷，但艰难困忧却并不亚于前者。刘云桐这位瘫痪了的老人，此刻眼睁睁躺在床上，能活动的右手扯着床单，恨不能将它撕个粉碎。他想一头撞到墙上碰死，又担心自己气力不足，顶多能撞出个大包，痛苦再

加痛苦；想滚到床下摔死，可床面离地面实在太低，摔不死反而又伤，在残疾上再加残疾。他竟想不出该怎么处置自己为好。

他二十一岁毕业于中国大学生物系，留校当过助教，解放后又在中学担任过生物和化学老师。他会五门外语，学问渊博、长于辞令，深受学生欢迎。只因在五七年说了几句“农民生活还很苦”之类的话，就把他复杂的海外关系加在一起算总账，打成了右派，被驱逐到甘肃的农村去。“四人帮”粉碎后，他的问题获得解决，被分配到十三中教书。他，忘却了身体的老化，只想作个少年哪吒，为社会主义建设生出三头六臂来。忽然有一天，上得太紧的发条断裂了，他得了脑溢血。昏迷了三星期，抢救了一个半月，竟奇迹般清醒了，但身体却瘫痪了。然而，清醒者的痛苦比昏迷者的痛苦更能噬嚼人心。当万籁俱寂的深夜，耳旁只有老伴那轻微的鼾声，他大睁双眼望着天花板，辗转反侧。这时，他就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刑一样难受：他有一腔知识却不能贡献于四化大业；他感激党而不能报答于党；他有历经了漫长痛苦而不敢回首往昔的痛苦；他有期望未来而不敢正视未来的悲愁。甚至连蓬乱的长发、遮没眼帘的长眉，都刺痛得他难以忍受，使他自暴自弃：唉，象啥？象一个原始森林中的毛人。

自然，决不会每家每户都象是居住在火山顶上，但小小的困难又总是处处存在的，有的住家阴沟不通，脏水溢于沟外；有的住家太小，自行车只得搁在院外风吹雨淋……这些小小的难处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有谁会为这些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上心呢？

在这条街的最北头，有一家特殊住户，如果算上它，柳荫街该是九百四十七户了。它是卫戍区某师某团的一个连队。战士们从五湖四海汇拢来当兵，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发生和遇到

不愉快的事情。最明显的，是他们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得不到社会上某些人的尊重。烈日下，他们扣着风纪扣、扎着武装带站岗，那些打扮得象时装模特儿一样的男女们却讥笑地指点着，“瞧那个大兵的傻样！”而当一些战士主动到五保户家去送棉衣送菜、打扫卫生，邻居家的青年就挑逗地喊：“喂，大兵，也到我家里来学学雷锋！”气得战士们跑到连部来向连长指导员发牢骚，说永远不再干丢人现眼的事了。

的确，托尔斯泰老人说得对：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一片翠柳荫翳了全街人

是谁说的？是朱伯儒说的：两个人分享一份欢乐，便有两份欢乐；两个人分担一份痛苦，便少了一半痛苦。

军和民采取联合行动，为消除人们苦恼而作的努力，首先是从美化环境开始的。

二月四日，卫戍区某团在罗毅政委等五位团领导的率领下，司政后机关加若干个连队好几百人，浩浩荡荡开赴柳荫街打扫卫生来了。他们深深懂得，环境美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一项具体内容，而且是心灵美的先导，因为任何旧的习俗、风气的变革，都必将在人的心灵中引起深刻的反应。他们大至每一条街道、胡同，小至每一个院落、死角，都来了个旧貌换新颜。许多年存积的垃圾堆被清除，数十户堵塞的下水道被疏通。这一行动给居民带来了微妙的影响，脸上开始发热发红。院落干净了，心却局促起来。象那些忠于职守的职员发觉了自己失职一样，连忙抢着和部队同志一齐干了起来。就在这一天，军民共清除垃圾、渣土就

有十三吨。自然，作为人民军队，这样的事迹过于平常，甚至不值得写在这篇文章里，但在当地居民的心里，却是卷起了一股感情的风暴。一位老人事后在写给海外亲戚的信件中，对这事专门作了不算报道的报道，她是把这件事作为柳荫街十大新闻的首条加以报道的。“这一天，咱家突然跑进来三个解放军，说是帮助我们打扫卫生，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们就挽起袖子干开了。屋里忙完了，就开始疏通下水道。快过春节了，现在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下水道周围泼的脏水都结起了冰，走在上面很容易摔跤，他们硬是不顾地脏冰滑，用铁镐撬开盖子，用手，用小铁勺一点一点地把堵塞的污泥挖出来。我摆在凳子上的烟不抽，茶不喝，一忙完就又到别家去了。这样好的军队，不知道你在外国是不是见到过？”

春天里，部队和居民共同努力，又在干净的大街上新栽了雪松、油松、黄杨、丁香，圈起了松墙，铺设了1200多平方米草坪，重新油漆了全部绿地的铁栏杆。对于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言，这仅不过走了第一步，是浮在表面的一些变化，却已经使一些住在别街的群众羡慕不已。一位到柳荫街来访友的同志说：“你们这里真干净，我要能搬来住就好了。”不，同志，你还是把“柳荫街”搬到你居住的地方去吧！

随着工作的深入，参加军民共建精神文明领导小组的孙厚仑指导员已不满足于扫几次街道栽几棵树了。他在想怎样干几桩能够解决群众困难的实际事儿。

一天，领导小组聚集在居委会里开会。会前闲谈时，民警小张说道：“昨天，有个居委会里丢了一辆车，到现在还没找见。”居委会高主任接茬说：“我看咱们的车也够呛，特别是50号院，我整天跟他们讲，要把车子放到院里去，可院子里车多，怎么也

放不下，只得放在街上，不丢才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指导员孙厚仑暗暗记下了，他记下了一个并不要求讨论的提案；而且很快作出了与会者谁也意想不到的决议：一定要为群众修一个车棚。

连部前头有一片菜地，他回来同连长一商量，想盖一个车棚。连长所见略同。电话打到团里，团里亮起了一盏绿灯，立即批准拨两捆油毡供他们使用；师里知道后，又主动亮起了第三盏绿灯，说油毡不如石棉瓦好，指示他们用石棉瓦修车棚。他们又找来一些旧的铁杆，一个宽三米，长二十余米的车棚建起来了。

他匆匆跑到居委会去报讯，刘主任和高主任乐得合不拢嘴：“这下可好，可给群众解决大问题了。”

当晚，指导员和高主任走遍了胡同、大院、高楼、低舍，要群众把自行车推到义务存车处去，说保证无损无丢、气足干净、存取方便。“哎呀，这可好啦，咱们正愁这车子没地方放哩。”可话虽然这么讲，第二天晚上却不见一辆车子送来。指导员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于是二顾茅庐，乡亲们说：“好是好，就是你们不收钱，长此下去，我们挺不好意思的。”指导员苦口婆心，走一家宣传一家，说我们是人民军队，只能为群众尽义务，不能收群众的钱，不能，一分钱也不能收！

第三天晚上，存了四辆车，然后，与日俱增，八辆、十四辆、二十辆，隔了不几天，存进了六十四辆车，车棚已经挤不下了，连里准备扩建。

为了防止车辆丢失，五班的战士不仅自制了车牌，还建立了一本登记簿，是凤凰还是永久？车号若干，车主姓甚名谁，登记得一清二楚，更可贵的是，脏车推进去，第二天早上推出来时已变得干干净净了，小毛病负责修理，漏气的帮补车胎，几个月如

一日，一丝不苟。上早班的群众去推车，会常常碰到，执勤的战士在一辆一辆地认真检查，又逐辆地擦去车梁和瓦圈上的泥灰。

有一个居民想考验考验战士的责任心，把一辆长期不骑、两胎都跑气的车子推了进来。第二天他来骑车，来来回回找了三趟才认出自己那辆车，车子擦拭得一干二净，前后胎的气打得足足的，够他在北京市绕上十圈八圈的了，他感动得连连念叨：“名不虚传，义务存车棚，名不虚传。”

在柳荫街6号楼的三层楼上，住着一户三口之家，老两口加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儿。由于住房狭小，老两口又都患有慢性疾病，搬车的任务，全落在了女孩子的头上。晚上，等父母躺下了，她把三辆车扛到屋里，塞满有限的空间；清早起来，她得先把三辆车扛下楼，老两口才好起床，冬天累得直喘气，夏天累得一身汗。老两口怕长此下去闺女不长个，常常暗地里掉眼泪。

这下好了，三辆车全进了义务存车棚，女孩子第一次来推车，向站岗的叔叔莞尔一笑，甜甜地说了声：“谢谢叔叔，我再也不愁不长个了。”久而久之，熟悉了，站岗的叔叔也同她开句把玩笑：“小张，长个了吧？”

“长，长得可快啦！”

“长个大高个，去参加中国女排。”

“嘻嘻，得个奖杯，就送给叔叔们。”

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是她心灵深处的笑声，心灵深处的愿望。

一天早上，当指导员孙厚仑和连长李圈正带着几个战士正在宋庆龄故居设置茶水站，正张挂“警卫战士为民服务站”的横标的时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同志散步走到了这里，这些警卫战士也为他执勤站岗，所以见面都熟悉。他看了看横标问连长、指导

员：“你们这为民服务有什么内容啊？”

“为群众供应茶水。”

“你们还可以帮助群众理发嘛！外地来参观的，理个发也不容易。”

“是，我们有两个理发员正在这儿理。”

指导员补充说：“我们还有一个问讯处，专门为群众介绍行车路线。”

“这样办不错，要搞好，不要走形式。”

这位独臂将军逗留了一小会，走了。谁知隔不久，他又转了回来，在衬衣外，又套了一件军装，也许是专门要同这两位基层干部谈话，穿上军装显得更尊重些。

“来来来，”他招呼着连长、指导员，“你们那文明村搞得怎么样啦？简单地向我汇报汇报。”

指导员纠正他说：“首长，我们搞的是文明街。”

“对对，我叫习惯了，就谈谈你们的文明——街。”

两位基层干部一边陪首长散步，一边扼要地介绍了近几个月来的工作。

余主任举起了他的右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是部队两用人材的培养，一个是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村，这两条是部队当前建设的大事，要抓好！”他略作停顿，而伸出的两个手指头还在那里举着：“而搞文明村的建设呢，也要注意抓好两条，一条是改变社会风气，一条是改变社会治安。尊老爱幼，改善婆媳关系，教育失足青年，都应该属于你们的工作范围。不要光挑水，扫院子，挑水挑了几十年，现在有了自来水，用不着挑了，扫院子人家也会自己扫。”

“首长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贯彻。”

“要教育战士提高认识，这是大事，这是方向，要切实实实为人民群众做几件好事，改进社会风气，加强社会治安。”余主任临别，又再次嘱咐说。

总部首长的这一指示很快由电话转报团、师和卫戍区，而这两位基层干部，脑子也豁然开朗了。是啊，我们不仅要为这条文明街的路面带来美，带来春天的绿色，更主要的是要把春天永远留在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撒向群众心灵深处的一片柳荫

由居委会、部队、民警三方面结合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领导小组”成立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个主攻方向，是要改造这条街上的二十五名失足青年。为此，在八三年春节前夕，他们向这些青年发出了参加座谈会的请柬，自然，这里面少不了那个为报夺女朋友之仇的关炳和。

确实确实，当关炳和怀揣着粉红色的请柬，一步步挪向居民委员会时，心里有一丝别样的感觉。

他已经有一年多不上班了，在大腿上用刀刻下“复仇”二字以后，他就筹备着复仇的行动。

他的计划并不复杂，用磨亮的尖刀将第三者和已经离婚的爱人捅死之后，就到公安局去投案。固然，自己免不了一死，但与其让这口气憋着，还不如死了痛快。

春节前，他经过反反复复推敲，写了两封信，分别寄给了第三者和他又恨又爱的人，在这两封哀的美敦书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让我们都痛痛快快过完最后一个春节，然后再算一次总账。不过，这“痛痛快快”四个字，完全是外交辞令，或者更明

确地说是一种反义词。他自己从此就没有痛快过，何况收信的对方！

关炳和心想：这次是不是还是老一套，把失足青年都叫去，由公安局派人严厉地训斥一顿：现在春节临近了，你们都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破坏节日社会治安，罪加一等！

但又觉得不象；就凭这精致的请柬，精神文明领导小组的签名，是把他当成贵客来欢迎的，他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殊荣。对于他，无异于象人大代表收到了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邀请一样，感到一种人格受到尊重的庄严。

人到齐了，派出所、居委会、还有部队的同志。据介绍，那位坐在讲话席上的叫田中振，是团的政治处副主任，是部队专门派到柳荫街来加强领导小组工作的。

有一位长头发、穿喇叭裤的高建合，平时嘻嘻哈哈，一口一个“大兵”，今天在“大兵”面前，虽然也出点小洋相，可总不免有点拘束。看嘛，平时带把的烟一个劲地喷云吐雾，今个好烟、好糖、茶水摆了一桌，两只手却象戴了铐子似的，一个劲地藏桌下面。

田副主任讲话了：“要过节了，居委会办事处、派出所和部队约你们一块来玩玩，交个朋友。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在座的各有各的思想苦闷。就拿关炳和来说，在婚姻恋爱问题上有第三者插足，他有些想不通。老实说，要是这事摊在我的头上，还不得一宿宿睡不着觉？不过，我比你痴长几岁，也老练一些，不会象他那样采取一些过激的措施。我想，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有责任替他、替大家当个参谋，人的一辈子究竟怎样度过才有意义，又怎样把过去的错误教训转化为精神财富，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聪明一些……”

朋友的友好、父兄的热诚，使一颗颗僵化了的心熔解了，还有那烟、糖，调节了气氛，关炳和想：人家解放军把我当人待，我关炳和再犟，也懂个好歹。行，解放军大哥，今后你们只要有时间，肯看得起我这个朋友，我就把心里话掏给你们。

高建合不再嘻嘻哈哈了，他象一下子老成起来：“我的历史不光彩，居委会知道，民警同志也知道。今天解放军同志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你们把我当人看，我自己总不能还是那个猪狗相。现在咱这里搞文明街的建设，我高某没本事，会画个画，今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尽管提！”

首战告捷，再接再厉，田中振第二天就带人上了关炳和家，和这小伙子谈了一整个晚上。关炳和向老大哥诉说了心中的一腔苦恼和积怨。老田循循善诱，将古比今，他讲了普希金决斗丧身的故事，这个大诗人如果不死，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这些外国文豪的故事，说得小关七窍齐开，精神大振。

再一天去，老田发现小关床上的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又一次去，关炳和交出了他那把磨得锋快的匕首。……

也许最使关炳和感动的是田中振说到了他自己。他有一个儿子，在小学不好好念书，老师责备他疏于管教，并且也发出了“最后通牒”，扬言要把他儿子开除出学校。他很想严格地管一管这个小淘气，就是没有时间。关炳和自然知道他的时间哪里去了。他的心也是肉长的，老田一宿一宿泡在他家里，还不是为了使他这棵歪脖子树长好、成材？老田把他对孩子的爱移植到他身上来了；而他又怎能不对老田产生有如父兄般的敬重？

田副主任找关炳和谈了十四次，找他的父母谈了十三次，又找他的工厂向厂领导汇报、请教了三次。而关炳和的确变了，还在精神文明大会上发了言。

五月，他又给老田添了一件麻烦事，但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麻烦事了。他主动献了一次血，得了七十元钱，他一定要用这钱买一件礼品，送给部队，表示一下感激之情。老田再三申明不能收。关炳和就生气、发火、冲动。但终于，他买了一幅带镜框的油画，由他父亲亲笔题词，他双手捧给了驻军连队。这是用自己的鲜血换的，他捧来的是一颗赤诚的心！

居委会、民警和老田还到了天堂河、团河劳改农场去了一次，给三个正在劳改的柳荫街的青年，送去了檀香皂、毛巾、书籍和笔记本，当着这几个青年，不会写诗的老田也成了诗人，献上了一段充满诗意的讲话：请你们用毛巾擦去劳动的汗水，用香皂洗涤身上的污垢，让书籍给你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笔记本上记录你们的新生活。我们柳荫街正在大搞精神文明的建设，欢迎你们改造好了回来献计出力！

老田他们回来的第三天，就收到了一个劳改青年的回信，在感动之余，他表示要下决心痛改前非，争取提前出来，参加文明街建设。他说的决非是大话空话，因为在信纸上，还沾着点点泪渍。

谢文英家的二十六年婆媳、夫妻不和，是闻名于柳荫街的老大难问题，如果这个老大难问题不解决，精神文明的建设很难说取得了显著成效。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决心让这一家的人过上和睦舒心的生活。

经过分析研究，丈夫简单粗暴，谢文英嘴尖刻薄，各有其缺点，但主要矛盾是婆媳不和。而在这一方面，谢文英有很大的责任，加之她又是一个党员，更应该有高姿态。于是，思想工作的侧重点定在了谢文英身上。

居委会的刘主任、高主任，部队的田副主任、团部干事张鹏

瑞、副指导员任新书，分三路兵马一齐出动，这回是大兵团式的决战。

田中振在找谢文英谈话：

“你好好想想，婆婆就那么个儿子，又没有女儿，她会藏着掖着？如果你对她好，她哪会有什么外心？她对孙女好，孙女不也是你的亲骨肉？”

“我丈夫打我，全是这老不死的教唆的。”谢文英气愤不平。

“我听群众反映说，婆婆见了你，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既然你这样待她，她能不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子又怎能不打你。你发现没有，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你有气，想在婆婆身上撒，婆婆有了气，她就通过自己的儿子在你身上出，结果呢，你想出的气越多，你受的气越大，是不是这个道理？”

“她挑唆得连我的女儿都不叫我妈，你说她坏不坏？”

“这个问题恐怕不能那样认识，你的女儿大了，两个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她们恐怕都有自己的主见的，光说挑唆能成今天的局面？恐怕还得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她们不理我，我走，离开这个家，无牵无挂，清静省心。”

“这是气话，我知道，你在厂里当采购员、管劳保，外交家务都能干，这个家完全是你撑起来、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有了暖气、自来水、水泥地板、成套家具，电视机什么机的样样全，你能舍得这个家？”

“……”

“不怕你生气，你的缺点我还要指出来，你爱骂人，骂老人，在经济问题上也不放手，过于计较。你的儿女丈夫都不满意

你，你要想办法改正你的缺点，婆婆、丈夫，我们也想办法做工作。”

在老婆婆的屋里，刘主任也在同她唠叨：“老嫂子，咱俩的年纪差不多大，说重了你不会计较。你想，媳妇不孝敬你，你苦恼，你的孙女不喊她妈，她也同样苦恼。你不跟她讲话，丈夫又经常打她，我看她的日子更难过。你们也要体谅她、关心她。”

张干事、任副指导员找的是霍世英。

“老霍，你练气功、学武术，是用来健身的，怎么能打人？你到街上去打个人试试看？不抓你到派出所才怪！噢，自己的老婆就可以打啦？这同样是不文明的表现、犯法的事。谢文英一人挑起这个家，不容易！你动不动拳打脚踢，连几句温存体贴的话都不会讲，一说话就能把人噎死，谁和你过日子都不舒坦。这些毛病不改，你当心犯大错误。……”

田副主任此刻象一个“集团军司令”；不过，就是能当司令的人，也不见得能指挥好这样的“战役”。部队、派出所、居委会，他要指挥三路兵马联合作战；法院、谢文英亲属加上邻居，这是他配备的“第二梯队”。用老霍的进步来教育谢文英；又用谢文英的悔悟来促进婆婆，……研究情况，制定策略，协调步伐，统一口径，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一切军事韬略，该用的他全都用上了。

也许是她（他）们谁都过够了前段那长满荆棘的家庭生活，都渴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也许是老田他们水滴石穿，金石为开。媳妇对婆婆有了笑脸，丈夫对妻子有了体贴，孩子们也开始甜甜地叫几声“妈妈”了。领导小组立即不失时机地召开了这个家庭的“三国四方”会议，团里特派了新闻干事牛伟旗亲临茅舍，拍了一张彩色的合家福照片。而谢文英，也登上了精神文明

表彰大会，用现身说法，来教育别人，同时也教育自己。

比起上面的这两个老大难问题来，瘫痪病人刘云桐的困难算是特殊的，虽然部队不能使他恢复健康，从新走上讲台，却可以常常来替他理发，改变他的外貌，从而也使他的心理上感到年轻。

先给刘云桐理发的是连队理发员魏振洪和邓洪家，小魏复员以后，小邓就一个人理，小邓下班当班长以后，新的理发员孙文艺又接替了他的工作。三年哪！照刘云桐的话来说：解放军同志的推子在我头上推了不下一万次，可是从不在我的家喝一杯水，抽一支烟，更不用说吃一顿饭了。久而久之，这个笃信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生物学家，自己也有了条件反射。

“孙同志该来了吧？”到了每月的二十五、六号，刘云桐就开始唠叨。

“不都是定的二十八号吗？还有两天。”他的老伴也总是这样回答。

“是啊，是啊，还有两天，解放军孙同志就来给我理发了。”

“干嘛叫得那么复杂呀，叫小孙多亲热？”

“不，叫孙同志，有什么比同志两个字更亲热呢？你也别叫人家小孙，记住，要叫同志！”

因此，虽然小孙来理发，仅仅是个把小时的事，但对于刘云桐和他的家庭，却象是盼一个重大的节日，每回告别，他无以表达自己的感激，总是紧紧地拉住小孙的手，再把他的手贴在额头上，不肯放开。

理发，成了他晚年的精神享受，给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莫大安慰和信心。

无怪乎刘云桐和老伴要将解放军战士为他理发的事，嘱咐大儿子告诉他在瑞士经商的妻妹，还交待他的妻妹，转告给在台湾的妹妹和另一位妻妹。

刘云桐的确有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

他的亲妹妹刘淑娟，嫁给当年在南京空军总司令部任职的兰宝田，两口子现在都在台湾，他爱人的三妹郭玉芬也在台北任中学校长，五妹郭玉仙在瑞士开一家中国餐馆，其爱人是当年军调部北平三人小组的美方翻译，名字叫依梅尔·丢克。而刘云桐本人却早年参加民盟，是建盟的早期盟员之一。当北平的国民党政府要逮捕他时，他一人跑到南京，找到兰宝田，混了个小小的文书员之职；而当全国解放前夕，他的亲戚都往台湾跑，他又毅然跑回了北京，投向了共产党的怀抱，因为，他很早就认识和理解了共产党。

久居国外的郭玉仙并不轻易相信刘云桐的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她回信说：这样的军队她从来没有见过。那么，为什么姐姐、姐夫要这样告诉她呢？也许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吧！

去年，郭玉仙回北京探亲来了，她进门的时候，恰巧连队的理发员刚走。本来，小孙每次理完发，总要把地扫个一干二净，刘云桐的爱人过意不去，这次硬是夺下了他手中的扫帚。而郭玉仙看到的是姐姐正在清扫地上的头发屑。

“哎呀，怎么还在扫地呀？”

“理发的解放军孙同志刚走。”

“他真每月定时来给姐夫理发呀？我还以为说说而已。”郭玉仙透出惊讶，她讲话是一半中文夹着一半英语。

刘云桐有点着急，忘记了叫妻妹落座，也忘了叫爱人给妻妹泡茶，他想急于说明真相，又有些结巴，所以用手势配合，伸出

了三个指头：“三……三年啦，夏天、冬天，风雨无阻。”

郭玉仙坐到沙发上，依然表示着怀疑：“是不是专门对你家这样？他们是不是有求于你？”

这回老刘有些光火了，嗓门提高了四五度：“什么话？我、半身不遂，能给、给他们帮什——么忙，这叫作为、为人民服、服务。”他显得更加急躁，急躁又使他说话愈加困难，于是只好求援地看着自己老伴。

郭曼漪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早已和丈夫有了很好的默契，她立即替夫答辩：“我们柳荫街有八户孤寡老人，逢年过节，解放军就包好了水饺煮熟了端给他们。还有一户老姐妹俩，姐姐从小瘫痪，妹妹为伺候姐姐，终身不嫁。前些天，八十多岁的姐姐发烧到三十九度，是解放军同志把她送到医院，从楼梯上背上背下。老太太大小便失禁，弄了解放军一身，也不嫌弃。开头，医生还以为是老太太的儿子呢。等弄明白了，医生也感动得很。……”

郭玉仙有点明白了，也动了感情：“真是眼不见不信！我回瑞士后，一定想办法告诉在台湾的姐姐。”

郭玉仙回信中的话说对了一半：小孙确实确实没有想到要为宣传而理发；而理发确实确实达到了宣传的目的。不是别人，正是郭玉仙这个一向反对政治宣传的华侨，开始了以宣传为己任，向国外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品格。

栽树者也会有自己的一片浓荫

许多事情的后果，往往是始料所不及的。

连队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并不追求报答，而报答，实际上已经悄悄来临。

当初一口一个“大兵”的小青年，现在把连队战士当成了自己的亲兄弟；而街上退休了的老工人、家庭妇女，自动组织起来巡逻放哨。原来一年部队要处理几十起上访事件，弄不好上访人员还会吵架寻闹，现在居委会主动做上访人员的工作，战士们反倒清闲了起来。

而最为主要的，是部队开展两用人材的培养时，得到了地方切实有力的支援。

西煤厂胡同3号的梁德建，他的奶奶是个印尼华侨，平时买菜腿脚不方便，现在副食店主动送货上门了。小梁是清华大学电子系的毕业生，他有感于部队和地方开展共建精神文明风气之改变，主动提出要给部队讲授无线电知识。为此，连队组织了无线电小组，请他每星期一晚上来授课，不仅是团机关，连军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饶有兴趣地跑来听课。现在，这些学员不仅会安装四管收音机，还开始了向九管的超差式收音机进军。

东口袋胡同3号有一位顾淑惠大娘，勤俭持家，把四个儿女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她的儿子来到连队，为战士们作了艰苦奋斗、自学成材的报告，感动得连队那些伸手要家里寄钱的战士，都开始“扭亏转盈”，开始寄钱给父母了。大娘的女儿罗宜珠，又主动担任了连队的哲学教员。她为了让战士听懂哲学课，认真备课，加了许多农村生活中的例证，听得干部战士兴趣盎然，战士们在讨论时说：“过去以为哲学课神秘，学哲学高不可攀，经罗老师这一讲，才知道生活中到处是哲学，什么人都可以学得会的。”

柳荫街有个北京市十三中学，当学校教师听说战士中有的在准备功课参加军校考试，就主动派出三个教师，到团里来专门为这些考生补课。

在当前有不少人都在“向钱看”的情况下，这些老师认真授课，却又分文不取，不能不时时激励着我们的干部战士发奋攻克文化关。因为不仅是教课，他们本身的行动就是无字的书本、无声的教员。

教育是相互的。当军队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地方的时候，地方群众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教育着自己的子弟兵。这里面，有一个良性循环，沿着这一个循环，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在螺旋式地上升。

一九八三年六月

后 记

当我将这个报告文学集交付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时候，我为自己感慨不已。

在我中学时代，既爱好数理化，也酷爱文学。一九六〇年高考时，只因为理解错了作文的题旨，语文成绩仅得了55分，致使总分成绩仅得478分而考取了一所化工学院。一九六二年，因美蒋叫嚣窜犯大陆，我投笔从戎，当了一名防化兵。工作之暇，我迷上了诗歌创作，从一九六四年始，开始陆续发表一些小诗。自以为在文学上受挫，转学理工以后从此与文学绝缘，谁知又转到文学领域中来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我到解放军文艺社诗歌组帮助工作。从发表第一首诗至今，已有二百余首小诗问世了，却未结集，深觉憾事。后来我调至济南军区文工团搞创作，从此走上“杂家”之路，写过歌词、歌剧、京剧和话剧，甚至还写过曲艺作品。但那时正是“四人帮”把持政坛与文坛之时，虽有勤奋创作，必是一事无成的。一次，我与李荣德同志创作了一个八场歌剧，由于不符合“三突出”创作原则和其他原因，未能演出，于是我们改写长篇小说。结果《大雁山》一部，终于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六年调到济南军区文化部当干事，工作繁忙，想写大部头已无可能，只得写点短篇小说和散

文。一九七七年八月，散文集《浪潮曲》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谁知鬼使神差，我又移爱于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写了一本《创作辩证法初探》。书还未出，名声外传，解放军报社因此调我来搞文学评论。四年评论生涯，渐渐体会到文艺理论工作之艰难，又渴望写点作品。于是又于一九八二年转到解放军文艺社工作，这才走上了重点写报告文学的道路。这本报告文学集，正是几经曲折之后，近两年来创作的轨迹。

二十余年来，生活道路的转折与工作的频繁变异，时时把我推到十字路口，总要在路口彷徨一阵，才选定一个方向继续前行。以至我成了一盒“万金油”，什么文学形式都侍弄过，却每一样都无所建树。

还有一个苦恼在长期折磨着我，那就是当个好编辑和好作者的矛盾。编辑的业余时间十分有限，他的写作和采访时间也许只有专业作家的百分之十，但读者只是从书刊的架子上去认识他。他们不看成因而只看结果，并不因为编辑的时间少而原谅你的少产和质差。我和大量的坚持业余写作的编辑一样，正是利用那么一点点有限的业余时间去写作的。而报告文学的大量工作是了解信息和安排采访，缺乏自己可以使用的整块的机动时间，常常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这是一种捆着绳索的跳舞，我无法去专攻和选择某一类的题材，无法作从容构思和精心琢磨。这就形成了这个结集题材杂取，又写得浅薄粗疏的原因。

说实在的，近几年来，我的确爱上了报告文学，因为它写真的人生，写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事迹，在文学诸品类中渐渐显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读者也正是从“真”中产生了对报告文学的信任。“信誉就是生命”，这是商业上的口号，也应当成为报告文学中的口号，我是十分珍惜这种信任的。因此，对于采访获

得的素材，只作些剪裁的加工和技巧的运用，不敢通过“想当然”或幻想去编造、虚构什么情节。这可能是我的这些作品的优点，但无疑也带来了它的缺点——干巴而缺少“水份”。

正因为这个结集是我创作轨迹的记录，读者一定会从中看到，我开始写作时，笔触是僵硬呆板的，构思是平庸无奇的，虽然渐渐有一脚踏入报告文学之门的感觉，但比起高手来相距甚远。我只是攀到了“中天门”，离泰山的“极顶”，还有极远极高的行程。

坦露出来，让人看到自己的幼稚和浅薄，这并不难堪，因为为的是更加成熟。在这一指导思想驱使下，我才毫无愧色地将这许多单篇收拢一起，准备集中端到读者面前。自然，我首先得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敢于出象我这样才情平庸的人的集子。为的只是为我修筑一个扎实的台阶，让我作进一步的登高。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